

##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詹姆斯·贝特兰 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的重要功臣

朱玖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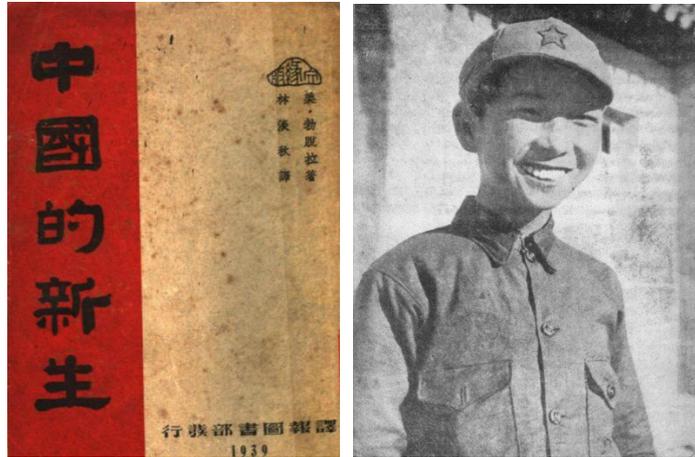
在华北前线采访的詹姆斯·贝特兰

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市，在奥克兰大学本科毕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6年1月抵达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中文和研究时局。在燕京大学，贝特兰和黄华同住一个寝室。贝特兰有着强烈的反法西斯思想，与进步学生十分投缘。他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结为好友，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接受刚从延安归来的斯诺的建议，去西安，作为斯诺的特约通讯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发稿，报道西安事变情况。在西安，他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与时任杨虎城秘书的王炳南成为好友。他和史沫特莱、王炳南夫人安娜一起，每天晚上用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从XGOB电台向外界播报西安事变进展。回到北平后，发现《每日先驱报》不爱刊登斯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系列报道后，他同斯诺和英国青年约翰·列宁（John Leaning，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任中央委员）一起，创办了新刊物《民主》。



贝特兰 1986 年来华参加西安事变 50 周年纪念大会时赠给老友黄华的照片

正是那次西安之行，使贝特兰有机会接触到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他看到红军之间平等和谐的同志情谊，久久不能忘怀。于是他决定去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天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左为贝特兰揭示西安事变真相的《中国的重生》  
(中文版，1939 年出版)；右为书中刊登的红军照片

1937 年 8 月，日军侵占北平后，贝特兰和斯诺一起护送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 3 名中共党员一同撤离北平，到天津后，为他们订船票并一起继续撤离的是年轻的新闻记者爱泼斯坦（详见“宋庆龄与国际友人”专题系列第二期《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保卫中国同盟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9 月，在西安，贝特兰收到毛泽东的一封电报，邀请他作为第一个英国客人访问延安。于是，贝特兰就此开始了他将近五个月的华北前线之行。



1937 年 9 月，贝特兰（右二）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与斯诺（左一）合影

9月底，贝特兰来到延安。他在延安逗留将近一个月，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还目睹了黄克功事件公审大会。他被延安的蓬勃朝气和充满希望的感觉深深吸引。



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刊登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毛泽东亲笔题写了醒目标题



1956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贝特兰谈话

1937年11月初，贝特兰离开延安，去晋南八路军总部和贺龙的120师采访，并随军遍访华北前线。在随后引起轰动的《华北前线》（1939年在英国、美国出版英文版，在上海、香港出版中文版）一书中，他向世界宣布：“以我个人在晋北所观察的现象来说，我觉得即使是日本的那些善辩的人也很难长久维持他们那‘和平’的谎言的。”



1938年1月，贝特兰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采访时，与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萧克合影

华北前线严重缺医少药，周恩来想到向宋庆龄求助，于是刚从华北前线下下来，并且同情、支持中共抗日的贝特兰自然成为最合适的带信人。结识宋庆龄后，贝特兰从此成为宋庆龄维系一生友谊的外国友人之一。

## 一、转达周恩来请求

贝特兰在结束华北前线战地采访后，于1938年1月来到武汉。他多次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周恩来特别同他讨论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问题。以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从华北前线带回来的关于伤员需要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他们商定了一项计划——在华北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下设五个分院，并继续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周恩来请贝特兰把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带交给香港的宋庆龄。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外景

在武汉，贝特兰遇到了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以后重点援助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创办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大夫率领美国—加拿大医疗队启程来华，在贝特兰抵达不久来到了汉口。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们。在离开武汉前，贝特兰把他的一套旅行用的衣物全部送给了白求恩大夫，后来从白求恩在延安和华北各地拍的一些照片上，他还看得出白求恩仍穿着其中的某些衣物。在武汉，贝特兰为白求恩拍摄了后来为人们所广泛熟悉的白求恩酷似列宁的那张照片。贝特兰说：“在我看来，这是白求恩在中国

拍下的最好的一张照片。”



1938年1月，贝特兰为白求恩在武汉拍摄的照片

1938年3月，贝特兰在香港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与很多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人一样，被她外在的美丽、端庄和优雅所吸引，更被她对理想的坚贞不屈所打动。宋庆龄曾对他说：“我们已经懂得，不要对英国，美国或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抱太大的希望。中国可能得孤军奋战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害怕；但是，我们要求你们的政府为我们做一件事，那就是不要帮助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力量，我们就会变得强大起来。中国现在已经团结起来，终于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民族。这正是我丈夫的宿愿，他把毕生献给了这个事业。”“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自己将战胜艰难困苦而取得胜利……”



宋庆龄 1938 年在香港留影

4月初，贝特兰受邀参加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廖于1月来到香港）在香港银行家邓文钊家中举行的秘密会议。廖承志邀请了一些外国友人，席间谈到急需在西北地区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和继续组织募捐。直到很晚时，他才向大家宣布，他是代表孙夫人举行这次会议的；她随时可以出任可能成立的任何援华委员会主席；她的兄弟宋子文将担任会长。当时提出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个名称并获得通过。贝特兰随后将他的两位朋友——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和香港

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诺曼·法郎士（N. H. France）介绍给宋庆龄。他们成为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分别担任了名誉秘书和名誉司库。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诺曼·法郎士、廖承志

保盟随即启动工作，努力实施周恩来在汉口与贝特兰等人商定的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计划。保盟6月14日在宋庆龄寓所正式宣布成立时，贝特兰已经离开香港，经大连、朝鲜、日本，去美国和英国，路费是贝特兰自己挣的，但此行的原因是宋庆龄对于他“前往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推动”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这一计划作了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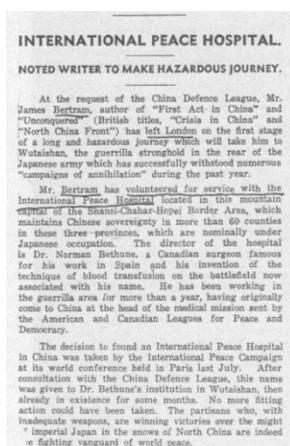
1938年夏，宋庆龄在香港接受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为拍摄《四万万人民》的采访。左为廖承志

1938年5月25日，宋庆龄致函贝特兰，表示希望看到贝特兰所写关于日本情况的观察报告，并感谢贝特兰对保盟创建的贡献。她说：“由于你的高度热情和助人不倦的精神，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发挥作用了。我们常常在念叨你那充沛的精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我们也感谢你赛尔温-克拉克夫人介绍给我们，因为这位女士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

## 二、护送大型救护车

由于通讯联系的困难和白求恩大夫日夜忙于医疗工作，有关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

详尽的报道难以为外部世界所得知，1939年4月，贝特兰应保盟要求离开英国启程来香港，准备去五台山敌后游击区，“组织在保盟支援下的西北所有机构发送定期报告”。他向保盟提出，他愿意去五台山为组建国际和平医院义务工作一年。



1939年4月15日发行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期报道贝特兰将去五台山

6月，贝特兰从香港出发，同行的还有汉斯·米勒（Hans Müller）、江涛声夫妇等。

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米勒在瑞士巴塞尔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时，深受中国进步同学江涛声影响。米勒毕业后，已经无法返回德国，江涛声建议他前往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工作。江涛声告诉米勒，自己要处理一些事情，随后也将前往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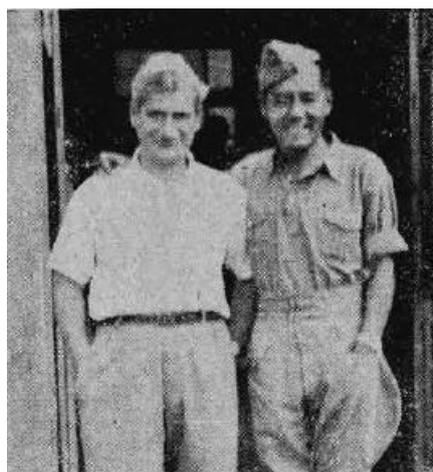
米勒 1939 年抵达延安时照片

江涛声 1931 年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和德国妻子希尔达·派赫尔（Hilda Prerauer）一起，带领第一位“西班牙医生”——捷克共产党员费·基希（Frederick Kisch）和奥地利共产党员杜汉（Duhan）医生来华。在香港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杜汉的中国妻子江兆菊医生，她在抗战爆发后率领中国红十字会第 29 医疗队赴延安等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1949 年应宋庆龄邀请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首任院长。江涛声一行在香港受到宋庆龄的热情接见，她亲切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远道而来支援中国抗日！”



1938年至1939年，江兆菊（右一）任中国红十字会第29医疗队队长，在延安等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图片来源：金鳌江氏后代的博客）

基希留在香港等待另外两位第一批来华的“西班牙医生”——德国共产党员罗·贝克尔（Rolf Becker，中文名白乐夫）和澳大利亚共产党员费·严森（Fritz Jensen，中文名严斐德）。他们后来在贵阳图云关与贝特兰一行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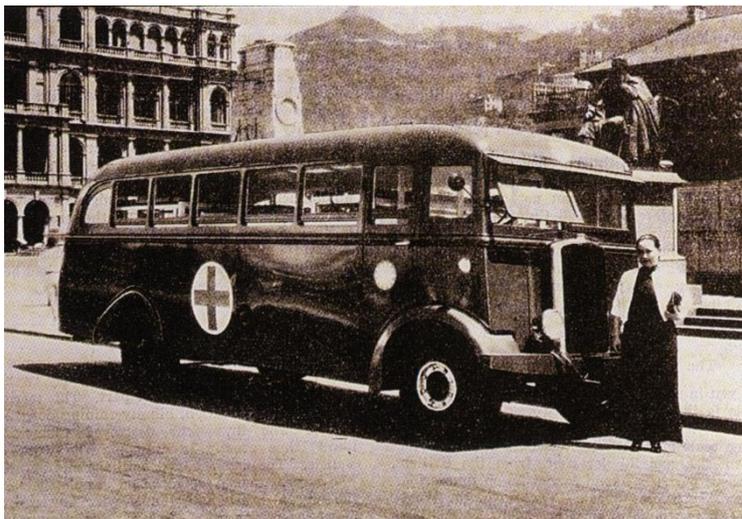


1939年7月，基希医生（左）和林可胜医生（右）在贵阳图云关合影

宋庆龄将护送大型救护车去延安的任务交给了正要去西北的贝特兰和江涛声夫妇，贝特兰是总负责人，保盟要求他“全面检查运输情况”。临行前，宋庆龄向大家赠送了礼物。

大型救护车由英国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Sir John Thornycroft）捐赠。将要护送去延安的，除了这辆庞然大物一般的大型救护车外，还有23辆卡车，均装满了医药器材和汽油。贝特兰说这是八路军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多最珍贵的捐赠”。





1939年，宋庆龄在大型救护车前留影

贝特朗一行一路艰辛地经海防、昆明、贵阳、成都到西安。在贵阳图云关他还得了一场疟疾，幸得林可胜大夫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救治。在赴西安途中，贝特朗得知英法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于是他准备回国参加战斗。把大型车队护送到西安后，他向中途遇到的斯诺，以及米勒和江涛声夫妇告别。9月底，他回到香港，给保盟撰写了一篇非常有用的详细报告，报告车队一路的运输情况。随后返回祖国新西兰。



贝特朗拍摄的车队来到广西某个渡口准备用驳船过河的情景

贝特朗未能行使保盟交托他的西北任务，但他记挂在心。10月，斯诺来到香港，他向保盟中央委员会报告说，他在延安曾和边区领导人讨论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他讨论的结果是以贝特朗先生授予他的权力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做出建议”。从那时起，保盟由马海德处定期得到了大量的报告和照片。

### 三、临危受命

1940年6月，贝特朗在新西兰接到宋庆龄发来的电报，问他愿不愿意回香港继续为保

卫中国同盟工作？电报说旅居海外的中国人面临新的危机，委员会需要贝特兰来帮助恢复它。随后，在贝特兰登上来华的远洋轮时，宋庆龄又发来第二封电报：“请在马尼拉稍事停留，设法在那里建立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的分会。”



1940年夏，贝特兰在菲律宾与从事工合运动的友人合影。左起：贝特兰、斯诺夫人、艾黎、克鲁特先生和夫人（负责菲律宾工合委员会的工作）、斯诺

宋庆龄电报中说的“旅居海外的中国人面临新危机”指的是保盟面临日军封锁香港的危机。1940年6月22日，日军封锁香港，随后于6月24日要求英国政府关闭滇缅公路和香港边界，不仅要禁运武器弹药，连汽油、卡车也在禁运之列。6月28日，香港总督下令英侨一律离港，香港一度人心浮动。保盟为此曾作非正式讨论，决定暂时不动，将不去内地，向外发展。保盟一度准备迁移至菲律宾。而此时正在内地休假的爱泼斯坦一时又回不来，于是宋庆龄再次想到了请老朋友贝特兰暂时代替爱泼斯坦。

贝特兰到了马尼拉后，发现宋庆龄在这里的华侨当中声望很高，他以宋庆龄代表的身份，拜会当地的主要华人领袖，非常顺利地得到了数额可观的捐款和华人领袖的支持诺言。在菲律宾，贝特兰去看望了正在为工合运动工作的斯诺夫妇，还遇到了来菲律宾为工合筹款的路易·艾黎和正准备去中国内地考察工合运动情况的卡尔逊上校。他随后同艾黎和卡尔逊上校一起乘船来到香港。



1940年夏，贝特兰（左一）在菲律宾与斯诺、斯诺夫人、艾黎和卡尔逊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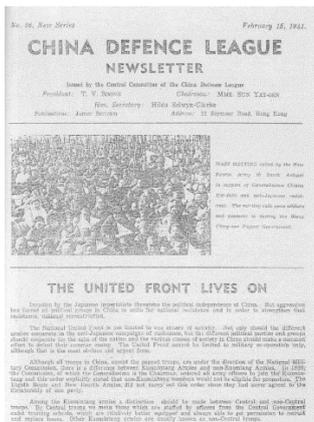
7月17日，英国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封锁滇缅公路运输的协定》。香港危机暂时解除，保盟决定继续留在香港。

1940年9月6日，贝特兰抵达香港，随即接手《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的编辑工作。宋庆龄向贝特兰指出：“重要的是我们的宣传。我们必须告诉海外的朋友，中国真正在发生什么事。”



1940年9月15日发行的《保盟通讯》第20期开始出现“宣传：詹姆斯·贝特兰”字样

那时，国共关系渐趋紧张，统一战线正在破裂，保盟从陆路运送物资去西北，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有好几次整车的宝贵物资在路上被宪兵夺走。“摩擦”不断升级，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终于发生。贝特兰编辑《保盟通讯》时，“摩擦”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他在1940年12月1日发行的第24期通讯上刊登文章，披露了“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摩擦”；随即又在1941年2月15日发行的第25期通讯上重点介绍了新四军。在1941年2月15日发行的第26期通讯上，他刊登《坚持统一战线》一文，分析了整个错综复杂的形势，说明了统一战线和世界形势的关系，详细描述了事变经过，报道了周恩来提出的12个条件，最后指出：“皖南事变向中国所有的爱国人士敲起了警钟，向国内外的一切民主力量发出了呼吁：必须继续施加压力，因为这样，国内和国际的反侵略统一战线才能继续坚持下去。”



《保盟通讯》第26期上刊登的《坚持统一战线》一文

不久，英国驻重庆大使邀请贝特兰去重庆英国大使馆当新闻参赞，宋庆龄得知后，笑着说：“当然，我们不愿失去你。但是，你在重庆会非常有用，尤其是在我那尊敬的妹夫采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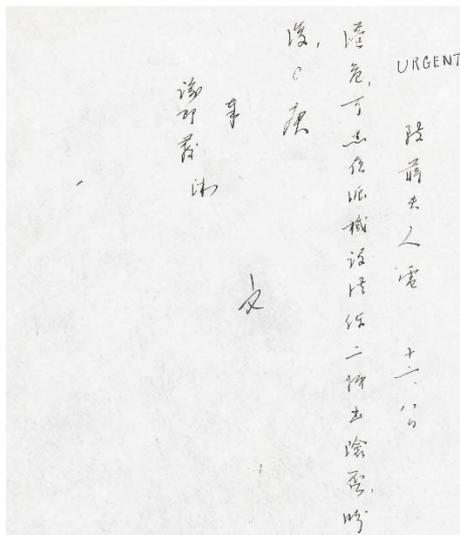
最近这次背信弃义的行动之后。我们必须保持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重庆，但是他的办事处受到蓝衣社的严密监视。照你说的那个办法，你可以和他接触，并且使英国政府了解情况。”

在重庆期间，贝特朗果然不辜负宋庆龄，他曾拉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加入保盟，并希望他声明美国不能帮中国压迫共产党。他对詹森游说道：美国对华援助应该以蒋介石制止内战爆发为条件，美国不应干涉中国内政，以落入日本人圈套。

## 四、香港遇险

1941年春，贝特朗被宋庆龄召回香港，编辑保卫中国同盟的《1940—1941年度报告》。这时，金仲华、邹韬奋的加入也使保盟队伍得以壮大，他们负责编辑《保盟通讯》的中文版。此时却发生了宋子文宣布退出保盟的事情。迫于蒋介石压力，宋子文于1941年5月30日给保盟名誉秘书司徒永觉夫人发来电报，宣布退出保盟。针对宋子文辞职，宋庆龄决断地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我们需要在理事会中增加信任。”之后，保盟争取到了一批新的国际和国内赞助人，其中有孙科、冯玉祥、尼赫鲁、保罗·罗伯逊、托马斯·曼、赛珍珠和克莱尔·布思·卢斯等人。香港理事会也增加了新成员，其中有香港大学许乃波教授。

1941年12月，贝特朗终于完成了“像书一样”的年报编辑工作，随时准备付印。然而，这份报告却永远发表不出来了，因为形势这时骤然变得极其严峻。



1941年12月8日，宋子文致电宋美龄，要求安排飞机接宋庆龄离港脱险

在12月第一周，宋庆龄收到宋子文从华盛顿发来的急电，劝她马上离开香港。保盟开会时，宋庆龄询问大家的意见，贝特朗认为宋子文在华盛顿最了解内情，他对宋庆龄说：“如果说应当走，我认为您应该接受他的劝告。”宋庆龄表示同意，但是她要等到出现真正的危机再走。

那边宋子文心急如焚地不断给宋美龄发电报叫她想办法救二姐，但是这里谁也没有把宋子文的警告真正放在心上。会散后，刚刚交了保盟年报校对稿的贝特朗一身轻松地与诺曼·法

郎士离开香港本岛度周末去了。12月8日，贝特朗回到香港的第二天早晨，正准备吃早饭时，突然听到枪炮声，随后得知日军此时此刻正在轰炸九龙启德机场。贝特朗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宋庆龄，为方便去机场，宋庆龄九龙公寓就设在机场附近。贝特朗打她公寓电话打不通，于是他赶紧把早饭塞进嘴里奔到西摩道办公室去。



日军战机轰炸香港

在办公室，他接到了宋庆龄打来的电话。宋庆龄语气镇定地告诉他自己还在九龙，她向贝特朗口述了目睹香港轰炸的声明。在声明最后，她呼吁：“让我们共同战斗到底，直到把日本强盗赶过海洋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

12月8日傍晚，宋庆龄和姐姐宋蔼龄一起，持特别军事通行证，趁军火管制期间来到港岛。贝特朗陪伴她们在告罗士打酒店订了两间单人房间。第二天上午，他们在西摩道21号举行了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在香港的最后一次会议。

多年后，贝特朗深情细腻地描绘了这最后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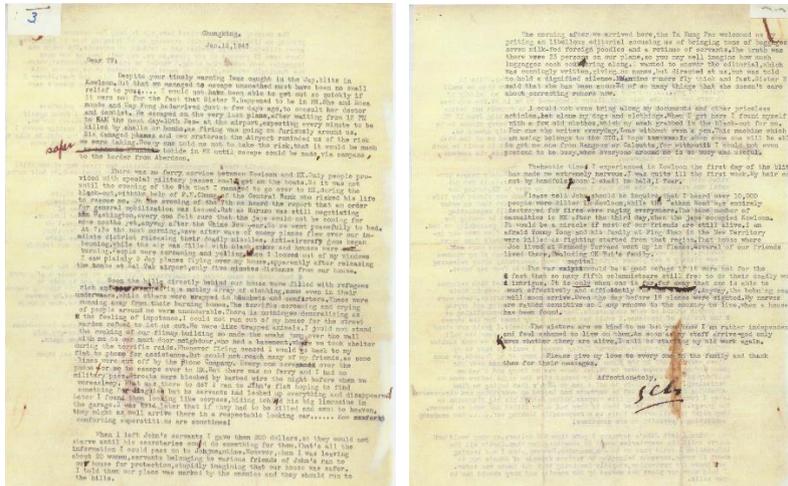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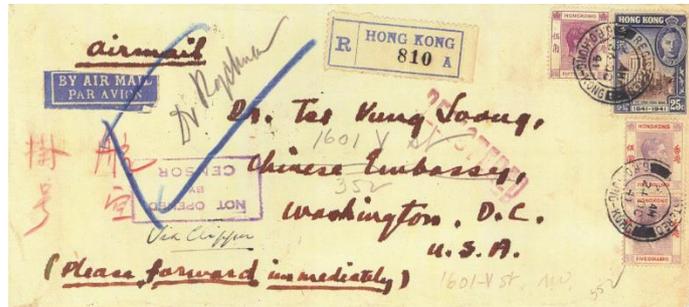
起初，孙夫人说要留在香港，同大家一起共度受围困的日子。但是，她留下来的确是再无事可做，让她来冒落入日本人手中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她坐在窗边朴素的木制书桌旁，我们望着她，在窗外的山下，空袭警报声在居民住宅区尖叫。她是一个敏锐、勇敢的妇女，像这样的危机，她过去遇到过多次；她在过去三年中同这几个朋友亲密地在一起奋斗，她不愿意离开他们。

“那么，说来说去，我一定得去重庆啦，”她微微地做了个怪脸说。“上回，他们对我到那儿去不太高兴！不过，找个什么地方——中国，缅甸，甚至印度——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委员会再组织起来。”她把文件收拾好，朝着墙上她丈夫的照片看了最后一眼。“同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战前的启德机场

12月9日，宋庆龄和姐姐宋蔼龄及其长女孔令仪一起，在九龙启德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12月10日凌晨5点，才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当时四周正在猛烈交火，6个小时后机场落入日本人手中。



1942年1月12日，宋庆龄在重庆致函宋子文，详细叙述在港历险经历

贝特兰随后和诺曼·法郎士一起投入保卫香港的战斗。这是他在来香港之前就作好的决定。来香港之前，他给宋庆龄秘书柳无垢发来电报，希望确认一旦战争爆发他不是被应募入伍，而是自愿加入志愿者队伍，因为战争的性质变了，保卫香港就是保卫民主阵线，因为那是他做的“最好的事情”。

法郎士牺牲了，贝特兰在香港沦陷后被关进集中营，以后又被转到日本，在战俘营里备受折磨，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



1945年贝特兰寄赠宋庆龄的签名照。他在照片上写的是：“期待重逢，希望是在中国，在最艰苦的岁月之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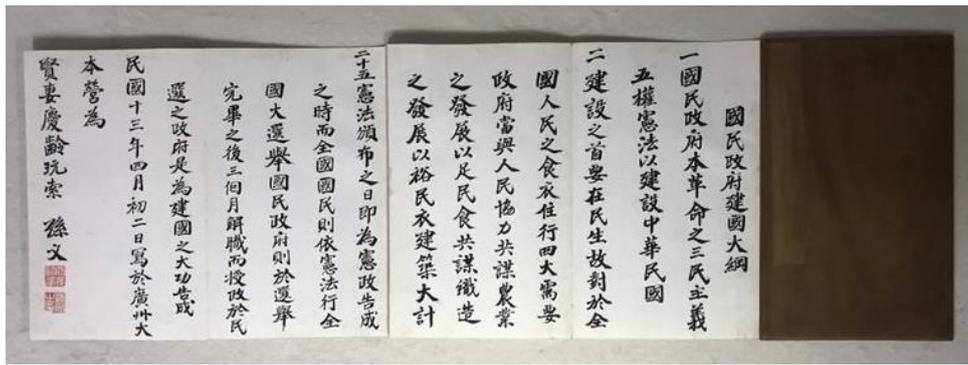
## 五、上海重逢

1945年12月，贝特兰作为远东顾问委员会特别顾问随新西兰代表团到日本访问。离开日本后，他来到上海。那是1949年1月到达上海的第一天，贝特兰应邀来到位于苏州河边的颐中大楼，当他敲门走进挂着“中国福利基金会”小牌子的201室时，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香港西摩道21号。屋里坐了很多中国人，中国福利基金会正要开会，他看到了很多熟人，有廖梦醒、柳无垢、魏璐诗、王安娜，以及他在武汉时看到过的博西克医生（B. Borcic）。随后，贝特兰翘首以盼的宋庆龄到了。贝特兰看到她比以前瘦了，两颊塌下，但是双眼还是和以前一样平静而忧伤。



靖江路45号宋庆龄寓所

当天傍晚，他应邀来到宋庆龄位于靖江路45号（今桃江路45号）的住宅做客。宋庆龄给他看了一些孙中山遗物，这些遗物刚刚从南京取回来，它们在战时被日本人从莫利爱路寓所掠走，交给汪精卫手下的汉奸保管。宋庆龄给贝特兰看了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孙中山大元帅指挥刀等。她告诉他，准备把莫利爱路寓所交给国家作为孙中山纪念馆。



1924年4月2日孙中山书赠宋庆龄的《国民政府建國大綱》册页（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孙中山 1922 年北伐时用过的大元帅指挥刀（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宋庆龄请贝特兰喝咖啡，吃“世界上最好的”哈密瓜，听他讲日本的情况。那种十分熟悉的明亮、热情、平静、温和的精神，又让贝特兰感受到了内心的安宁。最后她说：“现在你要回到你的国家去，但是我知道你会回到中国，因为战斗是在这里进行。这次战争不取决于日本战败。在中国这里，还有印度，要为未来进行多少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无论要多少时间，人民将会胜利。”

## 六、重返中国

宋庆龄和贝特兰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并请他协助中国福利基金会聘请新西兰医护人员的工作。而他们再次相见已经是十年之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了。1956年4月底，贝特兰率领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来华访问，在接受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并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之后，来到了上海。





1956年4月30日，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应邀来我国参加“五一”观礼的各国来宾。贝特兰也身在其中

5月15日，星期二，上午，这时已经是上海市副市长的老朋友金仲华来电提醒贝特兰与宋庆龄的午餐约定。贝特兰怎么可能忘记呢，思绪又把他带回到香港岁月。在香港，每次宋庆龄约他去家中吃饭，都会派宋子文司机开着宋子文那硕大的防弹车来接他。当贝特兰坐着锦江饭店派给他的车到达淮海中路宋庆龄寓所时，在门口站岗的卫兵向他敬礼，两名卫兵微笑着为他打开了大铁门。贝特兰手捧鲜花往里走时，宋庆龄迎面而来说：“你终于来了。”

“无论是春天的俏还是夏天的美，都没有秋天的这份优雅。”这是贝特兰在看到十年未见的宋庆龄时在心里默念的诗句。

宋庆龄带贝特兰参观自己的家。贝特兰看见客厅里挂着孙中山肖像，还有一副现代印度木画；餐厅里，宋庆龄向他介绍一副中国妇女肖像画说：“我母亲。一位巴黎艺术家为我画的。”



上海宋庆龄故居餐厅一角

上方为宋庆龄母亲倪珪贞的油画像

金仲华已经先贝特兰到了，不久耿丽淑和谭宁邦也一起到来。

餐桌上，宋庆龄举起酒杯说：“我们必须干杯，这是一种格鲁尼亚葡萄酒，它是有历史的。毛主席去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想给他一份来自他家乡的特别礼物，于是，他把这种酒给了他。毛主席给了我一些。很高兴我还剩下这一瓶酒，为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干杯。干杯！”

午餐后，宋庆龄邀请大家去花园喝咖啡。贝特兰忽然想起自己跨洋过海带来的礼物还放在门厅处，他赶紧去取来，交给宋庆龄。“啊，我最喜欢的利口酒！”宋庆龄看到自己最爱喝的甜酒高兴不已。



上海宋庆龄故居主楼外景



上海宋庆龄故居过道厅



上海宋庆龄故居客厅



上海宋庆龄故居客厅



上海宋庆龄故居餐厅



上海宋庆龄故居花园

室外聊天随后因雨改为室内。贝特兰看了宋庆龄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亚洲三国的纪录片，宋庆龄对他说：“我上次出国访问是很辛苦的工作——有那么多安排，剩下的休息时间太少了！当然，任何有助于睦邻友好的事情都必须做。我认为这些访问确实有帮助。但当我从巴基斯坦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

“宋庆龄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带着对宋庆龄的无比崇敬，贝特兰在依依不舍地告别时说：“一定要照顾好您的健康，您对中国很重要。”宋庆龄回答他：“重要的是人民！”



贝特兰在宋庆龄上海寓所花园同宋庆龄、耿丽淑一起喝咖啡

贝特兰与宋庆龄约定的下一次聚会一直没有到来。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贝特兰来到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吊唁，沉痛哀悼宋庆龄逝世。1982年，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基金会在北京成立，由邓小平任名誉主席，廖承志任顾问，康克清任主席，贝特兰是理事之一。1993年8月24日，这位宋庆龄终生挚友、一直致力于新西兰与新中国友好事业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病在新西兰去世。

##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王安娜 保卫中国同盟在汉口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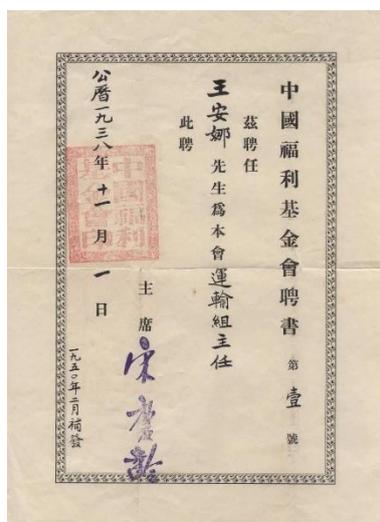
朱玖琳



\*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王安娜

1950年2月，德国友人王安娜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发出的“第壹号”聘书。这是补发证书，聘任时间是保卫中国同盟时期的1938年11月1日，聘任职务是“运输组主任”。

事实上，保卫中国同盟当年还没有运输组，常伴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寥寥数人，但是，正是王安娜为保盟物资运输打通了关卡，并长期从事保盟及其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物资运输和对外联络工作。物资运输和对外联络是保盟的核心工作，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王安娜特殊的经历和她特殊的身份有关。



\*中国福利基金会补发给王安娜的“第壹号”聘书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Anneliese Schwarz），1907年9月20日出生在德国前西普鲁士省（二战后划归波兰）但泽市附近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在一战中阵亡，母亲靠政府抚恤金维持一家人生活。童年的经历养成了安娜利泽勤奋独立的性格。中学毕业后，她先后就读于 Königsberg 大学（现属俄罗斯）、Greifswald 大学、柏林大学及奥地利的格拉兹（Graz）大学，在格拉兹大学取得历史哲学博士学位。



\*大学时代的王安娜

在柏林求学期间，安娜利泽与在柏林读书的王炳南相识。王炳南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书记，1932 至 1933 年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担任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国际反帝大同盟的东方部主任。安娜利泽与王炳南在思想上有很多共同点。她也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参加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活动，曾经两次被捕，于 1933 年 3 月离开了她在柏林供职的普鲁士国家档案馆档案资料出版部。1935 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婚，安娜利泽取中文名字王安娜，加入中国国籍，领了中国护照。



1935 年，王安娜与王炳南摄于柏林

1936年2月，王炳南收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知，要求他回国做杨虎城工作，于是带有特殊使命的王炳南偕安娜由柏林经莫斯科回西安老家。安娜自此开始了她“嫁给革命的中国”的生涯，直至1955年回国。



1936年，杨虎城将军和王炳南在西安

1937年3月，王安娜在上海结识了对她的一生有决定性影响的宋庆龄。从1938年开始，直到1955年，王安娜和宋庆龄一直保持合作，和宋庆龄的亲密交往对她来说“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漫长的岁月里，她对宋庆龄的尊敬和仰慕“与时俱增”。

## 一、结识宋庆龄

1936年9月，杨虎城赴沪治牙病，随即召王炳南来沪，王炳南不忍留即将临盆的妻子一人在西安，于是偕王安娜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他们曾租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不远处就是宋庆龄寓所。安娜也确实曾上门求见，但那时她对宋庆龄而言是一个陌生人，宋庆龄并没有准见。

杨虎城离沪后，王炳南陪伴妻子在上海迎来了他们的小宝宝王黎明，这一天是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日子。10月上旬，勤奋的安娜不顾即将临盆，去看望了病入膏肓的鲁迅，告诉他正开始把他的《祝福》等作品译成德文。鲁迅给她看了珂勒惠支的版画，还邀她再来一次，介绍她认识一些青年作家。可是，这个意愿未能实现。



\*1937年，王安娜和王黎明

11月，王炳南被杨虎城急电召回西安。西安事变爆发后，安娜不愿意袖手旁观，她决定突破难关到西安去。12月31日，冻僵了的安娜带着2个月的宝宝抵达了西安。当天晚上，她与史沫特莱初次见面。安娜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史沫特莱用温暖和热情来款待她的夜晚。史沫特莱用戏剧化的语言、连讲带比划地向安娜描绘了西安发生的一切，她把自己的毯子和厚衣服送给安娜，还为安娜的宝宝换尿布，她就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欢迎安娜的到来。



\*1937年，王安娜（右一）、王炳南（右二）在西安

在西安，安娜继史沫特莱、贝特兰之后，通过XGOB广播电台向世界播报西安的真实消息。她还由史沫特莱带着，一起去西安郊外拜访红军。那是安娜初会红军，她看到红军战士非常疲惫，明显的营养不良，但是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空虚和绝望的表情。红军战士对她说：“参加红军，就是走上幸福生活之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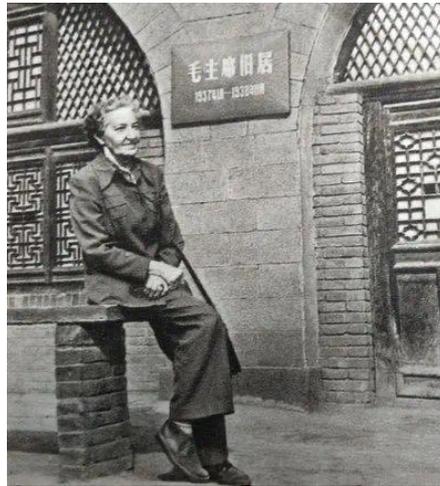
史沫特莱去延安后，给安娜来信邀请她也去。1937年3月，安娜来到延安，跟史沫特莱同住一个窑洞。在延安，她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结识了彭德怀、贺龙、林彪，见识了居住条件最好的李德窑洞，还见到了三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在他们口中，安娜了解到红军长征许多详细的情况。她认识到，



“红军幸存的主力部队，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的考验，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了钢铁战士。”



1937年，王安娜（右一）、史沫特莱（右二）在延安



1979年，王安娜重回延安，在毛主席旧居前留影

不久，王炳南来电，要安娜尽早返回西安同往上海。在即将离开延安时，廖承志来访，他说请求安娜替他带一封信给住在上海的母亲何香凝报平安，他已经多年没有和她通音讯。他说：“母亲和孙逸仙夫人是好朋友，她现在也住在上海，我想您一定会见到她的。”



长征后到达延安的廖承志

1937年3月，安娜偕子随王炳南移居上海后，将廖承志的家信送到了何香凝手中。何香凝含泪感谢安娜给她带来爱子的信息，而安娜对她则不能不表示更深的谢意。因为她使安娜认识了影响安娜一生的宋庆龄。

在何香凝的引荐下，安娜终于见到了宋庆龄。初次站在宋庆龄面前，她和所有人一样惊叹宋庆龄的美。不久，她也成为《中国呼声》的大力支持者。这份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力发声的英文出版物，是在宋庆龄的支持和协助下创办的，安娜给予了杂志“一切可能的帮助”。



1930年代，宋庆龄与秘书黎沛华在莫利爱路寓所

## 二、香港重聚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安娜迅速投入上海人民的抗敌活动，她参加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参与发行外文宣传资料，定期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的活动，并和王炳南一起用德语对外播音演讲，向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活动。

## 外國語

### 播音時間更改

本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宣委會、對於國際宣傳，不遺餘力，除編印宣傳小冊及畫刊外，復於每晚九時零五分起至十時止，舉行外國語播音演講，該項演講，自九月初開始以來，迄未間斷，茲悉該會為調整節目起見，自昨日起，更正播送時間，每星期一至星期六下午五時三十分至五時四十五分為英語演講，由吳繼熊、劉湛恩、溫源壽、戴森、張素民、徐潔、及徐潔夫人等擔任，下午五時四十五分至六時，星期一四為德語演講，由王安娜女士及王炳南先生擔任，星期二五為俄語演講，由王子均與趙德厚先生擔任，星期三六為韓語演講，由韓人某君擔任，日語演講則於每日下午六時四十分至七時舉行，星期日亦照常播送，法語演講則於每晚九時零五分至九時十五分舉行，由王亞微、王錫民、二女士及王遂徵先生擔任，星期日停止播送，在上項規定時間，本市各華人電台，將一律放送，凡本市外僑及日本朝鮮馬尼刺南洋羣島等處，均可收聽。

1937年11月3日，《申報》對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宣傳委員會的報道

在上海，安娜結識了7月份剛剛從新西蘭回到上海的路易·艾黎，兩人走遍了淞滬抗戰後的大街小巷。他們穿過日占區充滿死亡和恐怖的街道，也走進了陰暗簡陋的楊樹浦貧民窟。艾黎告訴了她什麼是包身工、女工們的生活有多么悲慘。

通過艾黎，安娜在上海又見到了老相識斯諾。1936年6月，斯諾手持一位德國著名漢學家為他寫的介绍信找到王安娜，請安娜為他去延安採訪提供幫助。和斯諾一起去延安的馬海德，還為重病的王炳南治了病。

在上海，朋友們聚在一起談論如何改變中國的現狀。大家討論得出的結論是組織工業合作社。



\*1937年，王安娜與路易·艾黎（左）、埃德加·斯諾（右）在上海



1937年，王安娜（右三）、海伦·斯诺（右五）、路易·艾黎（左一）与在国际伤兵医院服务的童子军、部分伤兵合影

年底王炳南去临时首都汉口为周恩来工作，他给安娜来信说：“我与周恩来曾谈起你，他说，你在上海的工作很能起作用，现在还是留在上海的岗位为好。”

1938年6月，安娜终于获准可以去汉口。经过香港时，她来到嘉林边道宋庆龄寓所与宋庆龄重聚。正是在宋庆龄寓所，是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刚刚正式宣布成立。于是，诚如王安娜所言：“我从保卫中国同盟创建起时便是它的成员。”保盟后来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王安娜也曾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



1938年夏，宋庆龄在香港

### 三、保卫中国同盟汉口代表

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一员，王安娜与宋庆龄就到汉口接受任务的问题商谈过多次。因为保卫中国同盟支援中国红十字会位于长沙的救护训练所，安娜在汉口的任务是把红十字会的活动情况报告给保盟。任务确定后，安娜才启程去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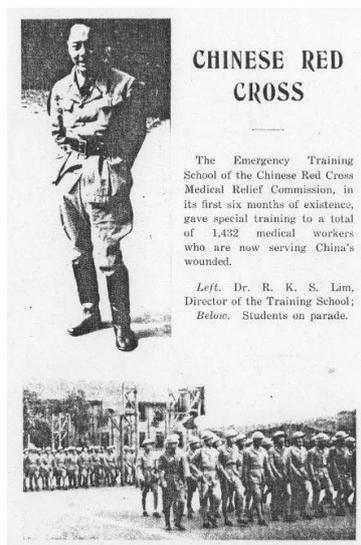
1938年7月，王安娜乘坐的飞机在空袭警报声中降落在武昌机场。一家人在汉口团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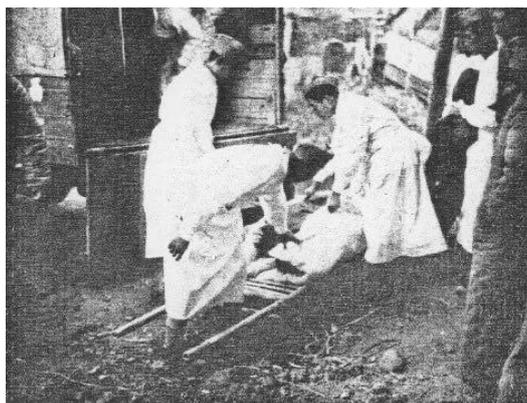
1938年，被轰炸后的武汉

因为安娜和宋庆龄约定，要尽快把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以及伤病员和难民问题的有关报告送给保盟，所以，她决定参加前线访问团去现场考察，为她的报告收集真实的资料。

前线访问团由史沫特莱、史迪威、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协助艾黎工合工作的英国青年乔治·霍克以及王安娜本人共5人组成。一行人在8月上旬启程。他们坐火车来到长沙，访问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倾听总队长林可胜和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处长卢致德谈他们的工作和困难。林可胜告诉他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训练所“最初培养的几批医疗小队，在前线都表现得很出色。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负了伤，”损失不小。一行人随后经南昌来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伤员收容所。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地狱图。



《保卫中国同盟1938-1939年报告》刊登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训练所所长林可胜照片及学员在操练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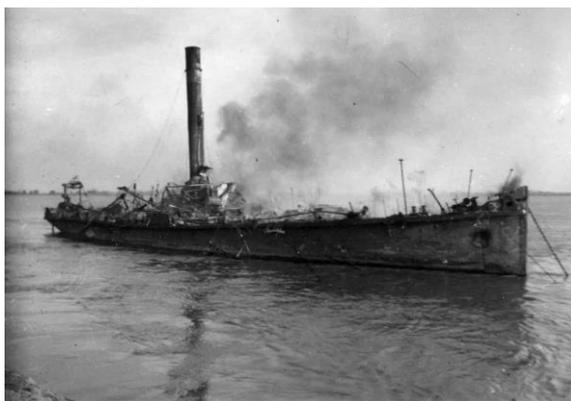
《保卫中国同盟 1938-1939 年报告》刊登的中国红十字会一医疗小队在前线运送伤兵的照片

在归途中，在他们的再三坚持下，他们的司机终于允许 5 名疲惫不堪的伤兵搭车同行。史迪威说：“比起汉口那些高谈阔论的家伙来，还是这些农民的子弟能勇敢地保卫祖国！总有一天，他们的权利会恢复，他们会受到平等的待遇。”



1938 年 8 月，董必武、叶剑英等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卡尔逊时合影。前排左起：王安娜、卡尔逊、叶剑英、陈家康；后排：董必武、凯丰、李克农

9 月，日军开始逼近武汉，安娜忍痛接受丈夫的意见，送别奶妈和孩子回丈夫老家。武汉陷落日益逼近，国民政府已移往重庆。10 月 23 日，夫妇俩坐上八路军办事处租用的“新升隆号”轮船撤离，同行的还有正准备回国途经武汉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他们在李克农和边章五的带领下出发了，但是在出发第二天便遭遇到生死之劫。24 日，王安娜等人跟着李克农上岸进村休息，跟他们上岸的还有随身保管藏有机密文件和所有人路费的小皮箱的赵世炎烈士夫人夏之栩。一行人出村回船时，日机出现，“新升隆号”被炸毁，日机随即疯狂扫射落入水中和在岸上四散奔逃的人群。王安娜一行人因为有李克农沉着冷静的指挥，在日机扫射下逃过一劫。



\*被炸毁后的“新升隆号”轮船



\*转战途中到农村与农民交谈。中坐者为李克农，左边的外国妇女为王安娜

全船三分之一的幸存者在李克农带领下，历经艰苦终于来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先行抵达的周恩来的热烈欢迎。李克农带领大队人马继续南下，三天后抵达衡阳。一到衡阳，他们就听说长沙已被有组织地夷为平地。11月16日，当周恩来等人冲出长沙大火，撤退到衡阳时，李克农已经奉命在衡阳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2月3日，周恩来先行坐飞机撤退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他邀请王安娜和琼·尤恩同行，但是二人坚持不离开大部队。



\*1938年11月，李克农率一行人抵达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后留影。前排右起：王安娜、琼·尤恩；后排右起：王炳南、李克农、夏之栩、边章五、李延禄等

不久，王安娜一行人也来到桂林。在他们抵达桂林次日，周恩来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安娜。他对安娜说：“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的意见稍为有些变更。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 X 光透视机，已经抵达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印度支那（即中印半岛，时为法国殖民地）才能运去。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1938 年，周恩来在武汉

#### 四、打通物资运输线

1938 年 12 月中旬，周恩来乘飞机前往重庆之前，将广西龙州区民团总指挥官李新俊介绍给王安娜。安娜同李将军一起乘车出发，三天后抵达位于广西南部的龙州，并在李将军帮助下得到了进入中印半岛的入境许可。发现海防海关法国政府官员对中国人百般刁难后，对完成任务忐忑不安的安娜在海防坐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在香港，安娜住在西摩道 21 号保盟办事处，她对宋庆龄说她想尽快去上海。宋庆龄亲切地对她说：“上海也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做，到了那边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了。等你再回到香港时，我们一起到海边去作几次愉快的远足。”





香港西摩道 21 号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

1939 年 1 月，安娜来到上海，她在上海停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保盟上海分会成员的商谈上。他们谈到了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保盟上海分会急于知道沦陷区最需要的救援物资是什么，在上海已收集到的物资如何运往内地。为了提高上海分会的工作效率，安娜被邀请给几个志愿做这方面工作的小组谈谈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回到香港后，安娜经常和大家商洽她到中印半岛的工作。3 月 11 日，满载 5 辆卡车的援助物资由两名英国医生哈利·泰博特（Harry Talbot）和保罗·杜汉（Paul Dohan）负责用船从香港运往海防。



\*1939 年 3 月 11 日，宋庆龄在司徒永觉夫人和诺曼·法郎士的陪同下，上船查看救援物资。远处二人为王安娜和哈利·泰博特

在海防，两位英国医生去海关交涉，但毫无效果，甚至他们乘坐的开往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救护车，海关也不放行。打通海防海关的任务十分艰巨。安娜在香港爱国名媛、为支援抗日志愿工作的年轻姑娘李安西（笔者注：李安西时去贵阳任林可胜秘书，贝特兰 1939 年夏在贵阳见过她，她后任端纳秘书，协助端纳整理回忆录。）陪同下启程去海防，同行的还有 20 名新加坡华侨，他们向保盟提出志愿担任滞留在海防的卡车的驾驶员。李安西为安娜做翻译。



\*1939年3月11日，在装有满载救援物资卡车的船上，宋庆龄与王安娜等人合影。前排左起：王安娜、哈利·泰博特、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李安西；后排左起：诺曼·法郎士、保罗·杜汉

分手时，宋庆龄对安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宋庆龄的推理被证明是正确的。让在海防海关空等两周都没有结果的泰博特医生很不服气的是，安娜一出面就解决了难题。在海防海关，看到来的是一位“柔弱”的漂亮女性，又听到这位女性说的是德语，那些来自德法边境地区会说德语的法国官员态度就越发亲切起来。安娜借着自己的性别和语言优势，立马就办好了所有通关手续。次日，安娜便带着车队取道河内、东丹，以最高速度驶向中国国境。一到龙州，安娜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电报，要她立即回海防去，新的待运物资又到了。此后数周内，安娜频繁往返，这使她在广西南部一带成了知名的“王太太”，各方都来求她帮忙通关，但光是给保盟和八路军办运输就够她干的了。



\*1939年3月22日，法国在越南海防的政府颁发给王安娜的过境临时许可证

1939年4月，安娜直接从昆明乘飞机去了重庆。

## 五、保卫中国同盟重庆代表

在香港时期，安娜同宋庆龄谈论过她到重庆以后的工作。宋庆龄反复向她说明得到国际和平医院等保卫中国同盟支持的许多项目的情况报告是如何的必要，她答应宋庆龄会尽早去华北前线，“这是因为来自华北前线的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太少了”。

1939年5月，周恩来回到重庆，他给安娜布置了新的任务——往贵阳接收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助物资，同时还要与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商谈今后的合作。借此机会，安娜准备跟林可胜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向他说明她已任保盟驻重庆的代表。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留影

为此，周恩来特地给了安娜一张以“八路军少校”为头衔的军用通行证，这使得安娜成为了八路军的第一位女少校。周恩来说：“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往华北前线去会有帮助。”

在贵阳，安娜的主要工作是担任“西班牙医生”的联络人，给他们送书报，把他们的报告交给保盟或交给为支援他们而献金献物的外国组织。



王安娜在抗战时期的各种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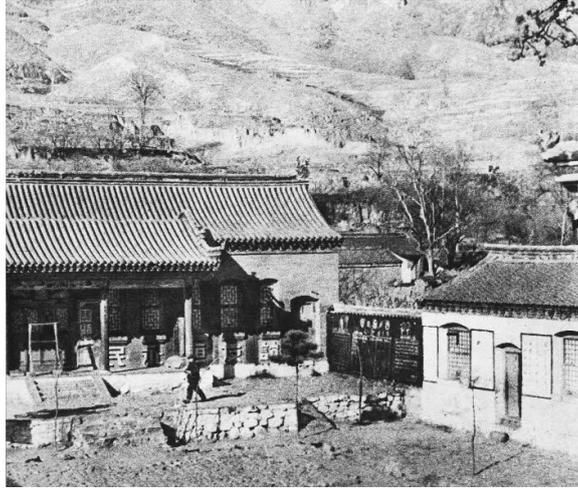
1939年6月，安娜在重庆收到宋庆龄来信，再次叮嘱她依约行事。周恩来也劝安娜尽快去华北，因为进入八路军地区的困难与日俱增。已经有人听说，往延安去的学生们遇到了国民党的封锁及其他的障碍。保盟的工作需要真实的、生动的材料，周恩来因而想尽办法给安娜收集了许多资料，用以说明共产党支配地区的社会施设和文化施设。安娜把这些资料译成英文寄给宋庆龄，但是这些材料仍然不足，而且有些单调。

为进入华北敌后根据地，安娜经历了很多危险。在包围圈中，她白天休息，夜间行军。在黑夜中，她穿过深山峡谷，在悬崖峭壁上夜行军，身上长了虱子。在战士掩护下，穿过日军占领下的铁路线后，安娜终于来到八路军师部。她用法语采访了聂荣臻，了解了边区“豆选”制度、减租减息制度，以及工农组织和妇女组织。



1938年9月25日，白求恩与聂荣臻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采访

访问白求恩大夫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是安娜此行的目的。即将开拔前线的白求恩大夫带她参观模范医院——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她讲述缺医少药之苦。安娜向白大夫保证保盟一定会把必需的医药物资调配给他。



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旧址

安娜把八路军卫生队的广泛活动，以及它所发挥的卓越的能力等详细情况综合起来，与急需的医药品清单一并送交保盟和宋庆龄处，但这些药品未能运到，白求恩大夫白等了一场。



\*1939年9月初，在重庆，王安娜陪同尼赫鲁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中共在重庆代表博古和叶剑英

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联袂乘飞机由香港来到重庆。宋庆龄坦率地对安娜说：“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在这里，当展品。”



1940年4月25日，宋氏三姐妹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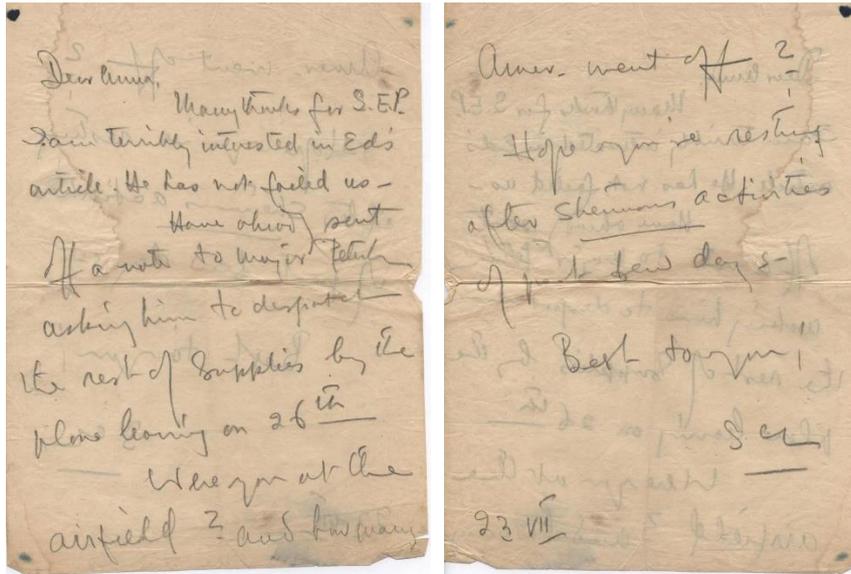
回到香港后，宋庆龄给安娜来信说：“实际上是政府阻止这些医药用品的输送。家丑不可外扬，难道我们能够对外国朋友说明这个情况吗？我本来还没有下决心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不过，连英国救援机构的成员都被政府阻挡不让通过封锁线，我怎么还能瞒得住呢？”5月30日，宋子文辞职。6月15日，保盟中央委员会在《救济工作与政治——答宋子文先生》一文中彻底揭露道：“在外国红十字会和救济基金会目前送到中国的大批物资中，没有一点到达他们访问过的那些重要作战地区的前线。”

此后数年间，保盟事实上停止了设法把药品送到医院去的努力，外国为医院募集的捐款，只交给驻重庆的八路军代表部门。

## 六、与宋庆龄的密切合作

1941年12月10日，宋庆龄在香港沦陷前，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来到重庆。自此，安娜与宋庆龄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一直到1955年。

宋庆龄初到重庆时，安娜是她时时见面的唯一的旧相识。在保盟前委员会驻重庆代表王安娜的帮助下，宋庆龄开始在重庆重建保盟组织。她们设法和国外接上关系，并采取措施确保保盟在各地的援助项目能继续获得援助。这些机构有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



\*1942年7月23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请她联系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临时负责人帮助运送给延安的物资

1942年8月3日，廖梦醒应周恩来要求，来到重庆帮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8月6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告知她准备改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到8月中旬，保盟在重庆已经集合了足够数目的委员，可以正式重组一个中央委员会了。8月14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说：“在写信时，爱泼斯坦应以改组后的保卫中国同盟执行书记的名义署名。你作为司库，梦醒作为办公室中文秘书。这是我的建议，我希望你们都会同意担任这些职务。”



\*1942年，王安娜（左二）、周恩来（左三）、王炳南（左四）、龚澎（左五）与外国朋友在一起

保盟正式恢复了工作，而固定在保盟办事处——宋庆龄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寓所工作的，总共也只有宋庆龄、廖梦醒和王安娜3人。

对于这段日子，安娜回忆道：“这时，我与孙夫人虽然经常见面，但几乎每天我们总还是习惯交换长函短柬。她还常常让用人给我送点儿使我欢心的小东西，比如在重庆弄不到的一点儿美食，这是她出席豪华宴会时，悄悄地为我藏起来的，或者给我的儿子一件玩

具，等等。”“我们常常在重庆南面的群山之中散步。”在被人认出来后，安娜就在宋庆龄身后保护住她，“怕她被发狂般聚集而来的群众挤坏了。”



\*1944年，王安娜与李公朴（左一）、茅盾（左二）、爱泼斯坦（右二）、章汉夫（右一）等在重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了，曾经共生死的王炳南、王安娜夫妇二人却因为各种原因决定暂时分手，分开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恢复夫妇关系。



\*王安娜和王炳南、王黎明在重庆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王炳南将他们从机场接到曾家岩桂园，他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期的秘书。9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桂园举行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的茶会，安娜陪伴宋庆龄出席。





1945年8月28日，王炳南在机场迎接毛泽东



\*1945年9月8日，王安娜陪同宋庆龄进桂园

1945年11月8日，宋庆龄返回上海，因为原莫利爱路（时为香山路）寓所已无法居住，遂直接入住靖江路45号。安娜随即也追随她来到上海。

宋庆龄在上海开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后，王安娜和廖梦醒、魏璐诗一起，成为宋庆龄身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儿子黎明也与乔冠华、龚澎一起从重庆乘马歇尔专机来到了上海。



\*王安娜与儿子黎明在上海。左一为王安娜助手、中国福利基金会职工王成根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迅速扩展，队伍也逐渐扩大，王安娜又忙得快飞起来了。1946年，王炳南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工作时，有几次来上海与宋庆龄商讨一些事情，与王安娜曾在宋庆龄香山路寓所相见。1948年夏，宋庆龄搬回香山路寓所居住，她邀请安娜来做客说：“希望你能过来团聚一次，正如你和炳南曾在这栋房子再见面时，你们称作的那种团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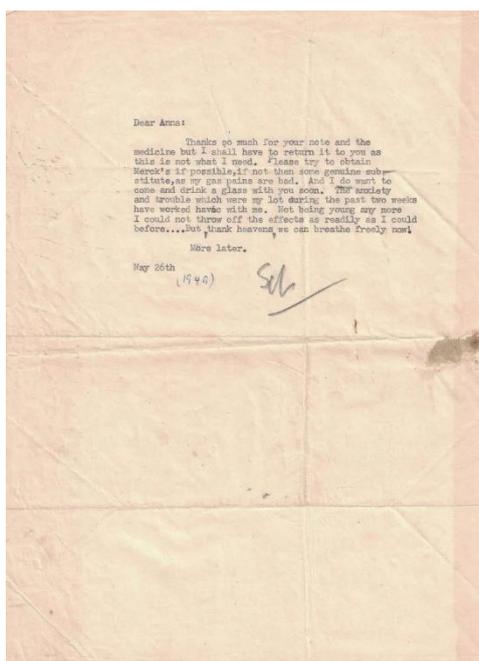
####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hina Welfare Fund

Madame Sun Yat-sen, Chairman.  
Personnel in the China Welfare Fund Headquarters—86 Kwang-tung Lu, Shanghai.

Gerald Tannebaum Executive Director	Wang Hai-ching Accountant
Sylvia Powel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Cynthia Lee Local Field Work
Portia Koo Children's Work, Chief	Anna Wang Shipping-receiving

1947 至 1948 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广东路 86 号总办事处人员名单。运输组：王安娜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宋庆龄在给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宋庆龄 1949 年 5 月 26 日致王安娜函



\*1949 年 9 月，王安娜陪同宋庆龄在北平会见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左一）、副秘书长熊瑾玠（右三）、业务主任林仲（右二）、医疗顾问马海德（右一）。左二为宋庆龄在北平时秘书曾宪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由于工作转型，中福会不再需要外籍人士专门从事海外募捐和物资运输管理，王安娜暂时被借调到北京工作。为了表彰王安娜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成员所做的大量工作，当他们首次从上海到京时，周恩来专门为他们举行了庆祝会，董必武、聂荣臻、杨尚昆等领导也前去祝贺。



\*1949年7、8月间，在北平共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事宜。王炳南（左一）、李德全（左二）、刘宁一（左三）、王安娜（左四）、艾乐思（左五）、周恩来（中后）、李效黎（右五）、康克清（右四）、熊瑾玠（右三）、聂荣臻（右二）、董必武（右一）；后排站高出头者为杨尚昆，其身前为苏井观、其身右为伍云甫、马海德；王炳南身后为林迈可，王安娜身后戴眼镜者为王荫圃、李德全身后为柯柏年，刘宁一身后为林仲，最高个者为谭宁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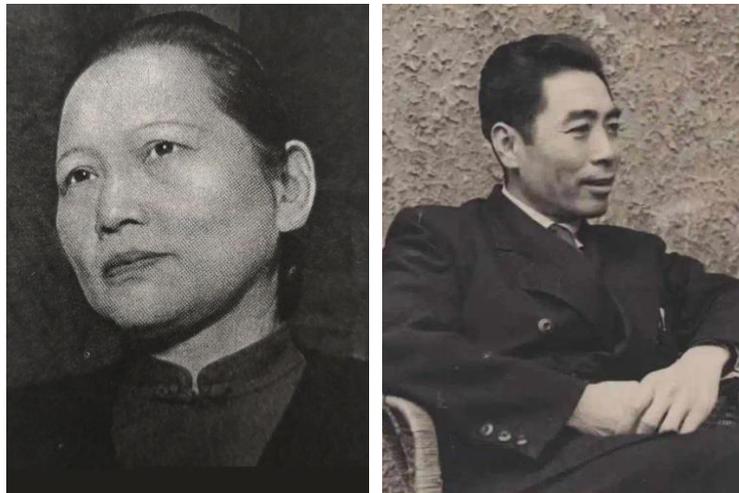
\*1949年10月，上海市军管会给王安娜发放的通行证

1955年，离家20年的王安娜回德国定居。安娜回国后，与宋庆龄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宋庆龄也关心着王安娜留在中国的儿子王黎明，并时时在书信中告知。王黎明后于1978年赴德国与母亲团聚。王安娜曾于1959年和1979年来华，与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老朋友相见。



1960年8月，宋庆龄与王黎明、罗叔章（右）、柳无垢（左）在北京西河沿8号（今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纪念馆）寓所合影

1981年6月3日，正当宋庆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时候，治丧委员会成员、时任德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的王安娜在德国家中收到了宋庆龄临终前寄来的最后一个邮件——刚刚出版的《中国建设》杂志。王安娜百感交集地凝视着宋庆龄病中颤抖的笔迹，向前来采访她的记者指出：宋庆龄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伟大政治女性。



\*王安娜在德国寓所书房内摆放的宋庆龄1946年在上海、周恩来1946年在南京的照片

文中所有注\*的照片为王安娜之子王黎明先生提供

##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爱泼斯坦 保卫中国同盟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沈海平



1938 年爱泼斯坦在香港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共有 278 名个人和 22 个集体获此殊荣。1957 年加入中国籍，196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名列其中。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昵称艾培（Eppie），1915 年 4 月 20 日出生在俄属波兰一个革命的犹太人家庭，父母因为参加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遭到追捕和流放。他 2 岁时随父母流亡到中国，后在天津定居求学。家庭浓郁的革命气氛，父母的进步立场和社会主义观点给他打下深深的烙印。他在不满 15 岁时即入职天津一家俄文日报《晨报》，开始了记者生涯，负责将路透社及其他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稿译成俄文。不久，又受《京津泰晤士报》主编的聘请，进入该报社工作。



1920 年与父亲在北戴河度假



1929 年与母亲在天津

1933 年与埃德加·斯诺的相遇，改变了艾培的人生轨迹。在斯诺的引荐下，他阅读了毛泽东、宋庆龄和鲁迅的文章，认识了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与爱国学生运动有了联系，为进

步刊物撰文……艾培从此投身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开始了与中国革命缘分。结识宋庆龄后，艾培长期在宋庆龄领导的机构中工作，他们的友谊保持了一辈子。



青年爱泼斯坦

## 一、在斯诺引导下投身中国革命

艾培认为对他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指引他从同情、支持中国革命到走上同中国人民共同奋斗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是斯诺。

1933年，艾培看到了斯诺写的第一本书《远东战线》。书中鲜明的观点和流畅的文笔打动了，于是他发表了一篇书评，同时，主动登门拜访了斯诺。



1934年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的爱泼斯坦

当时，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住在天津的艾培，利用周末专程从天津到北平去拜访。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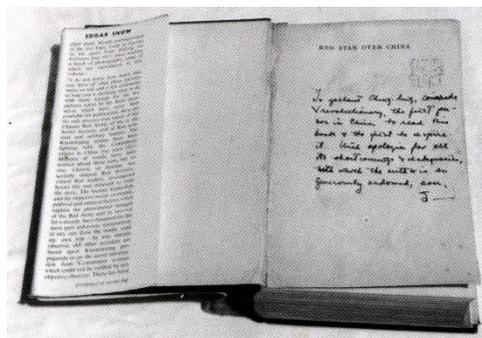
北平一个小四合院里的斯诺家，艾培认识了斯诺夫妇。他们一见如故，成为好友。尽管艾培比斯诺小整整 10 岁，但是他们志同道合。在斯诺家，艾培结识了不少燕京大学的教授，还有不常与西方记者接触的苏联《真理报》记者加特曼，以及热血沸腾的中国青年学生。



斯诺与夫人海伦

以后，北平的学生每逢到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不抵抗政策，中途在天津等候换车时，常会带着斯诺的信找到艾培，在他的住处作短暂休息。

斯诺访问延安后，艾培最先从斯诺那里听他讲述延安见闻，并看到了斯诺拍摄的很多照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出版前，艾培就有幸在斯诺家看到了最初的手稿。斯诺生动地讲述在延安的情况，让艾培大开眼界，也感到震撼。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也萌生了要到延安采访的强烈愿望。



斯诺赠给宋庆龄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不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在斯诺家，艾培读到了目睹这一事件的史沫特莱和詹姆斯·贝特兰给斯诺的信件，这对他也是很大的触动。艾培亲眼见到斯诺夫妇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一方面忙于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和其他文章，一方面积极筹备在北平创办英文杂志《民主》。斯诺邀请艾培为该刊撰稿，并作为编辑部成员出席会议。与此同时，艾培还开始为宋庆龄在上海支持主办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撰稿。





《中国呼声》。1936年，在宋庆龄的支持下，由美国共产党员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创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被日军占领。《民主》杂志的出版工作被迫停止，斯诺全力以赴投入到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沦陷区的工作。同时，也毫不客气地请艾培协助他的工作，包括帮助并护送邓颖超离开北平，前往解放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几天，因患肺病正在北平西山疗养的邓颖超（化名李知凡太太）急需离开疗养所去延安，斯诺便利用外国人的有利条件，带领邓颖超、张晓梅和王世英乘火车到了天津，找到爱泼斯坦，让其负责为邓颖超一行购买去上海的船票，并一路护送。



1981年专访邓颖超

当时，艾培并不知道被护送者的具体身份，只知道是“爱国者”，也就是抗日的，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艾培安排邓颖超一行住进小白楼地区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去买去上海的船票。那时船票很紧张，即使外国人去购买都很困难。购票时对乘船者的盘查也很严。于是，艾培通过自己父亲一个生意上的关系人，设法买到了英国轮船公司的船票，并亲自护送邓颖超一行顺利通过了盘查，登船上路。开船后的第二天，收音机里传来了日军攻打上海的消息，船长宣布不去上海，经烟台后直驶香港，于是艾培便与邓颖超一行在烟台道别。

## 二、加入保卫中国同盟

艾培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1938年8月的广州。当时，艾培担任美国合众社的通讯记者。抗战爆发后，南京沦陷，武汉与广州都受到了严重威胁，艾培正在广州作报道。他目

睹日军每天都对这个城市狂轰滥炸，但是人民没有屈服，始终英勇抵抗。



1938年日机轰炸广州时爱泼斯坦（中间拍照者）在现场采访

8月20日，宋庆龄由香港乘轮船抵达广州。抵粤当日，她便不顾空袭警报尚未解除，外出视察。宋庆龄不仅在广州各地视察，还在广州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呼吁英美停止同日本进行贸易，援助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1938年8月20日宋庆龄视察岭南大学时在孙中山纪念碑前留影（爱泼斯坦摄）



1938年8月21日宋庆龄在随员伍智梅（左二）、马坤（原孙中山副官，右三）、伊迪丝（爱波斯坦前妻）陪同下视察广州医院（爱波斯坦摄）

9月14日，宋庆龄再来广州。这一次，她邀请艾培一起参加了9月17日欢送印度国大党派来的医疗队上前线的活动。9月18日，她参加了广州为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而举行的超过二十万人的火炬示威游行。艾培看到，冒着日军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的危险，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打着火把在夜晚的街道上游行示威，苗条端庄、容光焕发的宋庆龄神态镇定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这一刻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多年后一直把这一天误记为是他第一次同宋庆龄见面的日子。

之后，宋庆龄将艾培等一批中外人士召集到一起商量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宋庆龄告诉艾培，说她早已在《民主》与《中国呼声》杂志上看到过艾培的文章，通过艾培的文章了解了他的观点与文笔，对他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广州沦陷后，宋庆龄即邀请艾培到香港参加保盟中央委员会，任务是编辑机构的机关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那一年，爱波斯坦23岁，是保盟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保盟的骨干成员都是尽义务工作的，包括宋庆龄全都不领取任何报酬。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艾培入职香港著名的英文报纸《孖刺报》报馆，靠在《孖刺报》当编辑维持日常生活开销。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合影。左起爱波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法朗士、廖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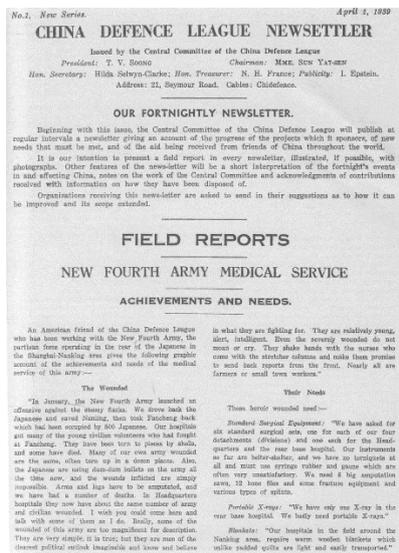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中文版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报人，艾培的编辑思路十分清晰。1939年4月1日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新刊第1期的头条，是艾培写的《我们的两周刊〈通讯〉》。他开门见山阐明了机构出版发行这份刊物的目的、作用和意义。

“从本期开始，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将定期出版《通讯》，报告本同盟倡办各项活动的进展、新的需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朋友的援助等情况。

我们打算在每一期的《通讯》上都登载一份战地报告，并尽可能附上照片。《通讯》的其他篇幅，将简要报道两周以来发生的和对中国有着影响的事件、阐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收到捐赠款物和使用的情况。

收到本《通讯》的机构，请对如何改进本刊和扩大发行量，提出你们的建议。”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新刊第1期

艾培很明白读者希望了解什么，知道如何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战争的危險和前线的困难与需求。因此，他特别重视发布机构主席宋庆龄的观点与立场。《保盟通讯》的第6期刊登了宋庆龄的文章《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第9期刊登了《孙逸仙夫人

致外国团体的信》，第 18 期刊登了宋庆龄的文章《中国·世界和你们》。

虽然，宋庆龄直接给《保盟通讯》写的文章不多，但是她对《保盟通讯》定下基调，就是真实报道，以及给最需要帮助的地区与人们以帮助。50 年后，艾培自豪地说，《保盟通讯》完全符合宋庆龄的要求，特别是通过通讯“表述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在这一斗争中克服种种危险和困难的精神；表述了许多国家的人民在反对他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国际互助热情，尤其是对战斗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前线的中国人民的支持；它表述了宋庆龄在关键的时刻，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桥梁。”



1940 年 7 月 15 日发行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 18 期

艾培认为《保盟通讯》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兴趣，依然具有史实价值，是因为没有空话、套话，内容真实、具体。每期一份的战地报告，坚持让在战地做实际工作的人撰写，是艾培很得意的一招。如让诺尔曼·白求恩写他在国际和平医院治疗伤员的情况，让路易·艾黎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下同——编者注）的基层单位寄来稿件，伊文思·卡尔逊在视察了新四军后写出报告，詹姆斯·贝特兰写了关于他如何运送医药物资从香港到延安的经历等等。这些撰稿人的报告来自现场，是他们亲眼目睹之后的切实感受与体验，加之撰稿人本身的才华与文采，增强了真实感、生动性、感染力。

艾培也亲自采写战地报告。1940 年春他离开香港前往重庆，途中撰写战地报告《突破封锁进入中国》一文，发表在《保盟通讯》第 18 期上，真切讲述了自己历经十多天的艰难颠簸，从香港进入广东韶关的一路见闻与感受，从侧面反映了保盟收到的捐赠物资可以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与重重封锁之下，依然能够通过水路、山路与公路甚至铁路进入抗日的前线与根据地，将反击侵略者所需的物资运抵目的地。





1940年爱泼斯坦在重庆

《保盟通讯》的出版发行，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战胜敌人，使全世界认清中国人民的处境和他们斗争的重要性。

《保盟通讯》的出版发行，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帮助外国援华团体、华侨和海外朋友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推动了海外的援华活动。

其中，艾培的努力功不可没。多年后，宋庆龄在给艾培的信中，对他当年的工作给予了极高评价。

在香港时，你编印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抗日根据地真相，揭露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由于你这些强有力的宣传，我们开始收到各国捐赠给新四军的药品和现款。陈毅因此说，我们给他们的工作以莫大激励。

——宋庆龄 1977年4月25日致爱泼斯坦

除了你真诚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之外，你的那支能干的笔也为我们的工作和人民的事业赢得了外援和理解。

——宋庆龄 1978年5月25日致爱泼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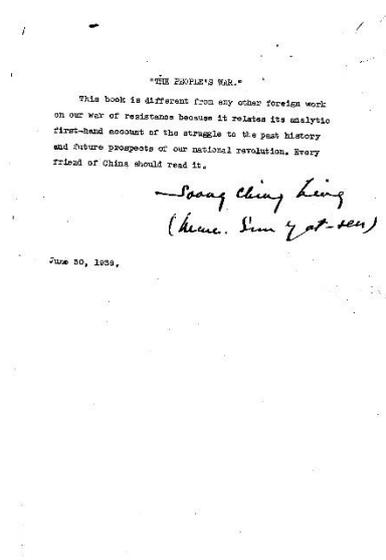
#### 四、翻译延安精选文件

当年在香港，艾培每天从黄昏一直忙到深夜，但丝毫不觉疲倦，还有时间做其他许多工作。他说，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自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艾培除了为保盟做宣传工作外，还为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编辑了一两本小册子。艾培的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也是在那时候问世的。他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头两年抗日战争的情况。此书出版时，1939年6月30日，宋庆龄特地为艾培撰写了推荐说明，称赞这本书“不同于其他国外介绍我们反侵略战争的书。因为它把对我们过



去斗争具有分析性的第一手资料与我国革命的未来发展前景紧密联系起来”。并说：“中国的每一位朋友都值得一读。”



宋庆龄为爱泼斯坦著作《人民之战》撰写的推荐说明

此外，艾培还在同为保盟中央委员的廖承志的主持下，从事中共文件的英文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廖承志交给他翻译的文件是延安精选出来，准备在国际上发布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长篇论著《论持久战》。来自延安的这些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有时从本港，有时从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当时与艾培一同参加翻译的还有同住的唐纳德·艾伦和叶君健。当年他们三人在香港的罗便臣道租住了一套房子，稿件译完后打在蜡纸上，油印出来，分发出去或送到国外去复印。



1938年，香港中外新闻文化界人士在抗日画展合影。左起：叶浅予、斯诺、爱泼斯坦、金仲华、张光宇、丁聪、陈宪铸

后来，他们还挤出时间编辑了延安推荐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英文译稿，并对几期《中国作家》的英文版做了文字加工。他们参加的这些政治文件的翻译工作都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出版物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第一批外语对外宣传书刊的初始。

在香港的这段时间，艾培开始给《纽约时报》投稿，论述中国的新文学艺术。这些文章

发表在该报的“图书评论”版。之后，开始给《纽约时报》写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报道系列，这也是该报第一次刊登有关中国解放区的信息。

## 五、逃出拘留营

1941年12月9日，日军进攻香港的第二天，保盟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让宋庆龄立即离开香港赴重庆做重建机构的准备，其余人在香港做撤退准备，尤其不能让机密资料落入日军手里。

宋庆龄乘坐的是从香港九龙机场起飞的最后一个航班，飞机刚一飞离，九龙机场即被日军的炮火炸毁。九龙被占领后，位于香港本岛西摩道21号的保盟的办公室成了柳无垢及她的父亲柳亚子等一家人的避难所。柳无垢时任保盟办公室的秘书。每天艾培在报社工作完毕后，就冒着隔海射来的日军炮火赶到保盟办公室去帮助柳无垢销毁文件，晚上再返回报社居住。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的办公地点——西摩道21号

艾培原定撤离香港的计划是，先悄悄乔装更名躲进医院，同时在报刊上发布一个记者艾培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中遇难的假消息，之后在中共地下党掩护下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再设法去重庆。谁知，计划只执行到一半即失败，艾培遇难的假消息经报纸传播，令远在美国的艾培父母伤心不已。艾培本已经乔装更名顺利躲进一家医院，并瞒过了日本宪兵的盘查，就等接应者带他离开香港，但日军突然占领了医院，将医院里所有人关进了赤柱拘留营。



香港赤柱拘留营旧址



1942年3月逃出拘留营之后的爱波斯坦

艾培是个极其乐观的人，他一进赤柱拘留营就联络狱友积极设法逃脱，好在拘留营内管束得并不太严，于是，艾培和邱茉莉与另几位同伴历经惊险，竟然划着用各种废弃物制作的小木船，冒死成功逃离了赤柱拘留营。他们先是到了澳门，几经辗转后终于来到了重庆。



2001年12月，爱波斯坦与潘标（保盟通讯员）、邓广殷（保盟中央委员邓文钊之子）等在中国福利会同志陪同下瞻仰在香港保卫战中牺牲的保盟中央委员法朗士之墓

## 六、重庆再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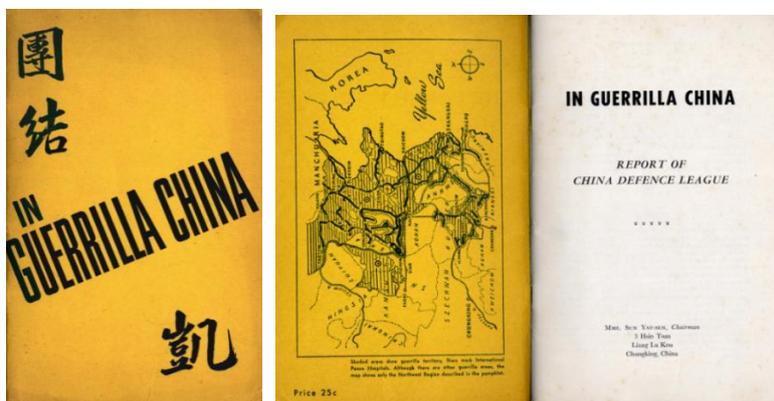
1942年，艾培与邱茉莉几经辗转到达重庆后，与宋庆龄会合，继续为保盟义务工作。

此时，经过生死考验的艾培与邱茉莉在重庆结为夫妇。虽然在战时的陪都比在香港工作难度大多了，但是他们这批重新聚集的保盟成员依然一起在宋庆龄领导下努力为赢得抗战的胜利工作。



1944年，爱泼斯坦（右二）与王安娜（中）、李公朴（左一）、茅盾（左二）、章汉夫（右一）及美国记者（后排左起）休·迪恩、格雷厄姆·佩克、杰克·贝尔登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合影

在重庆时，没有办公地点，只能在宋庆龄的起居室里工作。无法搞到印刷设备，只好托友人在旅行时把稿件带到国外，由国外支持者帮助印刷出版。1943年的保盟年报《在中国游击区》就是在纽约印刷出版的。但是重庆也有比较有利的条件，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都想会见宋庆龄这位世界知名的人物，了解她的主张。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在重庆，即使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与周恩来见面。



1943年出版的保盟年报《在中国游击区》

宋庆龄领导保盟在重庆继续为支持抗日根据地开展各种义演、义卖和宣传活动，源源不断地募集医药物资，并千方百计运抵那里。而艾培与邱茉莉在重庆为保盟所做的主要工作，还是为赢得抗战的胜利而努力宣传与呼吁，传播真实和正义的信息。特别是 1944 年争取到加入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机会后，艾培得以亲临早已向往的革命圣地，看到一个充满生机、朝气蓬勃，有理想、有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看到了人心所向，采访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军队；对这样的根据地进行物质与道义上的支持是正确的，也是值得的。



1944 年爱波斯坦在延安

在延安时，艾培与毛泽东有一次单独的谈话。艾培向毛泽东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并代表宋庆龄就保盟如何向延安提供更有有效的帮助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交给艾培一张所需物品的清单，请他带回去交给宋庆龄。



在延安，毛泽东赠送了一幅有其亲笔签名的石版画像，爱波斯坦一直挂在他的寓所客厅内

在周恩来的窑洞里，周恩来告诉艾培，他利用往返重庆与延安的机会，把宋庆龄募集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以及无线电器材带到延安，一些虽小但十分珍贵的物件——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用线等就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带到延安。

在延安，艾培撰写了大量报道，通过留在重庆的邱茉莉及时发向世界，让被严密封锁的共产党根据地的信息冲破封锁，公之于世。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爱泼斯坦（前排右二）等中外记者

访问延安的经历，深深触动了艾培。他急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写成书，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些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于是艾培与妻子邱茉莉一起到美国（他父母的移居地）生活了五年，撰写出版了《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札记》。其中《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的书名，取自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

## 七、参与创办《中国建设》

1945年至1951年初，为了写书，艾培与邱茉莉到了美国。对于他俩来说，这不过是战斗阵地的转移而已，在美国的五年是他们在逆境中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的五年。他们加入美国援华会，继续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抗战胜利后由保盟更名）宣传、募款，帮助编辑出版《孙夫人的报告》；他们也和其他一些在中国曾经追随过宋庆龄的老朋友史沫特莱、斯诺夫妇、浦爱德、陆懋德、耿丽淑等人一样，加入了“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在美国援华会步入反动逆流后，他们做出坚决斗争，毅然退出，并和耿丽淑等一起另行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



Just heard you are back!  
and hasten to say how happy  
I am!  
With affectionate wishes  
and greetings from Sam  
to Elsie + Eppie.

爱泼斯坦夫妇在北京站下车时从迎接人手中接过宋庆龄名片，名片背面是宋庆龄欢迎他们回到中国的手迹

艾培一到北京，立刻投入了筹备工作。他不仅改稿，还经常撰写文章。艾培写作经验丰富，最难得的是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以及背景有着极深刻的了解和积累，文字修养深，编辑技术高超，有些稿件，往往经他点睛之笔稍作润色，就成了一篇极好的文章。

他作为资深新闻人，对杂志的编排、印刷以及铅字字体的选择，照片的取舍、剪裁，艺术品、工艺品的选择等，都体现出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对刊物、对对外宣传工作的责任心和热爱，使他对杂志投入了全部精力和心血。



1950年代初爱泼斯坦与《中国建设》同事在编辑部四合院内

宋庆龄对艾培的工作很满意。1980年3月22日，宋庆龄来信道：

亲爱的艾培：

我刚读完我们的《中国建设》四月号，觉得它可读性很强，也很有教育意义。取得这样



的成绩，是由于你和全社干部殚精竭虑去实现我们已故总理生前亲自表达的对我们的希望和指示。

杂志在各方面都编得很好。我想它可以成为国外学校里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材。历史细节真实，文字流畅，而且艺术性又这样高！

向你和同志们祝贺！

SCL

字里行间，充满着自豪与欣慰。宋庆龄在高度赞扬艾培为《中国建设》杂志所作的努力之外，还表达了对他俩共同的朋友——周恩来的尊敬与怀念。



197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举行小型招待会，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左起：爱泼斯坦、李伯悌、宋庆龄、罗叔章

对《中国建设》这份刊物，艾培十分热爱。不仅因为他经历了创办阶段，与它一同成长，更因为它是宋庆龄的事业。从担任执行编辑，到总编、顾问，直至生命的终结，他勤勤恳恳为这份杂志工作了一辈子。他认为，这是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也是他自己的事业，是值得为之努力奋斗一辈子的事业。

## 八、宋庆龄最信任的人

爱泼斯坦是宋庆龄最信任的人，是宋庆龄唯一指定为自己写传的人。宋庆龄在晚年曾写过三封信，请艾培为自己写传。用宋庆龄自己的话说是“信任”。

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

——宋庆龄 1975年5月28日致爱泼斯坦

无论如何，我请求你在我死后为我写传记。因为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

——宋庆龄 1980 年 9 月 17 日致爱泼斯坦

我深深地被你的友情和对我的信任感动了，真是思绪千万，百感交集。尤其是我知道曾有多少人要替你作传。

首先，我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我会把我的能力和精力都无保留地投入其中。

——爱泼斯坦 1980 年 9 月 20 日致宋庆龄

我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因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同意为我写传记了。

——宋庆龄 1980 年 9 月 25 日致爱泼斯坦

的确，信任与了解，是宋庆龄选中艾培为她写传的最主要的原因。艾培珍藏了宋庆龄给他的 200 多封信件。200 多封信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宋庆龄与艾培的深厚情谊以及宋庆龄对艾培的高度信任。

艾培是在宋庆龄领导的机构里从创建起就参加，并且工作时间最久的人。从 1938 年至 1981 年，艾培与宋庆龄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共同经历过许多事，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如斯诺夫妇、格兰尼奇夫妇、有吉幸治、杨孟东、路易·艾黎、耿丽淑、马海德夫妇、米勒夫妇、斯特朗、史沫特莱、贝特兰、周恩来夫妇、廖梦醒和廖承志姐弟、邓文钊父子、陈乙明、陈翰笙、陈志昆一家等等。



1980 年 12 月 2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庆祝路易·艾黎 82 岁生日。前排左起：米勒、格兰尼奇、陈志昆女儿陈燕、宋庆龄、隋永清、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克艾文，后排左起：周幼马、李家炽、沈粹镇、杨孟东夫人海伦、杨孟东、格兰尼奇夫人伯莎、陈志昆夫人黄寿珍、陈志昆、马海德夫人苏菲、爱泼斯坦夫人邱茉莉、米勒夫人中村京子、李铁铮、张珏

1978 年，在筹备纪念保盟成立 40 周年之际，宋庆龄曾写信给艾培深情回忆道：“往事如潮，涌上心头。我的心回到了我们在广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你是合众社派出的记

者，专门报道中国事务。我为你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感动。当你同意我的请求到香港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时，我是多么高兴。”“从那以后，许多外国朋友来来去去。为我们工作过，但是，你，亲爱的艾培，是始终被充分信任的。”

在几十年的交往过程中，宋庆龄十分了解艾培的为人与行事风格，特别是对艾培的文字功夫与写作能力，不仅熟知而且欣赏。她知道，艾培的写作态度很严谨，长期的新闻与编辑工作经历，培养了他追求真实与准确的习惯。况且，从他写作并出版的书籍名称就可以知道他所热衷与关注的话题：《人民之战》《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等等，她完全清楚艾培绝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附庸低级趣味。传记到他手里，绝不会写歪。



1980年12月2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亲切会见爱泼斯坦及其夫人邱茉莉

宋庆龄与艾培对新闻、写作与阅读方面都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经常交流阅读心得以及国外最新出版的书刊和知名作家的信息。特别在对外宣传报道方面有着相同的观点，在努力坚持《中国建设》杂志独特的定位与风格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共同探讨与磋商。他们往往为了一篇重要的稿件，反复推敲和修改。宋庆龄也曾多次放手请艾培代拟文章、起草信函、修改润色。特别是他们在共同应对一些造谣诽谤的事件的过程中，曾无数次一起讨论与斟酌，宋庆龄对艾培的文笔、写作风格以及对事物的分析、描述和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了解，完全放心。她也很明白，艾培完全熟悉和了解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路与把握的尺度。



爱泼斯坦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仓库内写宋庆龄传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的习惯，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经常用信件沟通信息。艾培曾应邀在1980年《人物》第3期写了《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一文，事前征求过宋庆龄的意见，完稿后又交宋庆龄审阅，宋庆龄完全赞同，并补充了内容。所以宋庆龄将自己的传记交给艾培写，心中完全有底，非常放心。

艾培没有辜负宋庆龄的嘱托，在宋庆龄逝世后，以十年的心血与努力，完成了宋庆龄传，写出了他心中的伟人。同时，他不仅始终关注着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对外刊物，还关心着宋庆龄创办的机构的发展与壮大。



爱泼斯坦撰写的宋庆龄传记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从1988年后，他担任了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参加一年一度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对每年的工作提出决策建议。对机构遇到的困难，出谋划策，协调解决。每逢参加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他总是习惯地发问，如果宋庆龄主席在座，她会怎么说？她会怎样做？

艾培从不为自己个人的私事向领导开口，但是为了宋庆龄创办的事业发展，他给江泽民主席与朱镕基总理写信，给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写信，还利用每年的政协会议以及总书记、总理每年节庆时前来探望慰问他时的宝贵机会，提出请求，要求对宋庆龄创办的机构与事业多多给予支持和帮助。



1985年4月20日，邓小平热烈祝贺爱泼斯坦70寿辰和从事新闻工作50周年

1990年，艾培获得了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他的确具有与宋庆龄一样的精神，也的确具有与樟树一样的品格。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之际，艾培荣获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称号，实至名归。



爱泼斯坦荣获的“最美奋斗者”证书与奖章

##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史沫特莱 保卫中国同盟编外战友

徐涛



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着红军服留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出身卑微，1892年2月23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特古德（Osgood, Missouri）附近的佃农家庭，9岁时随家人搬迁至科罗拉多的矿区，在此长大。她自幼开始做工补贴家用，当过侍女、烟厂工人、书报推销员，始终没有放弃求学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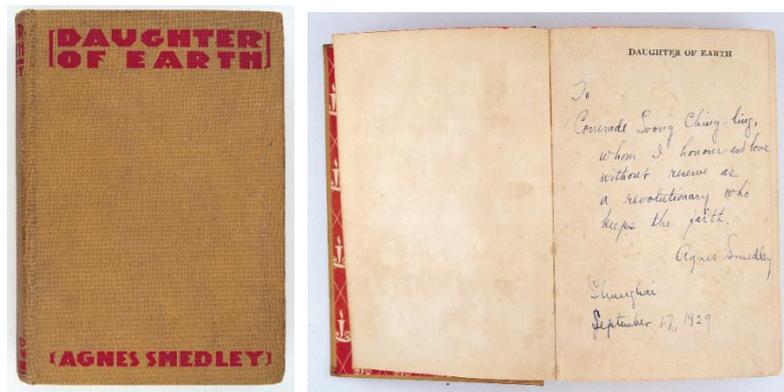
1899年史沫特莱（后排左）家庭合影

1918年，史沫特莱为女权主义先驱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节育运动撰写一些揭露丑闻的政治性报导，并因为帮助组织印度流亡者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被捕入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年代在魏玛德国、30年代在中国，她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作家。



1914 年的史沫特莱

宋庆龄何时何地与时沫特莱相遇目前尚难定论，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两人最迟在 1929 年 9 月之前就已相识。那一年 5 月，宋庆龄因为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关系，专程从德国回国，居住在上海家中，至 9 月 21 日再次赴欧。当时，业已抵达上海的史沫特莱送上了她那本刚刚面市的成名作《大地的女儿》，并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赠词：“送给宋庆龄同志，我无保留地尊重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1929 年 9 月 17 日于上海，艾格尼丝。”这本见证两位伟大女性友情之初的著作，现在仍旧珍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之中。



史沫特莱赠送给宋庆龄的《大地的女儿》（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36 年以后，由于斗争环境和私人关系的变化，史沫特莱没能再像以前那样与宋庆龄同处一地、并肩工作，但她们仍然为了同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业而保持着联系。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上，宋庆龄和史沫特莱共同努力，为缺医少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药品。

## 一、共同营救牛兰夫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史沫特莱与路易·艾黎曾一道实地考察上海多处血汗工厂，到过黄浦江上的码头。在亲眼目睹底层民众生不如死的生活境遇后，路易·艾黎对史沫特莱说：“我觉得好像整个制度都需要改变。”史沫特莱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说：“那就让我们来干点什么改变它吧！”史沫特莱迅速投身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之

中，其积极程度相较她之前参加印度革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1年7月，宋庆龄回国奔母丧。丧事完毕后，宋庆龄回到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家中，收到了史沫特莱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为救一个人（即牛兰，Hilaire Noulens）的生命，希望宋庆龄在百忙中给予5分钟谈话机会。



1931年8月13日旅居欧洲的宋庆龄为奔母丧抵达上海

牛兰夫妇1931年6月在上海被捕，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即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而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组织科负责人，但在当时甚至以后很长时间内一直被误认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



牛兰夫妇在狱中

据陪伴宋庆龄回国的胡兰畦回忆，宋庆龄看过史沫特莱来信后说：“这封信的英文写得很好，这信的英文基础很高深，话没有多少句，语言和用字都很美的。”





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宋庆龄一直关注着狱中的牛兰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吉米。吉米后被接到宋庆龄家中住了几个月，直到苏联来人将他接回苏联。而牛兰夫妇则在 1937 年南京陷落之前，狱卒打开牢门放人后溜出监狱，来到上海。宋庆龄把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中，还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具。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1939 年顺利地返回苏联。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陈列的宋庆龄为吉米出具的身份证书及宋庆龄在家中与吉米的合影

以营救牛兰夫妇为契机，1932 年 1 月 13 日，在中共地下党支持和宋庆龄帮助下，史沫特莱等人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China Forum)，具体编辑交由美国记者伊罗生在上海法租界里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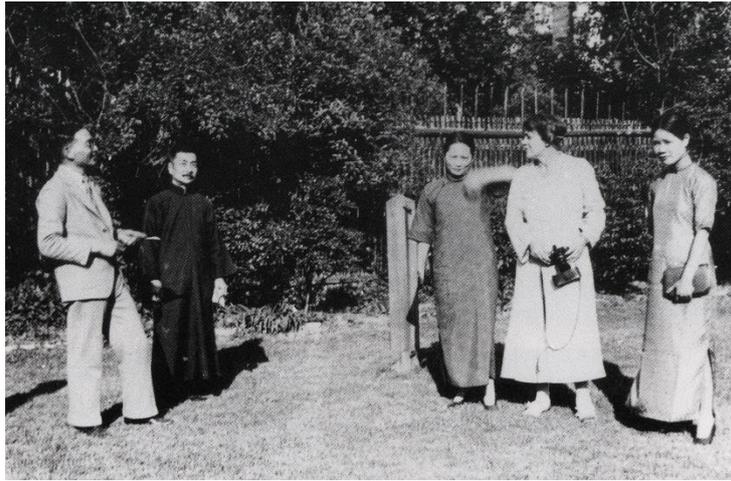
宋庆龄在《中国论坛》上公开呼吁，“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史沫特莱等人用化名在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中国革命。



1932 年 1 月 13 日《中国论坛》创刊号刊登牛兰夫妇自被捕后 7 个月来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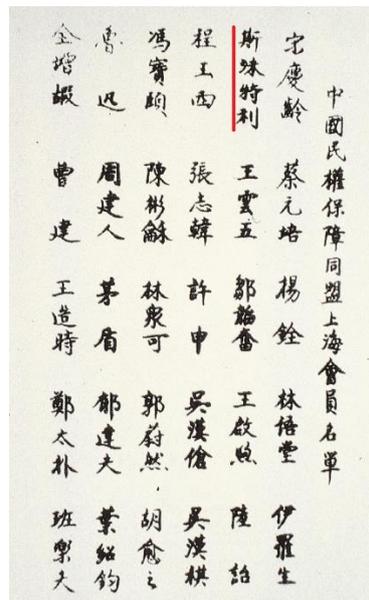
## 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史沫特莱（右二）、鲁迅（左二）、林语堂（左一）合影。右一为宋庆龄秘书黎沛华

史沫特莱虽然不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列，却是公认参与组织活动最为积极的国际友人之一，被视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骨干成员。在同盟于上海正式亮相之前，史沫特莱肩负任务，秘密前往北平活动，帮助促成北平分会，积极游说胡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夫妇等人入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于1933年1月17日成立。这是会员名单

史沫特莱好朋友陈翰笙在致杨杏佛之子杨小佛的一封信中回忆道：“史沫特莱对‘同盟’非常热心，通过孙夫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这段时间，史沫特莱与宋庆龄交往十分密切，是她得力的工作助手。邹韬奋回忆道，同盟会议“每次参加者有蔡先生、孙夫人、她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女士、鲁迅、林语堂、杨杏佛、胡愈之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

1933年2月17日，作环游世界旅行的萧伯纳（George B. Shaw）偕夫人乘英轮皇后号抵达上海。宋庆龄在上海家中热情接待了这位英国著名作家，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出席作陪。



1933年2月17日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宴请萧伯纳后合影。

右起：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上，但是事与愿违，“胡适事件”所带来的冲击波，对她精神打击不小，随后身体也发出警报，她时常感到筋疲力尽。1933年5月，史沫特莱离开上海，去苏联疗养。

史沫特莱走后不久，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特务刺杀。社会各界对杨杏佛的吊唁庄严隆重，同时也成为了同盟本身的告别仪式。虽然宋庆龄郑重声明：“杨铨（即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目的”，但大多数成员还是选择了就此作罢。在轰轰烈烈地活动半年之后，同盟结束了它的使命。

### 三、发出中国呼声

史沫特莱于1934年4月离开苏联，转道美国，直到10月22日才重新回到上海。11月，宋庆龄来到史沫特莱寓所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聚会。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在座的朋友畅谈。几个美国朋友唱了美国工人歌曲，最后还高唱《国际歌》，大家边谈边唱，非常高兴。

中国正值红军被迫长征、革命失败主义蔓延之际。不久，在宋庆龄的关心下，侨居上海的进步青年以学习小组的形式聚会在一起，在共同学习马列主义同时，了解到中国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以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这个学习小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史沫特莱寓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培恩公寓二楼举行的，参加者有路易·艾黎、耿丽淑（Talitha Gerlach）、马海德（George Hatem）、汉斯·希普（Heinz Shippe）卢秋迪（Trudy Rosenberg）夫妇、魏璐诗（Ruth F. Weiss）、甘普霖（A. B. Camplin）、陆懋德（Maud Russell）、夏秀兰（Lily K. Haass）、邓裕志、艾琳·魏德迈（Irene Weitemeyer）、曹亮。据马海德回忆，史沫特莱当时就像是“火花一样激励着”这个学习小组。



今淮海中路 449 号培恩公寓

此时，宋庆龄和史沫特莱肩负着一个共同使命——在上海另出一份新的刊物以取代已经停刊的《中国论坛》。她们一致认为必须有一份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报道政治局势的刊物；而这样一份刊物将不得不使用英语、由国民党当局奈何不得的外国人编辑、在南京政府鞭长莫及的上海租界内出版。

在史沫特莱的再三请求下，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 Browder）终于派来了他的秘书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与其丈夫曼尼（Manny Granich）。



1936 年宋庆龄（右二）与格兰尼奇夫妇（左一、左二）、路易·艾黎（右一）在杭州（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一份新的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随后在上海创刊，自 1936 年 3 月 15 日起办，至 1937 年 11 月 1 日止，每份售价一角。《中国呼声》主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格兰尼奇任总编辑，宋庆龄亲自为刊物收集材料，并约请一些知名的中外人士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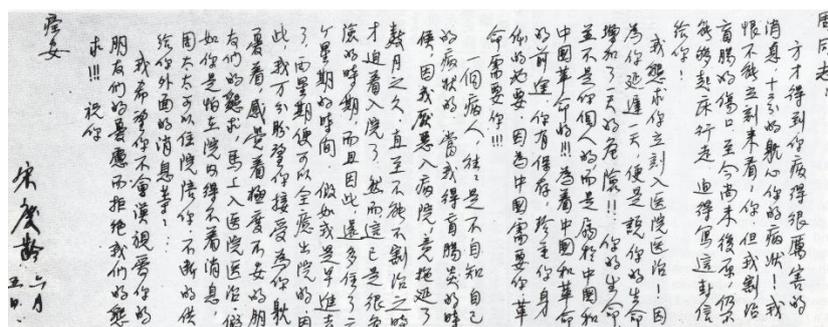
《中国呼声》最后一期印样

一开始，史沫特莱化名“锈铁钉”、“劫”为《中国呼声》供稿。但她与宋庆龄看法不同，对这份新刊物的编辑情况越来越不满。史沫特莱与格兰尼奇夫妇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们之间的对立最终也波及到了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的关系。

## 四、告别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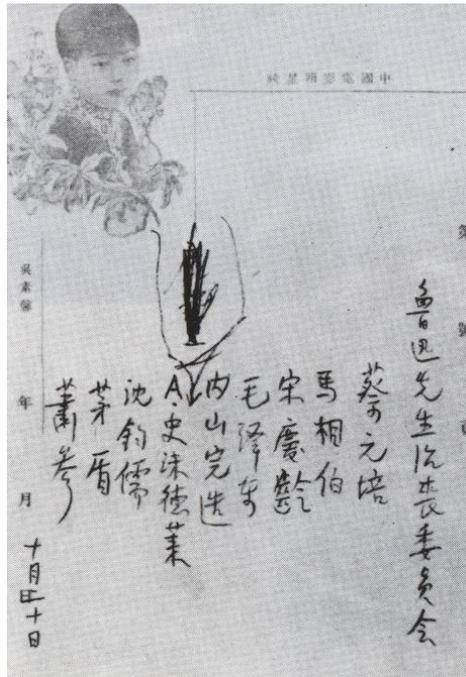
1936年5月，宋庆龄因盲肠炎住医院治疗。她是在病床上听到来访探望的史沫特莱亲口所说，才知道鲁迅病重的消息。为了给鲁迅治病，宋庆龄设法邀请寓居上海的美国治疗肺结核的专家“D（邓）医生”，委托史沫特莱陪同，前往为鲁迅诊治。

6月5日，自己病还未好，仍挂念着鲁迅病情的宋庆龄修书一封，希望他能听从医嘱，早日痊愈。信中宋庆龄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宋庆龄信中耽忧鲁迅，感到极度不安的朋友们中，当然包括鲁迅的密友史沫特莱。



1936年6月5日宋庆龄写信敦促鲁迅尽快就医

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鲁迅逝世后，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两人同列为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两人又共同组建鲁迅纪念事业筹备委员会，为继承鲁迅未竟的革命事业贡献着所有光热。



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

史沫特莱是在离开上海到达西安后惊悉鲁迅逝世的噩耗的。1935 年末，她曾特地跑到鲁迅家中，去听来自陕北的冯雪峰讲述长征的故事。正是这次会晤使史沫特莱萌生了前往陕北根据地实地采访的念头。1936 年秋，史沫特莱在刘鼎的帮助下，离开上海来到西安，准备从西安进入陕北根据地。此行使她成为了最早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西安事变之后，她最终到达延安，深入接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国抗战。她写成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中国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传记）等，向世界宣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了不朽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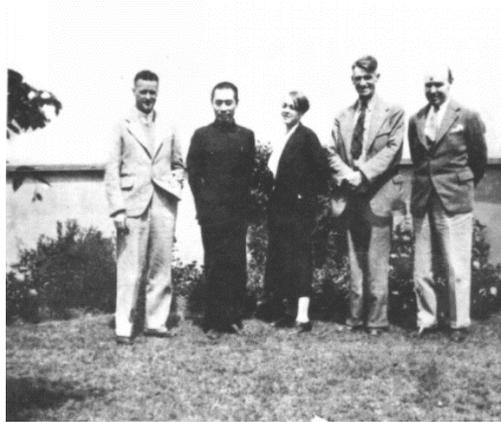
1937 年史沫特莱在延安与毛泽东（左）、朱德（中）合影



## 五、与保卫中国同盟合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宋庆龄发表大量文章和演讲，阐明她坚持抗日的坚定立场和坚决主张。1938年4月，她着手筹建一个新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支持这场反法西斯战争。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盟宣告正式成立。宣言表示，这一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史沫特莱没有参加保盟，尽管在组织上没有关系，但一直保持着与保盟相互合作的关系。1938年9月，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宋庆龄亲往广州码头迎接。医疗队医生巴苏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我问宋庆龄对我去中共领导的军队工作有何意见，她听了很高兴，并说我们可以在长沙或汉口会见史沫特莱，她会安排我们会见周恩来，我们的要求必须向周提出。



1938年史沫特莱与周恩来、卡尔逊（右二）等在武汉

1938年冬天，新四军军医代表沈其震在香港拜谒宋庆龄，其间牵线搭桥之人正是史沫特莱。

当时史沫特莱已经离开延安，在山西前线跟随八路军转战沙场3个月后抵达武汉，后又赴安徽云岭新四军根据地采访。她获悉，新四军中许多干部战士患有肺结核、胃肠病、慢性溃疡等，很多人生疟疾，长疥疮，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但极度缺医少药。于是，她向叶挺军长建议，希望新四军可以与保盟取得直接联系，争取援助。



1938年史沫特莱与粟裕、尤恩、陈毅、罗生特在新四军军部

沈其震将史沫特莱用打字机打在一方丝质白手绢上的信件缝在衣服里，按她的嘱咐到上海找到了保盟上海分会秘书耿丽淑，又经耿丽淑协助坐船赶赴香港。沈说：“到了香港，经过廖梦醒同志很快地会见了宋庆龄。我把史沫特莱打在手绢上的那封信亲自交给她。她说，艾格尼丝的报道我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已经读过了。你们缺医少药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她接着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保卫中国同盟已经在香港成立，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在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捐募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除了从香港带回去一部分外，还可以从上海运回去一些。”在宋庆龄的大力帮助下，新四军得到了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得以顺利度过难关。



1939年9月28日安徽省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欢迎史沫特莱的合影

1943年初，福斯特（John B. Foster）在重庆经爱泼斯坦推荐认识了宋庆龄，后顺利加入保盟。一次，当宋庆龄获知福斯特曾是史沫特莱的追随者及战友后，温情地对他说：“艾格尼丝是性情之人，对反动派她嫉恶如仇，对人民则爱得极深。有人把她比作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你同意吗？”爱泼斯坦后来评价说：“在宋庆龄的心中，史沫特莱这个名字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她把史沫特莱1929年赠送予她的那本《大地的女儿》珍藏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直至生命的终结便是明证。”



1944年史沫特莱在美国雅都（Yaddo）庄园

史沫特莱也一直关注着宋庆龄，用实际行动为保盟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编外战友。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开展新工作。这一时期，宋庆龄呼吁援助贫病作家，当时身在纽约的史沫特莱为之筹集了2500美元。那时的她因为美国当局麦卡锡主义的打压，经济情况并不乐观，“生计艰难”。1950年3月22日，宋庆龄在致两人共同的朋友王安娜的信中，请王安娜不必为史沫特莱近况太过担心，“艾格尼丝已经到达伦敦，很快就会到这儿来”，“她做事从不半途而废，我们定能很快见到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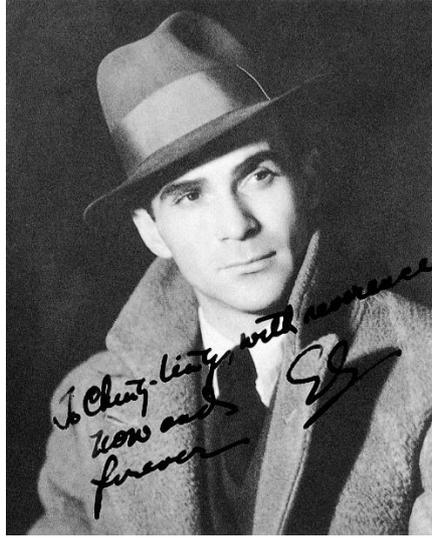
1950年史沫特莱生病卧床的照片

无奈天不遂人愿，史沫特莱抵达伦敦后，不幸胃病发作，经医治无效，于5月6日病逝于牛津医院。宋庆龄听闻噩耗传来，又去函告诉王安娜：“听说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葬礼上放了一场电影，内容是关于陕西牧羊人的故事……”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史沫特莱心里最惦念的仍然是她日思夜想的新中国。她在遗嘱中表示要将她的骨灰交给朱德将军，埋在中国。按照她的遗愿，史沫特莱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上刻朱德亲笔题写的“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 保卫中国同盟荣誉会员

王成至



斯诺题赠宋庆龄的签名照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05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5年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来到中国后，正式开启了记者生涯。1931年，他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影响下走上了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艰难险途。1936年，经宋庆龄推荐，斯诺成为第一个访问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据此经历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抗日战争中，斯诺协助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与宋庆龄一起推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并积极争取美国政府支援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冷战时期，移居瑞士的斯诺，继续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读者介绍新中国的成就。1970年，他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代表应邀访华，为1972年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宋庆龄与斯诺之间历经风雨的友谊，是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的光辉写照。

### 一、旧中国带给斯诺的震撼

自少年时代起，斯诺就向往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锤炼自己，去了解域外的众多民族。22岁那年，斯诺从股票交易中赚了800美元，决定利用这笔钱去东方旅行一年。1928年7月6日，斯诺抵达上海。按照斯诺在回忆录《复始之旅》中的说法，他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6周就走，可没想到一呆就是13年。



斯诺 1929 年在上海留影

在上海的时候，斯诺依靠新闻学院校友的关系，成为美国人在当地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兼职记者，终于学有所用。此后，他又成为美国新闻界的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的游历记者，为 12 家大报供稿。记者的职业使斯诺得以在中国及其邻国广泛游历，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在他眼里，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世界，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代之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骇人景象。



斯诺眼中 1930 年代的上海（来源：路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斯诺注意到，在上海的租界内，西方殖民者享受着跟本国富人几乎一样的生活条件，却

拒绝让中国居民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中国民众更是苟活在侵略者的同化政策之下。在饱受天灾人祸摧残的内蒙，人民流离失所，疫病到处肆虐，生命贱如草芥。日本于 1932 年初发动淞沪战役，斯诺亲眼目睹了空袭中上海居民的惨状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他在记录、报道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同时，朴素的正义感被一步步唤醒，对中国和远东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偏离于当时欧美国家的主流观点。



斯诺眼中的 1932 年 1 月 28 日上海惨状

(来源：路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斯诺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向英语读者反映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和本国专制统治下的苦难与挣扎，抨击包括美国在内的新老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对民众悲惨境遇的熟视无睹。虽然眼前的中国满目疮痍，但是凭借他在中国及相邻区域的所见所闻，斯诺逐渐认为：随着中国从封建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中国人身上，“今后 20 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当时对中国事态做出如此预见的西方人，就算不只斯诺一人，也应当是凤毛麟角。

对中国未来的展望，对参与到中国民族解放和复兴进程当中的渴望，成为把斯诺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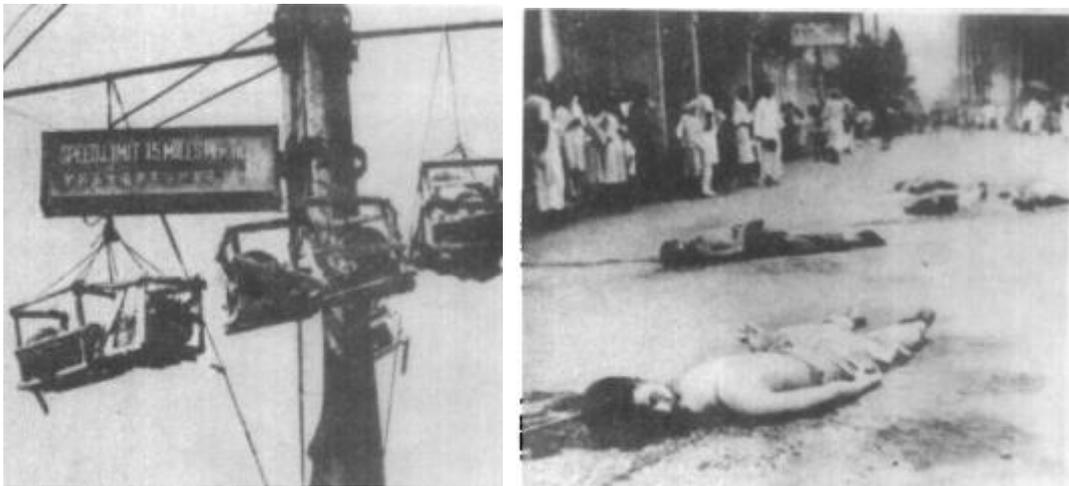


1932 年斯诺在上海题赠未婚妻海伦·福斯特的签名照

其实，斯诺形成这样的认识，离不开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对他的启蒙和影响，斯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同路人，与这位女性的引领也极有关系。她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遗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宋庆龄。

## 二、体验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

1931年9月，斯诺应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请求采访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的引荐，宋庆龄在静安寺路的巧克力商店与斯诺会面，采访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据斯诺后来回忆，在这次采访中，宋庆龄向他深入介绍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性质，揭露了蒋介石在“反共”旗号下对“三民主义”的背弃，也解释了她为什么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因为相信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只有共产党真正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谋福利，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希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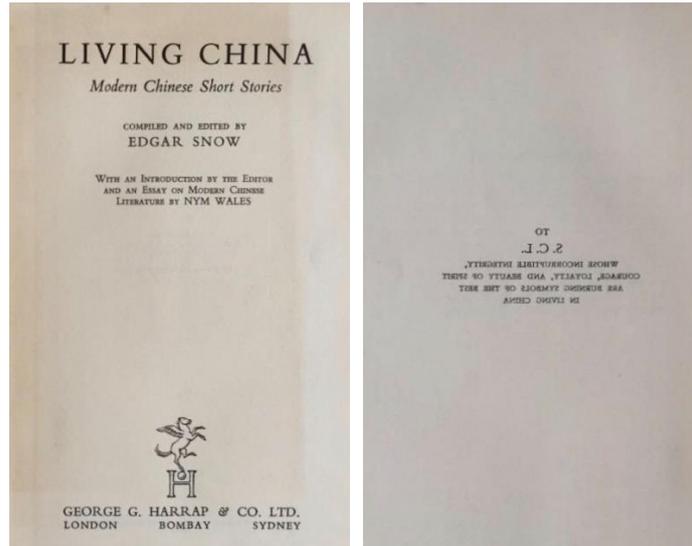


斯诺眼中的上海“四一二”大屠杀（来源：路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在斯诺眼里，宋庆龄不仅是言论上的巨人，更是行动上的巨人。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还在淞沪抗战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慰问将士、陪护伤员。为了营救遭到监禁和迫害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她多次赴南京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交涉，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在她的感召下，斯诺也参加了宋庆龄为营救共产国际在华情报人员牛兰夫妇发起的声援活动。

宋庆龄的言传身教，使年轻的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崭新的认识，按照斯诺自己的话说，“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及时认识了宋庆龄，我领悟到了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1936年，斯诺出版了他主持翻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集《活的中国》，在扉页的献辞中，他这样写道：“献给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



斯诺编译《活的中国》及其扉页

宋庆龄对斯诺也非常认可，在首次采访后，斯诺便成为了她府上的常客。1932年12月，斯诺与海伦·福斯特订婚，他们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赠送了一只电咖啡壶作为贺礼，还特意为他们设广东菜便宴表示祝贺。海伦亦成为宋庆龄终身的友人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斯诺与夫人海伦

### 三、向苏区推荐斯诺去采访的人

1932年圣诞节在日本东京结婚后，斯诺夫妇前往北平定居。1934年春天，斯诺被燕京大学新闻系聘为讲师。虽然如此，斯诺并没有脱离新闻界，跟在上海的宋庆龄也继续保持着联系。1935年初，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宋庆龄公开声援，并捐款给学生，斯诺不仅参与了运动的酝酿，还广邀国外媒体报道宣传这一运动，并为学生们提供庇护。斯诺在这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表现出的进步立场和社会能量，增进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成为日后向苏区推荐他去采访的一个重要依据。





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燕京大学学生领袖龚澎（左一）、龚普生（左三）  
和黄华（右单人照）（来源：路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早在1929年，斯诺就开始关注井冈山的斗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著的想法，在他的心里逐渐扎下了根。1932年，他甚至搞到了去中央苏区的通行证，可是由于帮他联络的地下党人对他访问苏区的动机产生怀疑，切断了跟他的联系，江西之行遂化为泡影。1934年，一位美国出版商约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并预付了稿费，斯诺再次萌生了访问苏区的想法，后因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作罢。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会师，1936年初，斯诺又通过天津地下党领导人黄敬帮忙联系去苏区采访，然而迟迟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海伦鼓动他去上海找宋庆龄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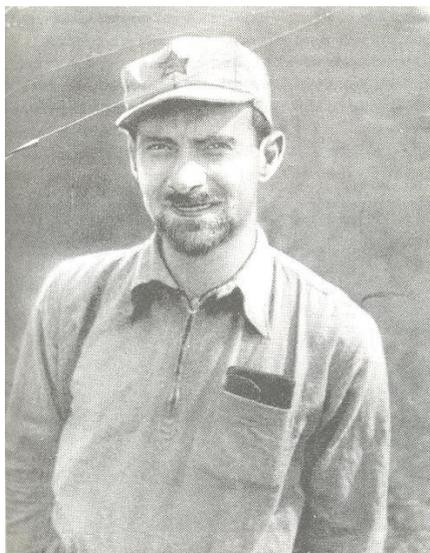


1936年斯诺在保安采访徐特立（左一），黄华作翻译（左二）

1935年底至1936年初，宋庆龄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通过电台建立了直接联系。面对日趋严峻的抗日形势，她充当起了南京政府与陕北苏区就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接触的牵线人。宋庆龄了解到，中共中央希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能为外界广泛了解，拟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正好斯诺在1936年春到上海请她帮忙联系去苏区采访，于是宋庆龄就向中央推荐了斯诺以及美国医生马海德，中共华北局为斯诺赴苏区开了介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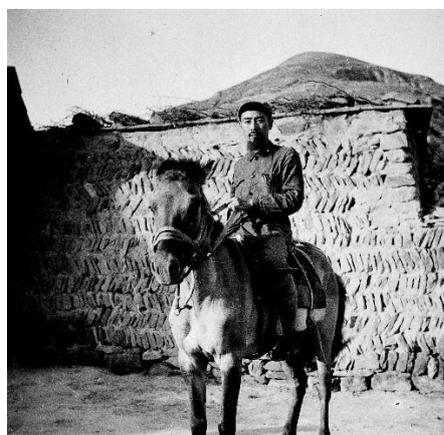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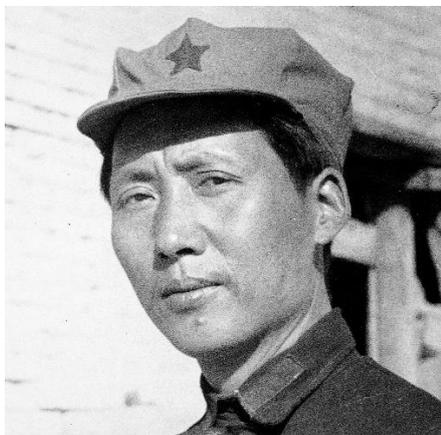
据路易·艾黎回忆，斯诺对陕北之行并非没有顾虑，因为一路上注定危险重重，甚至有生命之虞，他在拜会宋庆龄时也流露了这种顾虑。宋庆龄则为他鼓劲，告诉他旅程中会有周密的安排，并说他的报道将对“她所支持的、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

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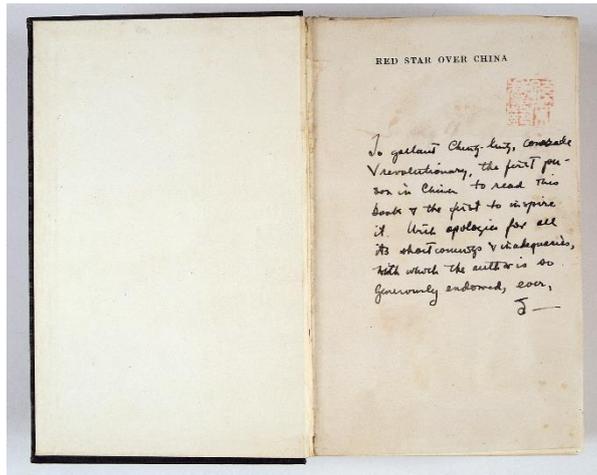
1936 年斯诺在陕北

同年 6 月，斯诺通过宋庆龄搭建的秘密交通线，从北平出发，绕道郑州前往西安与马海德会合，最后平安抵达了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不仅坚定了斯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救亡事业的信心，也使他有机会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倾心相交，为日后充当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打下了基础。



斯诺赠宋庆龄的陕北采访照片。左为毛泽东，右为周恩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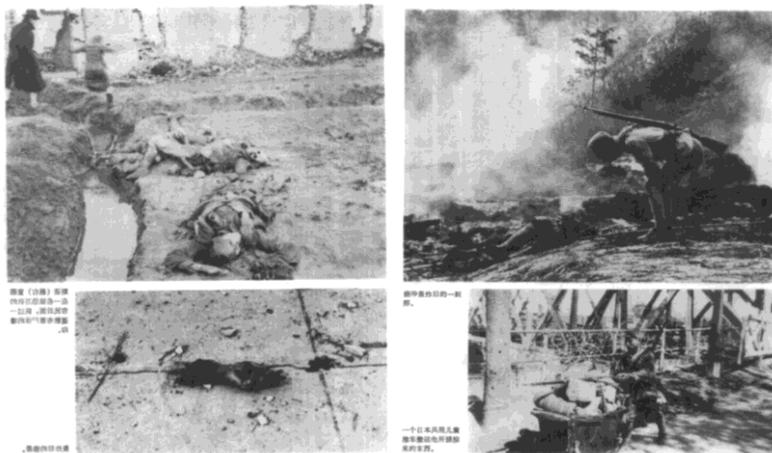
1937 年 10 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斯诺随即赠书宋庆龄，他在扉页上亲笔题写道：“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1938 年 2 月该书中文版以《西行漫记》为书名在中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力量籍此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人在远东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更是从中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和民族复兴的前景，纷纷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年仅 32 岁的斯诺凭此书一举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和记者，他的成功，离不开宋庆龄的独具慧眼，他的成功，也是宋庆龄推动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一次成功。



斯诺赠宋庆龄《红星照耀中国》的扉页（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 四、携手推动工合运动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斯诺作为战地记者，横穿中国国土，向世界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当时，美国政府虽然担心本国利益因日本独霸中国而受损，却没有决心放弃名为“中立”实为“绥靖”的对日政策，军火商为了牟利，继续向日本出售武器，对中国人民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充耳不闻。宋庆龄通过撰写文章和电台广播等形式告诉美国朝野：听任日本吞并中国，必然会祸及美国自身。对远东局势极具洞见的斯诺，极为认同这个观点。对短视的美国政客不抱期待的斯诺，此时更愿意以“世界公民”的身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他声称：“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





斯诺眼中沦陷的上海和南京（来源：路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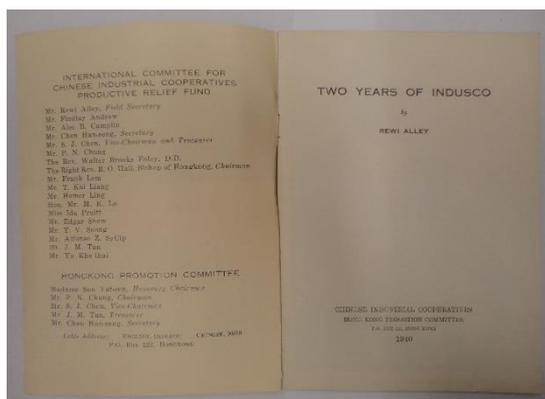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一民间组织，旨在动员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特别是支援处境最为险恶的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上海，斯诺夫妇和艾黎，看到沦陷区大部分工业经济落入了侵略者之手，便考虑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建立由民众自己管理的工业合作社，为长期抗战奠定经济基础。1938年6月前后，正是保盟初创时期，斯诺带着这个想法到香港去征求宋庆龄的支持，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民生主义”，因此予以“百分之百地支持”，并将其作为保盟的优先事项来推动。在国际友人的推动下，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当年秋天，斯诺夫妇赴马尼拉筹组菲律宾工合委员会，在募集资金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8年夏斯诺在香港拜会宋庆龄

1939年初，斯诺从菲律宾回到香港，在宋庆龄的指点和协助下进行工作，争取香港总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协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工作。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斯诺是委员之一。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凭借宋庆龄在海内外的声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运动的促进社。



1940年路易·艾黎著《工合两年》所列工合国际协会和工合香港促进社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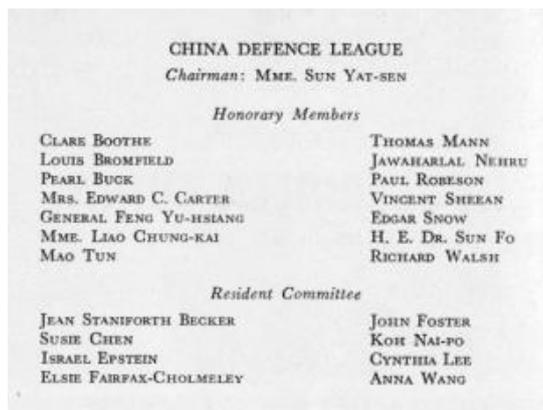
宋庆龄和斯诺也积极将工合理念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广。1939年9月，斯诺以工合国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再赴陕北，惊喜地看到合作社在根据地也办得如火如荼。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对他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10月，斯诺来到香港，他向保盟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和边区领导人讨论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他讨论的结果是以詹姆斯·贝特兰先生（详见“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系列之《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的重要功臣——詹姆斯·贝特兰》）授予他的权力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做出建议。



1939年9月斯诺在延安第二次会见毛泽东

在斯诺等人的努力下,到1940年,工业合作社已经扩展到全国16个省,拥有了3万工人,产值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一。工合运动稳定了受战火冲击的中国经济,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宋庆龄1972年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说：斯诺在创办保盟的事情上给予了她和一些左翼人士很大的帮助。斯诺也因此当选为保盟的荣誉会员。



1943年保卫中国同盟年报《在中国游击区》上刊登的保盟荣誉会员名单

## 五、争取美国政府援助敌后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加强对中共抗日武装清剿的同时，转而对蒋介石政权采取政治诱降，而蒋介石方面也乘日本军事压力减弱之际，对江南的新四军痛下杀手，于1941年初制造了“皖南事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宋庆龄与其他进步人士一方面联名致电蒋介石，严正要求其坚持联共抗日的政策，一方面向外界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利用国际舆论对蒋施压。

当保盟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向斯诺通报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斯诺立即通过香港向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社发出多则电讯，率先把事变的真相捅了出去，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感受到日本威胁日益迫近的罗斯福政府，担心国共合作破裂将大大助长日本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安全处境，因此以终止援助向蒋施压，令其不得放弃抗日。迫于外部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反共问题上收敛形迹，但是斯诺在中国采访的资格却被吊销，不得不离开他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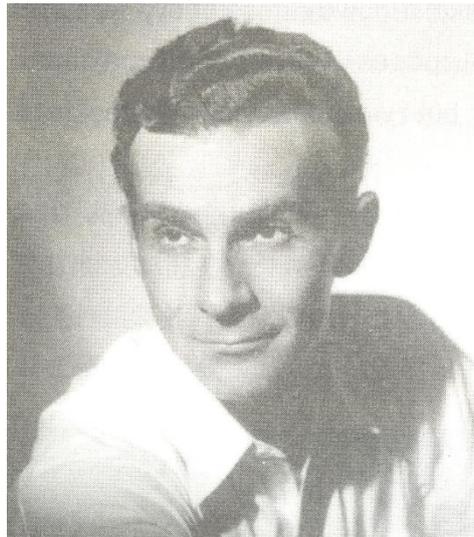


1940年12月斯诺夫妇在上海合影。右为《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在返回美国前，斯诺赴香港与宋庆龄话别，宋庆龄对他说：“你会回来的。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我们算你是弟弟，你是属于中国的。”同年3月6日，宋庆龄致函美国援华会执

行秘书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女士，将斯诺作为保盟的创始人介绍给她，希望她为斯诺在美国提供宣传保盟的机会，信中说：“如果在援华会主持下他有某些讲演的机会，我们将很感激，他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同盟的目标和活动。”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政府被迫放弃“中立”，加入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与之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抗日援助也大幅提升。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控制了外援的分配，在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思想主导下，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很少能够得到外援。宋庆龄从香港撤到重庆后，重组了保盟，继续致力于为抗日根据地争取外援，在她亲自斡旋下，盟军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史迪威将军批准用美国军机向陕北运送医疗物资。



回到美国后的斯诺

回到美国后的斯诺荣任《星期六晚邮报》首席记者，实际上作为战地记者，奔波于中国、印度、苏联、欧洲等地，但是一有机会，他就会积极配合宋庆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1942年2月，他在第一次接受罗斯福总统就中国政策的垂询时，就盛赞中共抗日武装，介绍了工合运动，建议总统要求蒋介石在美国对华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信贷中，拨出一部分来作为给工合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罗斯福表示他不宜直接给蒋介石下命令，但会设法让蒋了解美方的想法，并要求他随时通报这方面的进展。1944年5月，在第二次与斯诺会面的时候，罗斯福主动告诉他，已经给蒋介石去信谈工合的事，斯诺则告诉他获悉工合已从蒋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贷款。罗斯福还向斯诺透露了将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的计划。1945年3月，斯诺在第三次接受罗斯福垂询时，告诫总统要当心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被蒋介石用作打内战的资本，罗斯福表示会考虑直接向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提供军援。罗斯福和斯诺都认为战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期望国共两党能够成立联合政府。



1943 年的斯诺夫妇

## 六、为中美人民友好架起精神之桥

日本战败投降后，斯诺寄以厚望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对中共解放区发动了进攻，然而时移势易，仅三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了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宋庆龄当选为新政府的副主席，此后一直投身于新中国的外交、外宣、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

在世界滑向冷战的大背景之下，美国被“麦卡锡主义”的阴霾笼罩，一大批了解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受到了所谓的“忠诚调查”。斯诺也一度失去了自由，著作成为了禁书，文章也刊发不了，宋庆龄对斯诺回国后的命运的预判，居然变成了现实。斯诺的同行曾劝他不要再碰与中共有关的话题，转而去写其他不甚敏感的问题，但是斯诺厌恶这种苟且的人生，于是在1959年携第二任妻子路易斯·惠勒·斯诺及他们的孩子移居瑞士，仍然保留美国国籍。



1953 年斯诺全家在纽约

宋庆龄对斯诺的处境十分了解，她在1960年11月给斯诺的一封信中，鼓励他一如既往向西方和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的进步，至于因此带来的压力与困难，她写道：“当你感到对你



的压力的时候，想起像鲁迅这样的人，他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是流传在人们之中。纵然美国人民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各种谎言的灌输，甚至歪曲了他们自己的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形象，然而我仍旧相信，以毅力和决心来坚持真理的话，真理是能够流传到他们那里的。”



1964年宋庆龄在北京会见斯诺

斯诺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问新中国，撰写著作和文章向西方读者介绍共和国的建设成就和外交政策主张。在197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21个国庆节之际，他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的合影，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的醒目位置，昭示着中美关系将迎来重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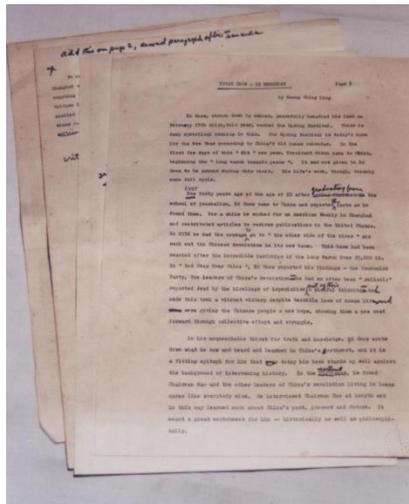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斯诺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

斯诺每次来中国，都不忘去拜访宋庆龄。除了1960年宋庆龄因病未能相见外，他们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1970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为斯诺夫妇接风，由于飞机晚点，一直等到深夜才等来他们。这次会晤，竟成了宋庆龄与斯诺的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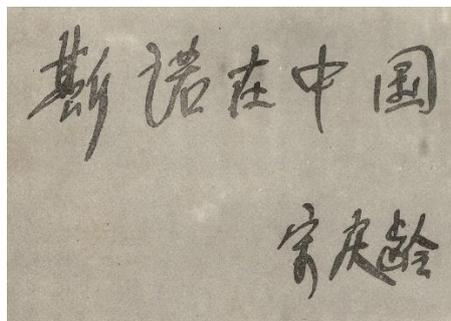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一周，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享年76岁。宋庆龄获悉了这一噩耗后，为起草唁电一夜未曾合眼。事后，她告诉秘书张珏：“由于拟电稿，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很难下笔。”

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了故乡的赫德森河畔，另一半则葬在了他执教过的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在斯诺骨灰安葬那天，宋庆龄派秘书张珏代表她前去，并嘱咐张珏：

“请代向路易斯·惠勒表示慰问，我精神上与她同在。”



1972年6月，宋庆龄撰写的《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的英文打印稿



宋庆龄为1980年出版的《斯诺在中国》一书题写书名

1972年6月，宋庆龄撰写了《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她把斯诺称为“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正像宋庆龄在致斯诺夫人路易斯·惠勒的唁电中所说的那样，她与斯诺40年的坚强友谊，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

##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耿丽淑 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骨干

徐锋华



大学时代的耿丽淑

1987年6月13日，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礼堂举行的中国福利会成立49周年的庆典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福利会顾问、美籍专家耿丽淑接过了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给她的“永久居留证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向外国人颁发的第一份永久居留证书，这份特殊荣誉，耿丽淑当之无愧。

1896年3月6日，耿丽淑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德裔农村家庭，本名塔丽莎·格拉克（Talitha Gerlach），父亲是一位牧师。1926年9月，她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耿丽淑追求民主，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到中国不久便涉足中国革命事业。



中学时代的耿丽淑

1938年，耿丽淑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骨干力量，担任秘书工作，组织援助新四军，并为保盟和宋庆龄传递重要信件，在上海分会中坚持战斗到只剩她一个人。抗战胜利后保盟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耿丽淑担任执行委员，其间代理过近一年总干事。被迫返回美国后，她参加了美国援华会的工作。美国援华会转入反动立场后，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人退出美国援华会，于1949年4月在纽约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并担任理事会主席。（详见“回望1949 为新中国奋斗：栉风沐雨 力助中国福利呼吁会”）1952年，由于耿丽淑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宋庆龄帮助她秘密来到中国，并安排在中国福利会工作，直到1995年去世。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耿丽淑为宋庆龄领导的事业服务长达近60年，是宋庆龄最为信赖并保持终生友谊的外国友人之一。

## 一、初涉中国革命

耿丽淑1926年来到中国后，经上海北上去北京学习汉语。1927年，北方军阀张作霖在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杀鲍罗廷夫人以儆效尤，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掩护了鲍罗廷夫人逃跑，直到她取道天津离境。1928年，耿丽淑被调往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济南工作。



1927 年耿丽淑在北京期间留影



1928 年耿丽淑（左）考察山东农村时留影

1929 年 5 月 28 日，宋庆龄从德国取道苏联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国葬，从北平的西山迎灵柩到南京中山陵。耿丽淑专程从济南赶到南京，在人潮拥挤的长江南岸中山码头一带，她隔着人山人海远远地看到端庄娴雅的宋庆龄站在威胜号军舰舰首，也算目睹了这位中国杰出女性的风采。

1930 年，耿丽淑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系学习。



1930年耿丽淑（前排左三）回美国前与青年会同仁在上海火车站合影

1932年耿丽淑被调往上海。1934年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和邓裕志、利尔·哈斯（中文名夏秀兰）一起在工人居住区小沙渡路三合里开办女工夜校。这年秋天，耿丽淑参加了路易·艾黎和汉斯·希普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小组是由宋庆龄建议发起的。耿丽淑参加政治学习小组后，总是有一些进步团体和共产党员要求她提供帮助和掩护。



1933年耿丽淑参加女青年会上海总会举行的基督教女大学生联合会时合影

1935年11月的一天晚上，宋庆龄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于当晚带着香槟和白兰地，去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同艾黎及其他几位国际友人一起，举杯相庆，为人民的胜利干杯。这些国际友人都是参加政治学习小组的朋友们，不巧耿丽淑回美国探亲错过了。路易·艾黎事后告诉耿丽淑，宋庆龄曾特意问起耿丽淑，并说她做的事情正是宋庆龄所希望于她的，直到这时耿丽淑才知道政治学习小组从成立伊始都是由宋庆龄亲自指导的。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耿丽淑与金仲华、邓裕志等创办了难民收容所、伤兵救护站，组

织教会大学学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开展义卖活动。

## 二、投身中国抗日运动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随后派吴大琨赴上海与耿丽淑联系。1938年冬天，吴大琨带着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秘密赴沪找到耿丽淑。宋庆龄在信中称呼她为“我的朋友”，问她有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消息，叮嘱她租界有“狼”，要小心，最后说来人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委托他作为代表来面议要事的。吴大琨介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性质，然后转达了宋庆龄的设想——在上海建立保盟分会，接应国外救援物资，并将物资转运新四军皖南军部，请耿丽淑参加筹备。



青年时代的耿丽淑

几天后，由吴大琨、耿丽淑、沈体兰、吴耀宗、张似旭五人组成的保盟上海分会核心，在耿丽淑的住所举行了首次会议，宣布分会的成立。会议使用英语交流，耿丽淑是唯一的外国人。耿丽淑被选为上海分会秘书，负责接应国外的捐助，以及与其他革命组织的联络。保盟上海分会主要是接受香港保盟的指示，由保盟香港分会负责支援八路军，由上海分会支援新四军。

上海分会成立后就开始募捐，并与中共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刘少文取得联系，得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及中共江苏省委有力的支持。

同年12月，新四军代表、军医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长吴之理到上海向耿丽淑紧急求援。保盟上海分会募捐到现金10万多元，为新四军购买了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下，由顾执中、王纪华率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通过日军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地，送达新四军军部。



首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向新四军敬献锦旗。左起：王纪华、顾执中、项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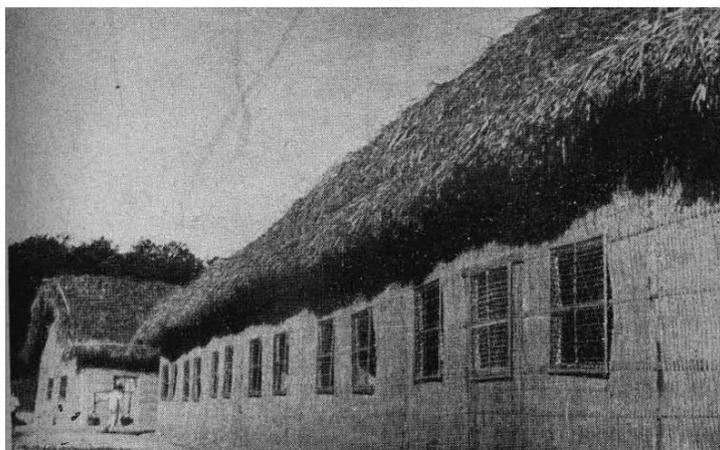
1939年初，皖南新四军又得到一批手术器械、药品、被服、食品、文化用品，特别是获得了名叫“白浪多息亦”的消炎药（磺胺的前身），是当时世界上刚生产出的最新产品。同年夏天，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地区蚊子猖獗、疟疾流行的消息，随即安排上海分会向新四军提供一批紧急援助，并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第二批慰问团，携带所需紧急物资前往新四军根据地，其中有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400听炼乳、几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2000个消毒包等。慰问团中约有20多名青年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此外，新四军军部医院就是依靠保盟上海分会建立起来的，许多新四军的伤病员在这座医院得到医治、疗养，康复后重返前线，保盟每月还向新四军医院提供1500元的日常开支费用。



项英欢迎上海民众慰问团



“孤岛”上海在客观上成为新四军取得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主要根据地。从上海运输物资去新四军驻地很不容易，大都通过邮局里的内线关系设法转运出去，而邮局里也只有两三个进步人士可以委托。一般做法是将包扎好的、已经检查过的邮包在下班后打开，把药品、器械、食品等急需物资放进去，请邮局同志以邮包形式护送出上海。分会两批赴新四军慰问团带去手术器械、药品、食品、被服等，同耿丽淑、王纪华、吴大琨等竭尽全力分不开，也同国际友人与上海人民的捐助息息相关。保盟上海分会是热心抗日的中外人士的共同体，耿丽淑回忆说：“有很多同志和外国朋友在工作，这是由于在许多场合以我们外籍人员面目出现更为合适，可以起到中国人自己起不了的作用。”上海分会还曾请教会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帮助，将药品从上海带到九江，再转运去新四军驻地。



《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9—1940）》刊登的新四军军部医院照片

后来上海分会的其他四位核心成员被捕、牺牲或因故离开，只剩下耿丽淑一人。耿丽淑的工作任务更艰巨，但她毫不惧怕海关码头有日本特务，经常秘密地给香港的宋庆龄传递秘密信件。每当香港来上海的美国“总统号”轮船到达时，她机灵地扮作接客者混入人群登轮投递，并及时取得邮船带来的宋庆龄最新指示。通过这种方式耿丽淑为宋庆龄进行“信件走私”，报告募捐救济情况，基本上是每周一次。她还冒着风险储存国外寄来的捐款和物资，以待时机转运。虽然她因外国人的身份得以幸免于难，但保盟分会已名存实亡了，耿丽淑也于1940年秋回国。

回美国之前，1940年秋，耿丽淑终于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总部与宋庆龄会面，这是她们第一次相见。宋庆龄亲自出门迎接耿丽淑，把她领进房间。由于已有的工作联系，她们一见如故，谈了许许多多。从言谈中，她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彼此增进了友情。回到美国后，耿丽淑依旧经常保持与保盟的联系。她通过讲演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况，为中国人民募捐。还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工作者工会主席。1941年秋，耿丽淑本已订好回中国的船票，但由于日本对中国形成包围圈，随后偷袭珍珠港，并向香港发动进攻，她回中国的路被卡断了。

### 三、协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1945年11月，耿丽淑同爱泼斯坦、陆懋德、斯诺、史沫特莱等人一起，参加了美国进

步民间组织“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

1946年7月，耿丽淑如愿来到上海，继续在女青年会工作。这时，保盟已于1945年11月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马上邀请她加入，担任执行委员。1947年初，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请假回国，耿丽淑被推上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处理福利基金会的日常工作。



1946年7月耿丽淑（前排右二）参加女青年会欢迎印度干事时合影

1947年1月10日，加拿大夏理逊大夫为了将中国福利基金会等救济机构募集的30吨医药器械、20吨纺织品运往邯郸国际和平医院，而在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下饱受寒冷、饥饿和疲劳之苦，以致献出生命。在2月7日举行的夏理逊大夫纪念会上，耿丽淑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发出呼吁：活着的人应该继续夏理逊大夫的工作，把物资输送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们。12月，耿丽淑被纽约女青年会召回美国。宋庆龄和金仲华、沈体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亲赴机场送别，表示随时等待她回中国工作。



1947年夏耿丽淑（左一）与女青年会新干事合影

1948年，由于长期合作的美国援华会不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华北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等项目，耿丽淑和爱泼斯坦等人决定退出美国援华会，另组新的机构，宋庆龄十分支持他们，打算在美国重建一个新团体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12月8日，宋庆龄致函耿丽淑，邀请她在这个新团体的初创阶段，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个人代表。1949年4月19日，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耿丽淑担任理事会主席。该会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呼吁美国人民在医疗物资、儿童保育工作等方面对中国人民给予帮助。



在美国与父亲在一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9月22日，由于耿丽淑6月后的五封来信很晚才送达，宋庆龄回了一封很长的信，祝贺耿丽淑当选为中国福利呼吁会理事会主席，告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将来打算和其改组问题。10月21日，宋庆龄致函在美国的耿丽淑，认为“就政府的组织、运转的标准化和整体的协调而论，我们的国家仍处于组建的过程”，所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问题暂时被搁置着。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继续开展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暂时按现在的情况进行，那就是我们将在上海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以及医疗卫生这些方面开展工作，并且充当解总和国外为中国人民工作的组织之间的联络渠道。我们将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促进工作。这意味着你们的促进工作将继续采用过去中国福利基金会所采用的规划”。

1949年12月19日，宋庆龄给耿丽淑回信，答复了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情况，最后表示“真心希望你很快回到中国来。这里有工作要做，你能帮助我们。……另外，今年春天（编者注：原文笔误，应为“明年春天”。）很可能有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发生，将更便于你离开美国到中国来。我们将继续朝着使你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的目标努力，以便你能帮助我们人民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而奋斗。”



1950年在纽约

#### 四、宋庆龄积极筹措耿丽淑来华

50年代初期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耿丽淑也是受害者之一。她因为大谈中国革命，而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当耿丽淑陷入危险时，在地球的这一边，宋庆龄时刻担心着她的安危。1950年5月，宋庆龄致函周恩来，推荐耿丽淑为国际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她说：“在美国最近的危机中，当美国援华会不再起作用而真正的进步人士都在坚决为中国和为美国维护正义的时候，耿丽淑小姐总是站在他们的前列”。1951年2月15日，宋庆龄致函顾锦心说周恩来已允许耿丽淑来华参加中国福利会工作，因为“耿丽淑的身份在那儿是完全暴露的，完全有理由另找一个人接替她在那儿的工作。”当月，宋庆龄给耿丽淑发出电报，邀请她立即回中国工作。但迟迟没有得到她的回音，宋庆龄十分担心。4月25日，宋庆龄致函吴耀宗，表示“非常关心耿丽淑的情况。两个月以前，我通过香港向她发去过一个电报，要求她立刻动身去印度，并且在抵达印度以后马上与中国福利会联系。中国福利会办公室最近也发过几封信给她，向她发出了更加明确的指示。现在看来电报和信件都没有送到她手上，因此直到今天耿小姐尚不知道我们想要她马上动身。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紧迫。要是你和科拉·邓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定出一个通知耿小姐的最好方式，以使你尽可能早地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我将不胜感激。如果你能让我知道你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我将更加高兴。”5月12日，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朋友格雷斯时提醒说如果要同耿丽淑联系，“请不要提起我，因为这没有好处”。

1951年9月，耿丽淑被“麦卡锡主义”分子宣布为“支持红色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即将退休的她遭到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解雇。被长期服务的机构抛弃，耿丽淑愤怒不已，她决定立即投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新中国。

宋庆龄为耿丽淑回到中国做了充分安排，先是让她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视线取道欧洲抵达香港，又亲派时已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专程在香港迎候并陪她北上来沪。在上海，宋庆龄的一位朋友交给她一张表格请她填写，在填到“职务”一栏时她顿住了。正当她感到

为难时，那位朋友接过笔在该栏目下郑重填上了“顾问”一词。耿丽淑顿时热泪盈眶，她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感谢宋庆龄，我将很好地履行我的义务。”

从此，耿丽淑一直居住在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事业中。



1952年耿丽淑（右一）与宋庆龄（左二）、  
沈粹缜（左三）、江兆菊（左一）在宋庆龄上海寓所合影

## 五、在中福会为新中国工作

宋庆龄亲自安排耿丽淑入住陕西北路 369 号宋氏老宅。耿丽淑的卧室就是当年宋美龄的闺房，而宋母倪太夫人的卧室作为耿丽淑的会客室和书房。一直到 1963 年，因房屋修缮，耿丽淑才迁居他处。

初期，耿丽淑担负起中福会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具体担任《中国建设》的审稿人和负责对外联络，她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开辟国外发行的渠道上，因她曾从事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朋友几乎遍及世界，她写信向朋友们介绍杂志，并亲自邮寄每期刊物，想方设法为杂志的海外发行打开门路。因为中美关系十分紧张，美国不准中国的刊物直接邮寄，她就通过香港的朋友改换包装寄往美国。



1957 年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幼工作顾问的耿丽淑

1956 年，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发展阶段。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组织专门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宋庆龄表示，“让中国福利会在较高的技术水平上承担起这项工作，一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设想的如何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与我们组织的名称‘研究会’一致起来”。但制定如此一个计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中福会和对中国来说它都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还比较复杂。宋庆龄认为，“要使这项计划走上正轨，耿丽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人选。希望她尽快回上海”。耿丽淑当时在北京做国际宣传，回沪后，宋庆龄委托她担任幼儿园、托儿所的顾问，加强幼儿教学工作的实验性、示范性、科研性。在耿丽淑的指导下，中福会幼儿园被评为全国儿童工作先进集体，并出席了 1960 年的全国群英会。



1979 年 9 月，在北京宋庆龄寓所



1980年，给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英语小组的学生辅导英语



1981年，作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国际友好人士，送别好友宋庆龄

耿丽淑是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1985年兼任上海宋庆龄基金会顾问。1986年3月6日在她90岁生日时，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向她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她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87年6月13日，耿丽淑获得上海市公安局对外国人颁发的第一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证书，同时荣获中国福利会颁发的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荣誉奖。这一年，她还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颁发的上海工作纪念章。



荣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荣誉奖章”

1989年9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颁发荣誉证书，赞扬她“几十年来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

1991年3月6日是耿丽淑95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和奖章。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耿丽淑（坐者左二）“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1995年2月12日，这位将大半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百岁老人逝世。她被安葬在宋庆龄陵园，与老朋友长相厮守。





\*感谢中国福利会提供耿丽淑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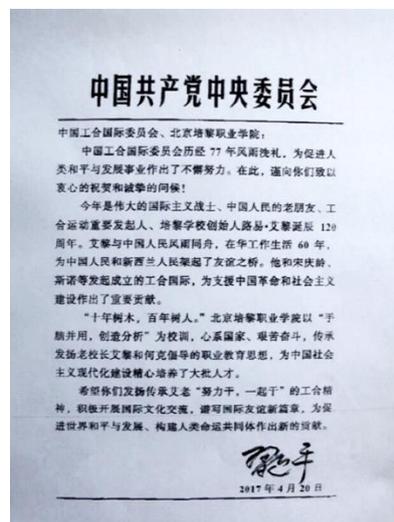
##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创始人

王建明



1927 年来华之初的路易·艾黎

2017 年 4 月 21 日正值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来华 90 周年纪念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贺信中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 60 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回信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 (Rewi Alley)，1927 年来华，1933 年与宋庆龄相识，两人自此结下跨越 50 载的革命友谊。1930 年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协助参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革命活动，收留庇护地下党员，创办《中国呼声》杂志以唤醒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携手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通过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进行抗战宣传、开展生产自救、援助抗日根据地建设以支援抗战，巩固经济国防。新

中国成立后，他们共同倡导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致力于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促进中国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宋庆龄评价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

## 一、为中国革命吸引来华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一户教师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翌年（1916年），艾黎高中毕业，他自愿报名应征入伍，作为新西兰远征军步兵团的一员被派往法国前线参战。战后，伤愈出院的艾黎于1919年退伍回到新西兰经营农场。1925年，艾黎偶然读到报刊上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便决意前往中国，去探寻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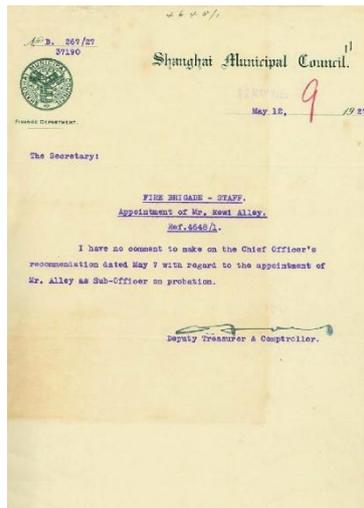


1901年艾黎一家的合影，左起：姐姐格温、小弟皮普、大哥埃里克、母亲克拉拉、父亲弗雷德里克和路易·艾黎



1917年路易·艾黎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戎装照

1926年12月，艾黎结束了在新西兰莫瓦蒂亚的农场生活，几经辗转，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平安抵沪。抵达上海的第二天，经友人推荐，艾黎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录用，担任工部局虹口救火会的小队长。10个月后，他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督察，负责检查公共租界里工厂企业的防火措施。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路易·艾黎入职火政处的公函（上海市档案馆藏）



路易·艾黎担任小队长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虹口救火会（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

来沪初期，艾黎在写给家人的信里提到：“这里必定有一些坐拥巨资的人，许多古典式的豪宅就坐落于花园和林荫道中”，“但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辛勤劳作，比我们役使的马儿都不如”。通过实地走访，上海的贫富悬殊也让艾黎感到震惊。随着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艾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年半后，他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从此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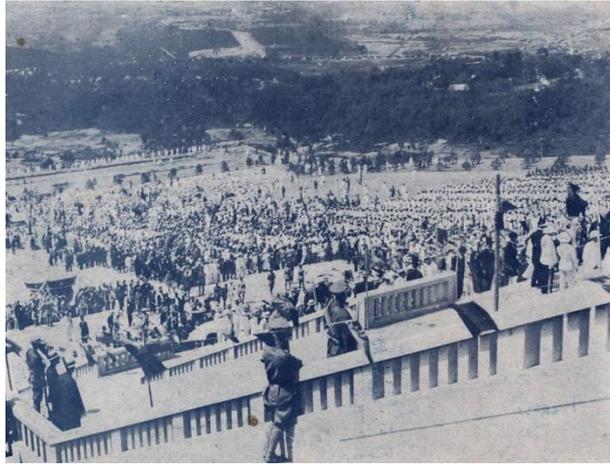
路易·艾黎（前排右二）任工部局火政处督察时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艾黎来华之初，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时。艾黎从英文报刊上读到了宋庆龄的报道。当时身在汉口的宋庆龄拒绝出席汪精卫 7 月 14 日召开的“分共会议”，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同年 8 月，宋庆龄乘船转赴苏联，继续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7 年宋庆龄在武汉留影

1929 年 5 月宋庆龄从德国转道苏联回国，6 月 1 日参加孙中山灵柩移葬南京中山陵的奉安仪式。站在观礼人群中的艾黎，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宋庆龄，目睹了她进入享堂。在艾黎看来，宋庆龄是当时奉安大典“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在此前后，艾黎还通过阅读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历史》，对书中叙述的宋庆龄在武汉和苏联的个人经历有了初步印象。



1929年6月1日，路易·艾黎站在孙中山灵柩迁葬南京的奉安大典观礼人群中，第一次见到宋庆龄

## 二、上海的地下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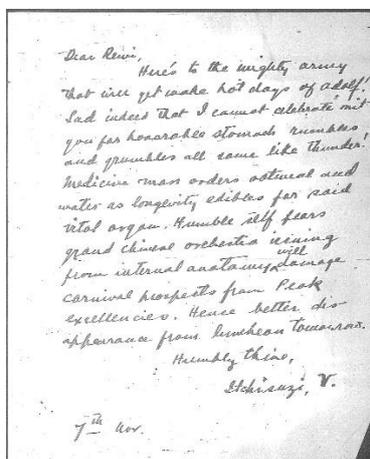
1933年，艾黎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引荐下，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初次见面，宋庆龄向艾黎讲述了1922年她从陈炯明兵变中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在艾黎的印象中，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



1933年路易·艾黎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与其相识

1934年，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宋庆龄为使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5月起，宋庆龄请艾黎利用工部局工厂督查这一职业便利协助马海德对上海各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大量的改进意见，同时也让艾黎和马海德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深刻了解。事后，宋庆龄对他们的调研工作十分满意。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艾黎居住的愚园路寓所顶楼小房间里，设了一处秘密电台，与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后的一天凌晨，宋庆龄悄然前往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几位国际友人一同庆贺这一胜利。



1935年11月7日，宋庆龄致路易·艾黎函（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

宋庆龄曾为红军运送过一箱手枪和子弹，她亲自去沪东取出来后，一路通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所有卡哨，最后将之转移到艾黎家暂存。直到1938年艾黎离开上海时才将枪弹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另一处地点。

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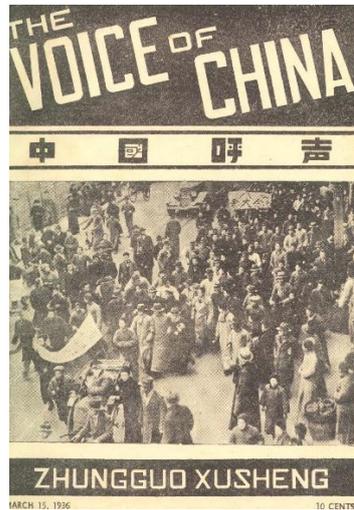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家和宋庆龄的寓所，还常被用作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的庇护所。在艾黎家住过的有：左尔格情报小组成员陈翰笙博士、红军将领刘鼎、许光达、李克农，以及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而刘鼎（原名阚思俊）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暂住的经历，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晚年刘鼎与路易·艾黎合影

对于宋庆龄交办的革命任务，艾黎总是尽心妥善地执行完成。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

上海的岁月中，艾黎还积极参与宋庆龄支持筹办的《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杂志。在编辑格兰尼奇夫妇同宋庆龄、艾黎、史沫特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呼声》首期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



1936年3月15日出版的《中国呼声》创刊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自创刊起，宋庆龄就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杂志提供稿件，还“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她转给杂志编辑的。艾黎则是《中国呼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用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不同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有：《岳飞——中国的爱国者》《法西斯战争的后果》《日本的致命弱点》《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绥远——要塞》《爱和平的我们必须争斗》等十余篇文章。



1936年春，为庆贺《中国呼声》的出版，宋庆龄特意组织大家周末游览杭州的庆祝活动。图为宋庆龄（右二）与路易·艾黎（右一）、格兰尼奇夫妇（左一、左二）等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合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路易·艾黎保存的《中国呼声》最后一期印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2月23日清晨，宋庆龄在艾黎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外滩南京路码头。晚年的艾黎清晰记得“她挎着我的胳膊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无人敢上前盘问他们。12月26日，宋庆龄安全抵达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 三、发起工合运动与保盟并肩战斗

1937年底，日军完全占领上海的华界地区，开始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进行疯狂的战略物资掠夺和破坏。艾黎目睹了遍布黄浦江两岸的工业废墟，日本人不断装载掠夺来的机械和废铁，用货船运往本国。在艾黎看来，“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仅上海一地就约有60万工人失业、衣食无着，在街头坐以待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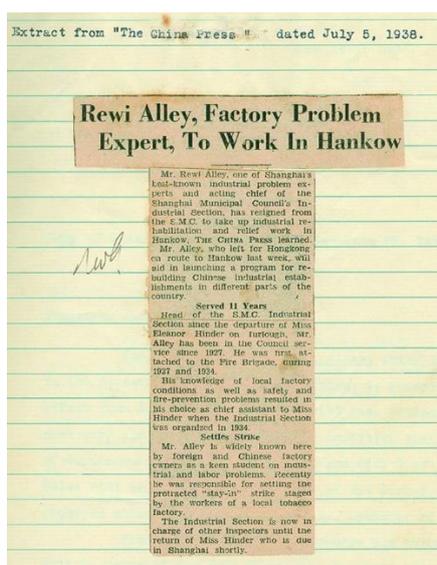
从路易·艾黎好友斯诺夫妇居住的公寓远望苏州河北华界战火，漫天硝烟，一片惨象



1938年，路易·艾黎（左二）与友人海伦·斯诺（右五）、王安娜（右三）在上海伤兵医院慰问伤残士兵

受美国友人海伦·斯诺的启发，艾黎开始思考如何以他“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将失业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抗战工业。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曾多次商讨后，提出了“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难民的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等目标合在一起的工业合作设想。随后，他们制订出一份在非沦陷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又称“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的计划草案，并在由中外进步人士参加的“星一聚餐会”上进行讨论研究。与会者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必须保持这一组织的群众性，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在酝酿工合运动过程中，艾黎随时将情况告诉在香港的宋庆龄，得到其“百分之百地支持”。1938年7月，艾黎辞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督查职务，乘船赴香港向宋庆龄汇报工合运动的实施计划。宋庆龄对实施计划十分赞同，并积极联系她的弟弟宋子文，为工合筹划了急需的启动资金。



1938年7月5日《大陆报》刊载的“路易·艾黎——工厂问题专家赴汉口工作”报道（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8年8月，艾黎从香港飞抵武汉，向宋美龄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游说他拟定的工合计划。由于该计划已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外加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柯尔爵士的积极斡旋，宋美龄亦十分赞同。1938年8月5日，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同时代理总干事一职。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内正式成立

在武汉期间，艾黎还向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和博古（即秦邦宪）汇报开展工合运动的计划。周恩来对艾黎的工作鼓励有加，勉励他继续推进下去。博古则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使工合成为一项支持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并来延安开展工作。他建议艾黎游说政府尽可能将更多的工业设施从武汉转移至西北地区，因为西北很可能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他还请艾黎尽力支援中共新四军根据地的后方经济。艾黎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在后续开展工合运动中予以落实。



1938年，中共长江局领导成员在武汉合影。左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明、叶剑英

在艾黎等人的努力下，工合在全国非沦陷区共组织了近 6000 个合作社，并投入生产。1939 年末，艾黎亲赴陕北边区访问，筹建延安工合事务所。至 1942 年 9 月底，延安地区已成立有 41 个合作社。艾黎担任主任的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共组织了 600 个合作社，并在新四军根据地所在的茂名建立一所仓库，在绥安建立了一所专门为新四军维修、生产军需品的机械厂，在于都、瑞金、长汀、宁都和兴国，也都建立了工合事务所。



1939 年末，路易·艾黎（左一）与工合延安事务所成员在窑洞前合影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之前，宋庆龄于 1938 年 6 月 14 日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亲任主席。因共同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方针，中国工合运动始终得到了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持。



1938 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诺曼·法郎士、廖承志

保盟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和推动首先体现在宣传工作上。宋庆龄以保盟主席的身份，通过演讲、撰文，以及与国际援华机构、个人通信等方式宣传工合的性质和作用，呼吁援助新生的中国工合事业。1938 年 8 月 15 日，宋庆龄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广播演讲，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支持和援助中国这一新生的进步的工合运动。



1939 年《今日中国》杂志刊登的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广播《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演讲摘录

1939 年 12 月，宋庆龄又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又称“中国工业合作社香港促进社”）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1940 年 4 月，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三姐妹联袂从香港飞赴四川，一同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的多个工业合作社。宋庆龄在视察工合成都事务所的工人欢迎会上讲话指出：“工业合作社事业，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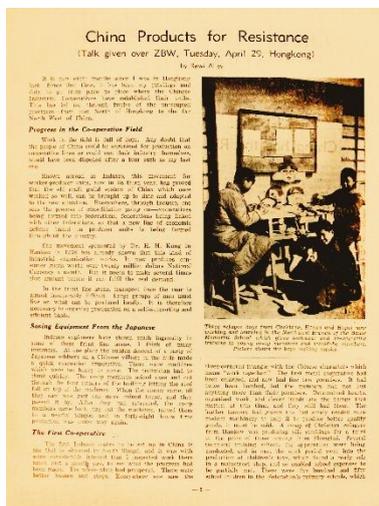
宋庆龄在视察工合成都事务所的工人欢迎会上讲话

保盟的英文宣传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和《保卫中国同盟年报》，经常刊载有关工合运动的报道和工作报告。在 1938-1939 年度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中，开篇卷首刊载了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孙中山夫人的呼吁》一文，呼吁全世界热爱和平和民主的人士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因为“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了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中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图文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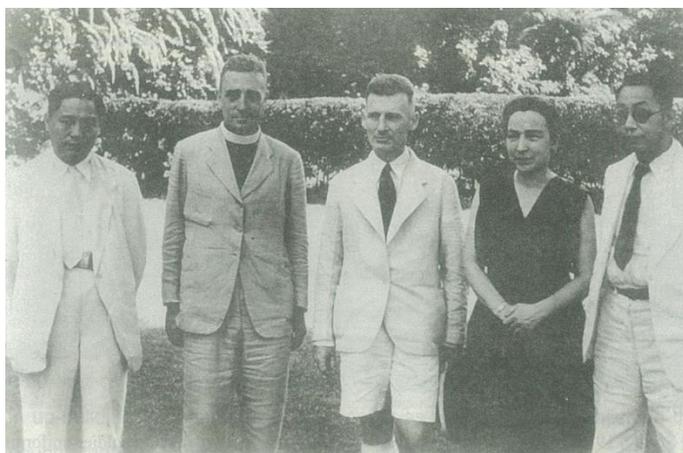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作为图文并茂的新闻月刊，对工合运动和艾黎的报道则更为丰富得多，陆续报道了《请援助西北》《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教育》《工合的“孤军”》《支援中国工合的一碗饭运动》，以及艾黎于1941年4月在香港所作的《中国为抗战而生产》讲话。艾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我在香港很高兴地看到，以中央银行的钟秉锋先生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以香港主教为主席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都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后者致力于把海外友人努力的联合起来，以帮助工合运动。对于全中国的工合成员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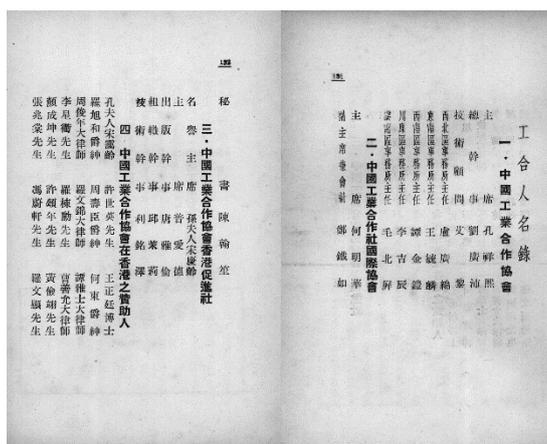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载的路易·艾黎  
1941年4月在香港所作的《中国为抗战而生产》讲话

艾黎提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简称“工合香港促进社”），由宋庆龄和艾黎、斯诺等人团结国内外知名人士于1939年1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之所以选定香港，是因为宋庆龄和艾黎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工合的援助，并将援助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不受国民党官员的控制和中饱私囊。艾黎曾说：“外国朋友

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因此，宋庆龄始终担任工合香港促进社名誉主席，首任执行主席为美国友人浦爱德 (Ida Pruitt, 中文名又作“普爱德”、“普艾达”)，艾黎、斯诺等 20 余人为委员。同年 5 月，宋庆龄前往香港码头迎接从莫斯科来港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并对陈翰笙说：“这次请你回国，主要是协助我搞工业合作运动。”不久，陈翰笙即出任工合香港促进社代理主席，顾淑型也在协助艾黎开展工合事务。



1939 年，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工合香港促进社部分成员合影。  
右起：陈翰笙、浦爱德、路易·艾黎、何明华、郑铁如



1940 年出版的《经济的新堡垒——介绍中国工业合作社》书中所附《工合人名录》

1939 年 7 月 21 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又称“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协会”或“工合国际”）在香港成立，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主教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艾黎任实地秘书。组织工合国际协会的目的在于代表中国工合协会接受各界对工合运动的援助，使援助资金不受重庆官方领导的中国工合协会的控制和支配。宋庆龄非常支持工合国际的工作，但没有担任过工合国际的名誉主席。在艾黎记忆中，宋庆龄介绍过许多人才到工合国际协会工作。



1940 年出版的《工合两年》扉页上的工合国际  
协会和香港促进社人员名单（上海市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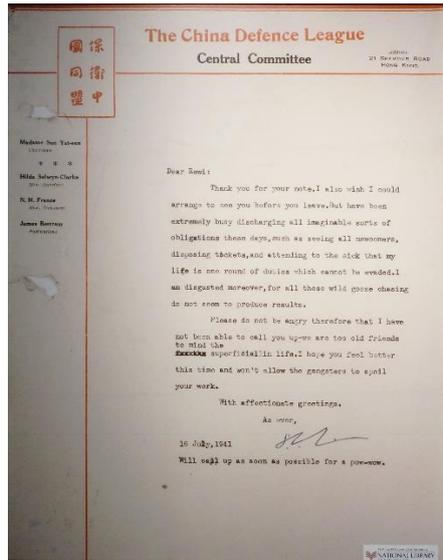
在宋庆龄的组织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举办多场活动筹募资金，用于援助中国工合事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 1941 年 7、8 月间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和同年 11 月举办的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一碗饭运动”以每券港币 2 元售价发售餐券 2 万张，认购者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茶室吃炒饭一碗，收入全部捐作中国工业合作社救济华北灾民的经费。宋庆龄亲自参与筹备，主持开幕及闭幕典礼，并发表演讲，阐明举办“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两个月期间，“一碗饭运动”出售的餐券和捐款的净收入为 22144.95 元港币和 615 元法币，英国援华会香港分会允诺补赠 2000 多元港币，使之凑足 25000 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协助其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工厂基金，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一碗饭运动在香港”新闻报道

为配合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募款活动，艾黎也两度专程从内地前往香港，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顾问的身份协助开展工作。在 1941 年 7 月 1 日“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特别放映了一部艾黎跋涉千里拍摄的工合影片，艾黎亲自向观众解说片中各镜头的意义，使大家对正在开展的工合事业印象深刻。





1941年7月16日，宋庆龄致函路易·艾黎，解释自己因忙于工作而无法分身同他会面。她深情写道：“我们是相识多年的老友，无须介意生活中的表象。”（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

1941年11月11日，保卫中国同盟又与工合国际在香港南华体育场旁的海军操场，共同举办集休闲娱乐、商品展销于一体的大型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轰动全港。宋庆龄出席开幕式并用英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支持工合运动的英、美等国友好人士表示感谢。开幕式结束后，宋庆龄和艾黎等人还参观了工合产品展览。百余种展品包括来自中国内地工业合作社生产的毛毯、丝织品、化工、机电等产品，其中许多是艾黎冒着极大的危险和困难，从内地运到香港的。据统计，为期三周的嘉年华会，累计吸引观众达100多万人次参与，共筹得港币2万元。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保盟为支援工合举办的又一次声势浩大、引人注目的活动。



宋庆龄在嘉年华会开幕式上演讲



1941年11月13日，香港《华商报》报道的“工合展览在嘉年华会”

#### 四、创办培黎学校获宋庆龄援助

皖南事变以后随着国共合作关系走向破裂，1942年底，艾黎因为长期支援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工合事业，被国民党官方控制的工业合作协会以“通共”为由解雇。后来，艾黎以工合国际实地秘书的身份继续开展工作，将全部精力用于创办培黎工艺学校。



路易·艾黎与成都培黎学校学生合影

早在工合运动兴起之初，艾黎就意识到，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对工人进行管理和技术

培训，故 1941 年起，艾黎就在江西赣州、陕西宝鸡和双石铺、四川成都等地试办培黎学校培训技术工人，同时免费招收贫苦学生就读。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抗战局势的变化，后来又集中西迁至甘肃兰州和山丹县，继续扩大办学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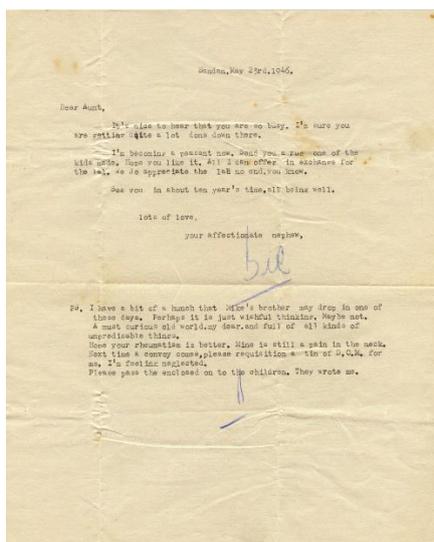
路易·艾黎在山丹培黎学校给学生上晨课

宋庆龄始终关心着艾黎的教育事业。1945 年 5 月，宋庆龄在致爱泼斯坦夫妇函中提到：“我们（指她与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将举行两场舞会，希望能筹集到两百万元，用于培黎学校和由贺耀祖夫人主管的难童收容所。”

**舞會籌款**  
孫夫人與薛穆夫人舉辦  
捐市救濟院及工合學校  
【本報訊】孫夫人及薛穆  
大使夫人將於本月十八十  
九兩日晚間假勝利大廈舉  
行舞會，籌款半數撥交市  
救濟院，半數撥交工合培  
黎學校。英國工合專家胡  
特來渝時，曾攜來價值四  
百萬元之機械贈培黎學校  
設備。舞票每張售二千元  
，茶點在內，兩夜共售六  
百張，計可得一百二十萬  
元，連同義賣摸彩等項，  
預計可得二百萬元。

1945 年 5 月 10 日，重庆《大公报》对宋庆龄举办舞会为工合培黎学校筹款的报道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于 11 月从重庆回到上海。12 月，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简介》中指出：“中国的战后重建时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新的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中国福利基金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为战灾儿童提供帮助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之一，艾黎的山丹培黎学校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



1946年5月23日，路易·艾黎致函宋庆龄，感谢她对培黎学校实验室的资助（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48年，宋庆龄曾派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旅外代表陈永淦去甘肃山丹县视察培黎学校。据陈永淦回忆：“1948年10月，宋庆龄主席派我去甘肃省山丹县，视察山丹培黎学校，它是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之一。行前，宋庆龄主席要我带一封信和一瓶白兰地酒，交给培黎学校校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我完成了这一任务，艾黎和我在培黎学校校门前，还拍照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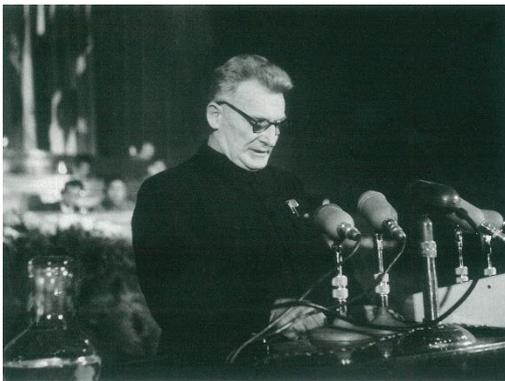


1948年10月，路易·艾黎与陈永淦在山丹的合影（陈计红女士提供）

艾黎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机构同中国福利会的关系一直很好。你主持的领养工作（指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帮助我们渡过了许多困难时期。”

# 五、老而弥笃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决定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尽心尽力。当山丹培黎学校移交给石油管理部门之后，艾黎定居北京，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他和宋庆龄一起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声援受麦肯锡主义迫害的美国友人鲍威尔夫妇。



1952年10月，路易·艾黎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

1956年10月20日 星期六

### 鲍惠尔案是对美国人民新的进攻

1956年10月19日，“鲍惠尔案”的真相大白。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

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

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鲍惠尔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麦肯锡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进攻的又一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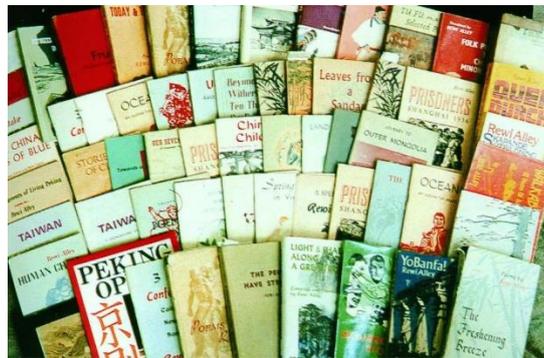
## 195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路易·艾黎撰《鲍惠尔案是对美国人民新的进攻》长文

19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出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通过发表演讲、起草会议决议、写诗著文，为宣传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做了许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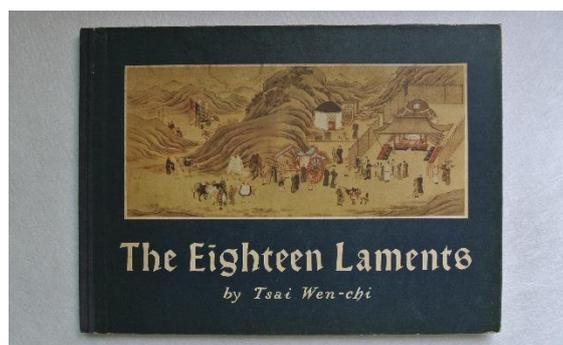
1950年代至60年代中，路易·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出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

1953年起，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他翻译出版中国的诗歌，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对友人的怀念之情；他走遍中国各地，写下了对中国人民的切身感受；他长期在《中国建设》《东方地平线》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新西兰家乡出版著作，利用各种渠道向世界传播新中国的声音。据统计，路易·艾黎先后出版了三十余部如纪实采访、诗歌和翻译著作。



路易·艾黎发表出版的30余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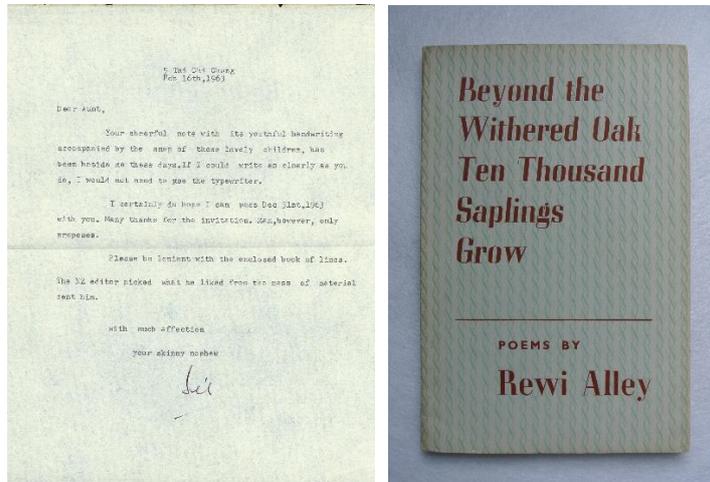
1963年，宋庆龄读过艾黎翻译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英文版后十分欣赏，特意推荐给身边的英文秘书。上海宋庆龄故居至今保存着宋庆龄收藏的20余本艾黎的赠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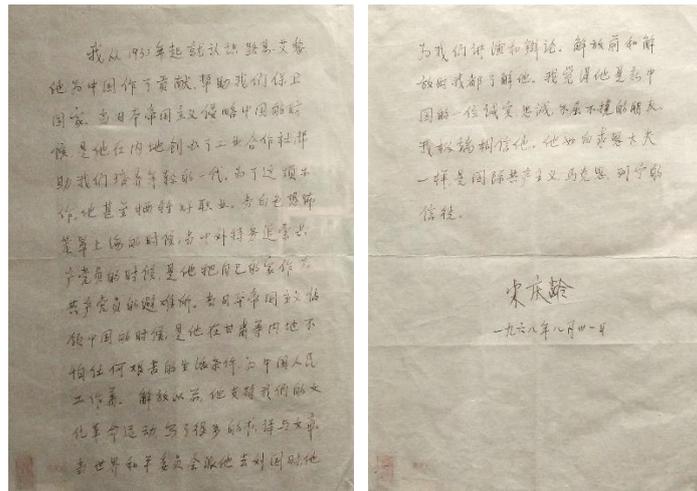
路易·艾黎赠予宋庆龄的《胡笳十八拍》，扉页有他的亲笔题赠寄语

在《病树前头万木春》诗集中，附有一张艾黎写于1963年2月16日的便笺，称呼宋庆龄为“阿姨”，落款署名戏称“你的瘦侄子 比尔”，因宋庆龄曾建议艾黎减肥，这张便笺也是他们数十年深厚友情的见证。



1963年路易·艾黎赠予宋庆龄的《病树前头万木春》诗集。书中另附有艾黎致宋庆龄的一封信笺

宋庆龄与艾黎之间的友谊在他们的晚年更趋深厚。“文革”中，许多在华的外国友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人身限制，艾黎也未能幸免。宋庆龄为保护艾黎，1968年8月31日，亲笔为艾黎写了封证明书，她写道：“我觉得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这封亲笔证明书也使艾黎免遭怀疑和迫害。事后，宋庆龄对送证明书的秘书张珏说：“我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



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为路易·艾黎出具的证明书（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藏）

在每年春节、元旦宋庆龄收到的贺卡里，艾黎的一份是最醒目的，这是用他拍摄的儿童照片特别印制的相册贺卡。宋庆龄有时也用艾黎定制的贺卡，写上祝福语赠送友人。

为艾黎庆祝生日是宋庆龄晚年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有时甚至提前数月就开始准备艾黎喜欢的食品、邀请宴会宾客。她还事先告诉寓所工作人员，艾黎有过敏性皮肤病，要选择他能吃的菜，排座位要挨着她便于谈话，并留下了许多为艾黎庆祝生日的合影。

1980年12月2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为艾黎庆祝生日的照片上，艾黎正在切蛋糕，宋庆龄高兴地在旁拍手称庆，气氛十分温馨，宋戏称他为“Rewi boy”。这是宋庆龄为艾黎庆祝的最后一个生日。



1980年12月2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庆祝路易·艾黎83岁生日

1981年春，宋庆龄被医生诊断患上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凌晨3点，得到宋庆龄病危紧急通知的艾黎，立即起身前往探视。艾黎来到宋宅后，宋庆龄已不能说话，但能听得见，神志也还清楚。在宋庆龄的病床前，艾黎说了声“路易在这里”，双眼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宋庆龄似乎听见了他的呼唤，隐约点了点头，这便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当晚，艾黎前往宋庆龄寓所瞻仰遗容，同时参加治丧委员会为她守灵。



JUNE 1981	
S	1 21 28
M	1 8 15 22 29
T	2 9 16 23 30
W	3 10 17 24
T	4 11 18 25
F	5 12 19 26
S	6 13 20 27

May 1981

Rain last night - Friday 15  
Cove

WEEK 20 : 135-230 At 4.30 am Low Chen  
Called to see Mr. Chen of an old  
Set. I go and find an  
elderly man in bed. He is a GP  
I can see he will be dead  
when I am here in bed. The  
passing of a general practice.  
The great bed down of the St. John  
In that was seen from  
The window which was little was  
the bed had a bed - the bed.  
a patient found had an  
has passed on the who  
under the grave.  
found a patient had an  
had a patient who had  
work all morning on Poin 115  
with some St. John  
It is a big case I think I  
had unexplained it would  
be.

1981年5月15日，路易·艾黎在日记中写下的探视宋庆龄病情的记录

1981年6月4日，宋庆龄骨灰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举行。艾黎作为列名第一的宋庆龄外国友人来沪出席安葬典礼，将一朵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放在她的墓前。



1981年6月4日，路易·艾黎把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放在她的墓上

## 六、永不消逝的记忆

斯人已去，空余思念。在宋庆龄逝世后举国悲痛的日子里，艾黎思及往事，心潮难平，在两天内写下了五首悼诗和两篇回忆文章来纪念宋庆龄，以寄托他的哀思。1981年5月29日当晚，艾黎就写下了《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刊发于次日的《工人

日报》。他在文中写道：“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1981年5月30日，《工人日报》刊载的路易·艾黎撰《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

是年9月，艾黎又在宋庆龄亲自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中发表了《回忆宋庆龄》长篇文章，饱含深情地回忆他们风雨同舟五十载的革命情谊。在艾黎1986年出版的《自传》中，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巨星陨落”的文章纪念宋庆龄。



1981年9月《中国建设》（纪念宋庆龄特刊）中刊载的路易·艾黎撰《回忆与思索》一文

1986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五周年时，艾黎抱病来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在宋庆龄陵园举行的纪念碑落成典礼，他发言讲到：“我很感激收到这一邀请，使我能再一次向我们时代这位最伟大的女性致敬。宋庆龄的一生是进步妇女的优秀代表。”



198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举行纪念碑的落成典礼，路易·艾黎（左二）抱病来上海参加，图为典礼上他与习仲勋（左一）等人的合影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90年的传奇人生，而这其中有60年都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什么促使一个新西兰人来到中国，并在此度过他的一生？艾黎曾自言“伟大的革命带来了好处，它激荡着那个时代的一切，正象它如今仍然激荡着我们；同我一道走过来的人们，至今把我当做同行者的人们……多种因素把我同中国联系在一起……我始终感到欣慰，由于曾经在这条或那条道路分担它伟人的抱负。”宋庆龄正是使他踏上中国革命的引路人，并不断给予他激励和力量。



1987年4月21日艾黎来华6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其举行庆祝招待会

##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马海德 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

王婉如



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马海德

2020年9月26日是宋庆龄的国际友人马海德诞辰110周年纪念日。193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美国青年马海德来到上海。在来华工作的55年中，他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1936年，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前往陕甘革命根据地。1937年2月，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协助国际和平医院建设，为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争取国际医疗援助。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履行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代表的使命，为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任卫生部顾问，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个黎巴嫩籍工人家庭。作为家中长子，贫苦的家庭环境让马海德养成了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品格。在高中时，他曾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由于幼年时全家患病，曾受到一位老医生的无偿帮助，马海德立志成为一位正直、善良的医生。



马海德（后排中间）与弟妹三人的合影



高中时期的马海德

1927 年秋，马海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医学预科。两年后，他怀揣成为医生的梦想，转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医学院攻读临床诊断。1931 年，他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深造，于 1933 年 7 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 马海德在瑞士日内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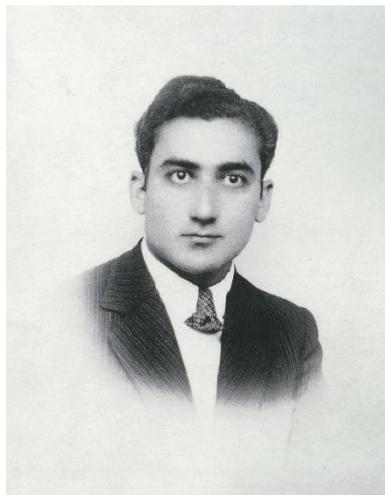
毕业后，马海德与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克士、雷文森决定一起前往中国。他计划在中国进行医学实习，考察东方热带病，同时了解中国社会情况。1933年9月5日，他们抵达上海。尽管一开始他并不打算在中国逗留太久，但在接下来的55年里，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马海德（左）与同学克士（中）、雷文森（右）在法国实习时的合影

## 一、结识革命导师宋庆龄

初至上海，马海德与克士、雷文森在仁济医院、同仁医院等几家医疗机构内工作。1934年1月，他们在九江路10号大陆银行大厦内开设了诊所。通过工作，他看到了中国更真实的一面——“战乱、饥饿、瘟疫，人们饥寒交迫”。复杂的社会现状让他逐渐意识到仅仅医治人们身体上的疼痛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思考社会方面的问题。



1933年马海德到达上海，时年23岁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仁济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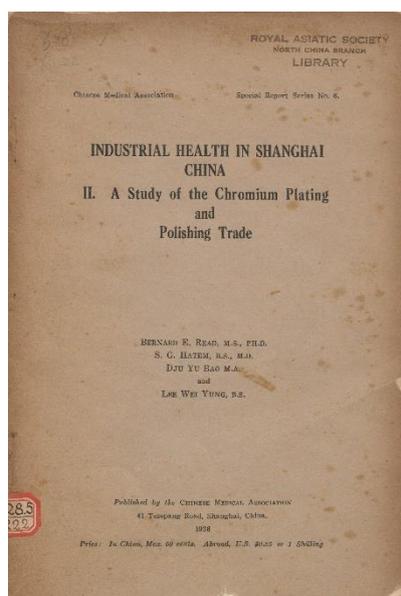
马海德 1934 年在诊所内留影

不久，马海德认识了在上海的一些外国进步人士。与汉斯·希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等人的交往和谈话使他明白，有人正在努力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只有社会得以改善，医生才能真正发挥长处。1934 年 11 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多位国际友人在史沫特莱家中聚会。正是在这场聚会上，马海德结识了他敬仰已久的孙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 1934 年在上海留影

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艾黎和希伯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马海德也是其中一员。在学习小组中，他第一次阅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社会。宋庆龄鼓励马海德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在艾黎的帮助下，马海德以科学研究为名，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情况，并发表学术报告《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英文)。在目睹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后，马海德的思想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认识到：“工人的出路是反抗，社会的出路是革命，在这场斗争中我应该和中国工人站在一起。”



1936年5月，《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正式发表

马海德的进步加深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她将马海德的诊所安排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还派他作为医生去南京的监狱探望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部驻上海工作人员牛兰夫妇。1935年夏天，宋庆龄嘱咐马海德开车将两位客人送到码头，登上一艘开往苏联的轮船。后来，他才知道这两位客人是前往苏联，试图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陈云和陈潭秋。马海德还为宋庆龄支持创办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撰稿，呼吁民众团结抗日。通过协助革命工作，马海德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日益深厚，参加中国革命的决心更加坚定，正如他日后所说：“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救中国”。

## 二、扎根陕北的马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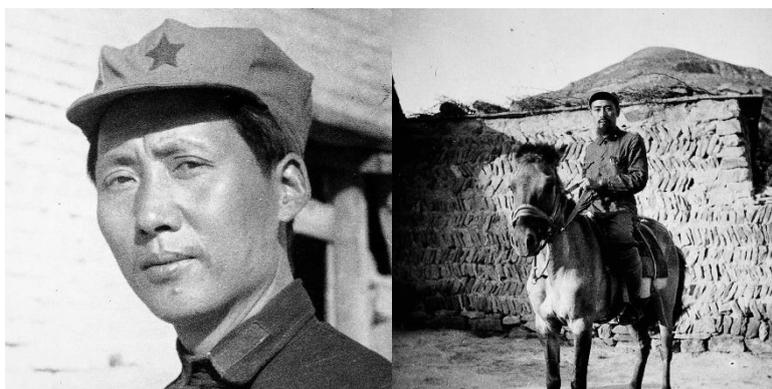
马海德多次向宋庆龄提出前往革命根据地工作的请求，但一直未能成行。1936年春，宋庆龄获得中共中央拟“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的消息。6月，经宋庆龄介绍，马海德终于如愿以偿，奔赴陕北。与他同行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据马海德回忆，他与斯诺各自出发，在郑州会合，前往西安。在西安短暂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与装扮成古董商的“王牧师”董健吾接头，随后穿越层层封锁，抵达陕北。





马海德和斯诺到达陕北保安时，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7月9日，马海德与斯诺到达安塞白家坪，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还为他们拟定了陕北考察的线路和项目。7月13日，他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和革命战略等。这让马海德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将这几次与毛泽东的谈话称为“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斯诺赠送给宋庆龄的毛泽东、周恩来照片（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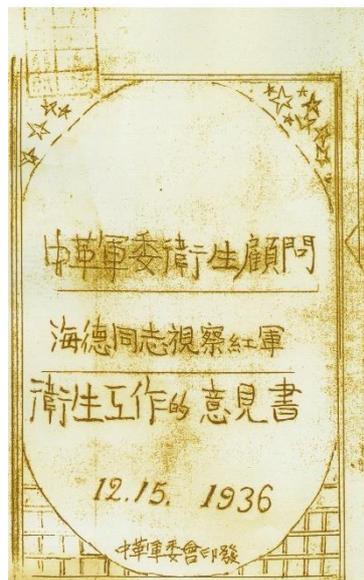
毛泽东对马海德提出了一项特别委托，请他在考察途中关注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单位，对根据地医疗条件的改善提出具体的意见。于是，马海德带着任务，在燕京大学学生黄华的陪同下，与斯诺一起进行考察。9月，斯诺结束采访准备返回保安，马海德决定留下来。分别之时，马海德嘱咐斯诺不要将他写进著作中，因为一旦他在陕北的事情被报道出来，在上海的朋友可能因此受到伤害。



马海德在考察途中为斯诺（右一）拍摄的骑马照

与斯诺分别后，马海德和黄华跟随红一方面军南下西兰公路，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当时，马海德还没有中文名字，为了便于结识群众，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姓——“马”，这是当地回族同胞中常见的姓氏。“海德”二字则来源于他的美国姓。于是，“马海德”这个名字逐渐在根据地中为人所熟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马大夫”或“老马”。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马海德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在走访和行军过程中，他考察了红军前线和后方的医疗卫生单位，用英文撰写《视察红军卫生工作的意见书》，并提出了改进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亲自任命马海德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



马海德撰写的红军卫生工作意见书中译版封面（周幼马提供）

马海德被根据地朝气蓬勃的革命氛围深深吸引，他看到一支纪律严明、意志如钢、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队伍，感受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决定参加革命。1936年底，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37年初，马海德随部队从保安进驻延安，于2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马海德拍摄的延安宝塔山照片

初到延安时，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落后，而且军队里受过正规医科训练的医生屈指可数。作为卫生顾问，马海德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卫生工作的前线。他不仅参与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和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还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当地群众治疗疾病，成了延安最受欢迎和信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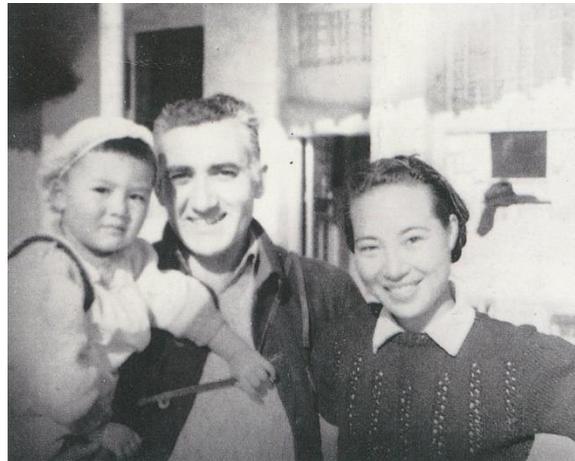
为缓解毛泽东的风湿病，马海德特地请木匠做了一个球台，与他一起打乒乓球



1939年周恩来右肘受伤，经马海德等人的治疗后，进行康复锻炼

马海德很快学会了中文，融入了延安的工作和生活。在谈及延安时，马海德说：“对于这地方，有一桩事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儿绝对没有职业上的妒忌。我们所有人一起工作，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使得医学恢复了本来的任务，医学原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一种科学。”

在延安，他践行着医生的初心和使命，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爱情。1940年3月，马海德与鲁迅艺术学院的周苏菲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登记结婚，安家延安。尽管延安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始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苦中作乐，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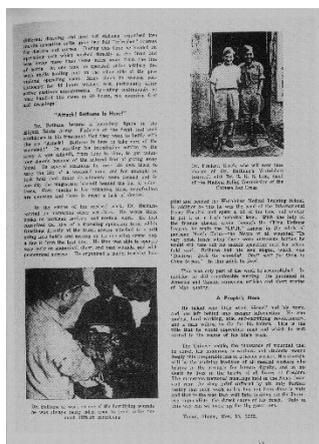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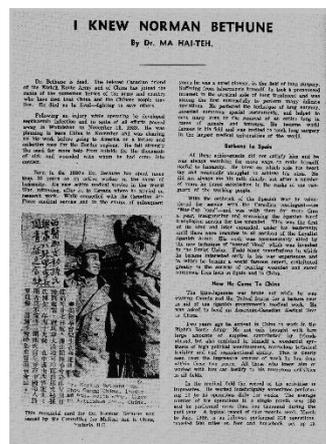


马海德、苏菲与儿子周幼马在延安的合影

### 三、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动员和争取国际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战。

1938年1月，宋庆龄策划协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来华支援中国抗战。3月，白求恩大夫携医疗队抵达延安时，马海德等候在延安城门外迎接，并向他们介绍八路军医疗工作情况和敌后游击战中的卫生、医疗特点，带领他们参观了设在窑洞内的医院和安置在农家的伤病员室。此后，他还接待了由保盟协助前往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等，为他们在边区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帮助，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不久，马海德在《保盟通讯》上发表了纪念文章《我了解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马海德与米勒大夫合影

马海德正式担任保盟驻延安代表是在 1939 年 9 月。是月，保盟荣誉会员斯诺来到延安，他在延安和边区领导人讨论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并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做出建议。

1940 年代初，为方便马海德在边区进行工作，宋庆龄赠送给他一台照相机。这台德国制造的 120 型“蔡司”牌相机，是宋庆龄经保盟募捐而来。在延安，马海德用这台照相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他将照片寄给保盟，供他们进行宣传。



宋庆龄赠送给马海德的德国制造的 120 型  
“蔡司”牌相机（北京宋庆龄故居藏）

马海德担任保盟驻延安代表后，始终与宋庆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定期向她汇报边区的医疗工作、医院和制药厂的情况，使宋庆龄和保盟能够及时将边区军民英勇抗日以及医药匮乏的情况告诉海外人士，将募集来的大量款项、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



马海德在延安

抗战时期，马海德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工作。据统计，他在门诊部接诊病人达 5 万人以上。《解放日报》曾对他的事迹做了专题报道，号召所有卫生工作者向他学习。在忙于医治病患的同时，他还协助延安各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和制药厂的建设。在此期间，宋庆龄领导保盟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经费资助，使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和边区其他医院得以迅速发展。1939 年至 1940 年 2 月，保盟向国际和平医院捐赠 46878.46 元港币和 6800 元国币。1942 年至 1943 年，保盟为医院提供的经费达到 280 万元国币，这笔捐款不仅用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建设，还分发延安 3 家国际和平医院分院使用。至 1944 年，延安地区的医疗体系已达到一定规模，抗日战士和老百姓们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



位于延安刘万家沟的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大门和全景



马海德与魏一斋医生的合影，魏一斋曾任中央医院（194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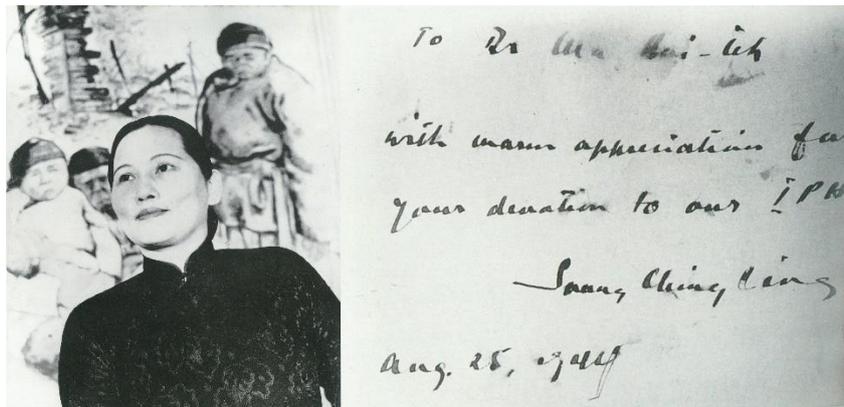
## 对外改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 医务主任、院长

虽然马海德和医务人员们克服了许多障碍和困难,但设备和药物的缺乏仍然困扰着他们。1944年7月26日,马海德致函宋庆龄,在信中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为每一个在敌后作战的战士提供一个急救包,里面放有一包磺胺粉和药片……我们的战士不惧怕日本人,如果我们能够消除他们对于受伤的恐惧,他们的勇气将不可战胜。”1944年下半年,宋庆龄曾通过美军观察组为延安输送了大量医疗物资。7月,美军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时,随机带去了宋庆龄支援延安的医疗药品和设备,其中包括马海德在信中提到的磺胺药品。



1944年7月26日马海德致宋庆龄函(英国外交档案)

8月,马海德收到一张宋庆龄赠送给他的肖像照。照片上,宋庆龄站在一幅宣传抗日的海报前,眼神坚定地凝视着远方。照片背后是宋庆龄的亲笔题词,她写道:向你对我们国际和平医院所作的贡献致以真挚的感谢。这张照片是宋庆龄对马海德多年来在边区辛勤工作的鼓励与肯定。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与马海德虽未曾谋面,但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工作中共同面临的困难、秉承的宗旨和付出的努力,令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宋庆龄赠送给马海德的照片及题字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







宋庆龄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医药物资

为争取联总对解放区的支持，解总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3、4月间，马海德陪同联总驻华办事处的外科医学专员艾乐思等人参观位于张家口和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艾乐思在看到解放区物资极度匮乏的现状后，计划把全部联总救济物资的20%至35%送往解放区，并始终支持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



1946年3月，马海德（右二）、傅莱（右四）陪同艾乐思（左四）等人参观张家口国际和平医院

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的代表和解总的顾问，马海德始终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这一时期，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共同努力令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年9月，曾宪植（左二）与王安娜（右四）陪同宋庆龄在北平会见解总秘书长伍云甫（左一）、副秘书长熊瑾玠（右三）、业务主任林仲（右二）及顾问马海德（右一）

## 五、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在延安的十载春秋中，马海德不仅致力于建立和开展边区医疗事业，还积极参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1937年11月，马海德从五台山回到延安，准备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此时，廖承志邀请他参与新华社英文部的工作，担任英文翻译，并采写一些揭发日本侵略者法西斯行径的英文消息，向国外读者播发。1941年起，马海德经常为中共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 撰文。这份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对于加强抗战对外宣传和开拓中共对外宣传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海德与廖承志在延安的合影

马海德是延安的义务接待员，时常与前来边区访问的国际友人打交道。他接待过白求恩、柯棣华、米勒等支援根据地抗战的外国医生，招待过多位前来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1944年，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一批批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访问延安。马海德担任中央军委外事组顾问，陪同来访者考察、参观，耐心而有说服力地同他们交谈，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中国人民不可阻挡的前进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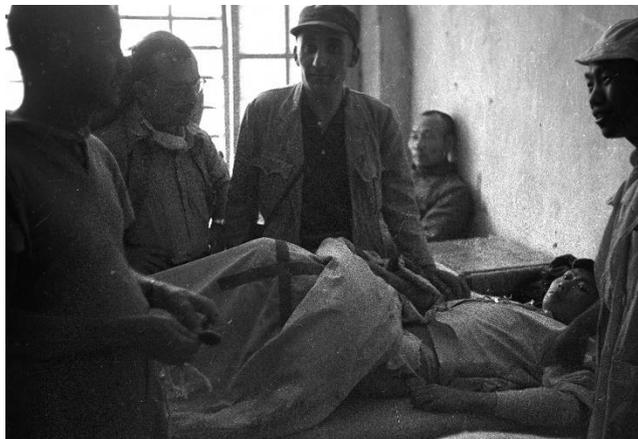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与马海德在延安机场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进行采访，马海德陪同爱泼斯坦等人前往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进行考察。马海德的言谈举止给外国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里森·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马海德全身心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卫生服务工作，是一个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在采访过程中，外国记者们被延安的革命氛围所感染，他们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报道。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六位外国记者，前排左起：普金科、武道、爱泼斯坦、福尔曼；后排左起：夏南汉、斯坦因、毛泽东



马海德（中）带领中外记者在医院内考察，左二为爱泼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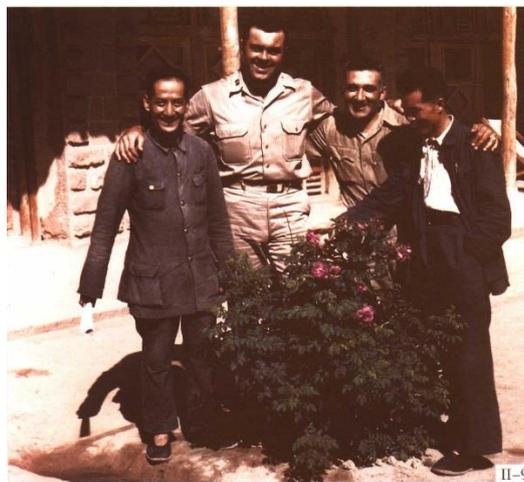
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了解中共军队的实际情况。马海德作为中方工作人员陪同观察组成员参观，他和美国士兵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的情况，争取他们的了解和支持。马海德说：“延安的国际友人们带着同情而来。在看到我们当时的工作和战斗之后，他们成了我们的朋友。”

周副主席  
马海德 译

美军观察组八月份在延安期间的工作计划预定表

日期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负责人
1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3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4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5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6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7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8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9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0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1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2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3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4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5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6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7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8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19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0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1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2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3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4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5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6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7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8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29	上午 8:00-11: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30	下午 2:00-5:00	延安	参观延安城	马海德

在美军观察组1944年8月份的工作计划预定表中，马海德作为中方工作人员陪同他们参观国际和平医院



中央外事组成员马海德（左三）、黄华（左一）、柯柏年（左四）与观察组成员多姆克（左二）合影

1946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其间，他向美国代表团成员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北平的外国朋友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



马海德在北平军调部办公地点（即协和医院）的门前

## 六、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此之前，马海德已随叶剑英部队来到北平西郊颐和园内，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13年艰苦战争洗礼的马海德，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来了这伟大的日子。不久，经周恩来批准，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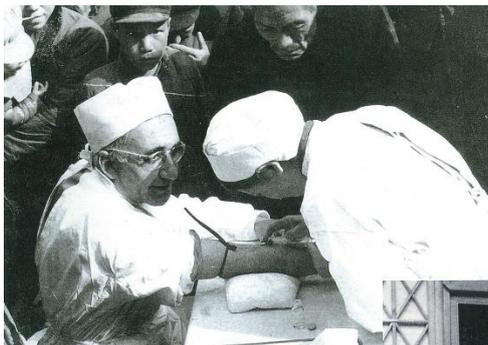


1949年初马海德在北平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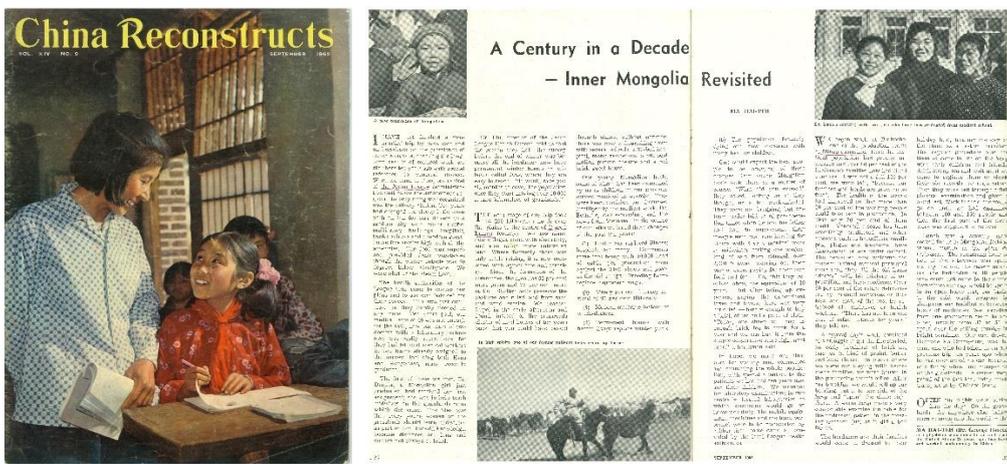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马海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在担任卫生部顾问期间，他坚持每周都到协和医院出门诊或参加会诊。1953年，马海德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建立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建议，并参与筹建工作。1954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成立，马海德和同事们在共同研究后，首先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消灭性病的计划。此后，他每年都带领医疗小组走访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在马海德与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至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已基本消灭了性病。同时，边远地区的卫生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马海德在新疆开展医疗工作



马海德亲自示范抽血，消除群众疑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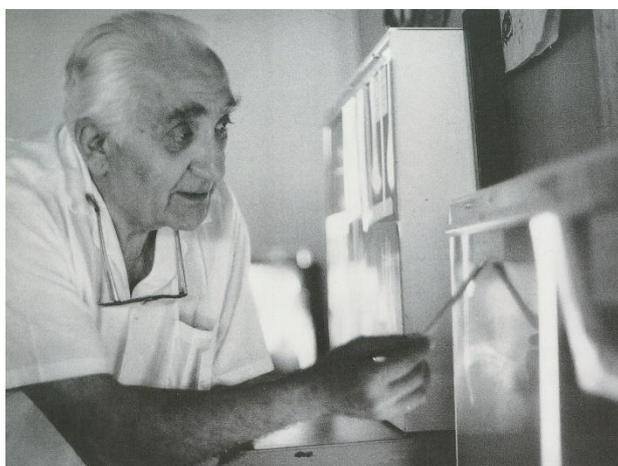


1965年，马海德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十年，一个世纪——重访内蒙古》，感慨内蒙古医疗卫生工作的突飞猛进

在巡诊过程中，马海德带领医疗队有意识地开展对麻风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他们深入麻风村、麻风院，为了扭转社会上对麻风病人的偏见，马海德主动和麻风病人握手。他不断引进和推广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建立广泛国际联系，为加速消灭麻风病的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麻风病已得到有效控制，患者人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万人减少到20万人左右，这些成绩凝聚着马海德和医务人员的心血和奉献。



马海德看望麻风病人，握着他的手作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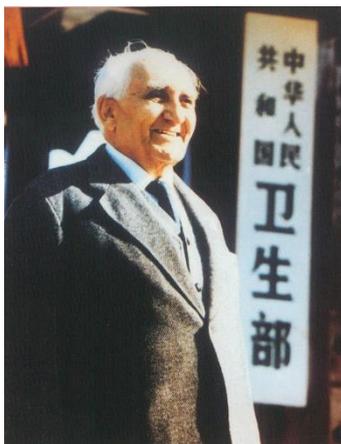


马海德在广东省麻风病院里看 X 光片

1986 年，为表彰马海德在根除中国的性病和防治麻风病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为改善中国人民的卫生福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他被美国艾伯特·玛丽·拉斯克基金会授予艾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这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医学奖项之一，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他在颁奖仪式上表示，荣获该奖项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而且也表明中国人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1987 年，马海德荣获世界麻风病防治最高奖——国际甘地奖。1988 年 9 月 23 日，卫生部为表彰马海德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1986年11月12日，马海德在美国纽约  
荣获1986年度艾伯特·拉斯克医学奖



1986年马海德在卫生部门前留影

## 七、绵延半个世纪的友谊

马海德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图书——《中国福利会二十年》，这是1958年宋庆龄赠予他的。宋庆龄在扉页上亲笔题词：“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记得你治愈了我受伤的手指。”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当时宋庆龄的手指患化脓性甲沟炎，马海德用冷冻麻醉为她动了一个小手术。20多年过去了，宋庆龄仍记着马海德对她的帮助和照顾。



宋庆龄与马海德在友人的聚会上握手致意

马海德对宋庆龄也满怀感激，在他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仍关心马海德的革命道路。20世纪50年代起，马海德经常带医疗队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回京后向宋庆龄汇报工作情况。他一直记着宋庆龄的叮嘱：“我一直关心着你，看你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好不好。如果走得不好，我是要批评你的。”

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女士说：“宋庆龄与马海德保持了长久的、真挚的友谊，她关爱我们家里所有的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导致马海德家的房子被震裂，宋庆龄闻讯后十分担忧。在获悉北京的好朋友们都安然无恙后，她才放心。8月9日，马海德致函宋庆龄，向她表示感谢，并关心她的健康情况。他在信中写道：“当你的信使来北京把你的关怀和慰问带



给我们时，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你必须保重身体，要做的事情很多……你需要有一个好的体魄。”



1979年9月，宋庆龄设家宴为马海德祝寿

马海德的住所和宋庆龄北京寓所距离很近，均位于什刹海边。宋庆龄寓居北京期间，不仅常常托人给马海德一家送来食物，还多次邀请他们一家参加友人聚会。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刚到《中国建设》任摄影记者时，宋庆龄鼓励他为国家、为人民勤恳地工作。马海德的孙子马骏在儿时经常收到宋庆龄寄来的《儿童时代》，杂志的套封有宋庆龄的亲笔手迹。



1974年7月，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招待友人，马海德及夫人苏菲等出席作陪

1981年5月29日晚，宋庆龄与世长辞。在她最后的日子，马海德作为朋友、医生一直守护在她的身旁。宋庆龄去世后，马海德参与守灵、追悼大会和骨灰落葬仪式，撰写多篇纪念文章寄托哀思。在《我的革命引路人——宋庆龄》一文中，他深情地写道：“你是我的导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世上还有什么比我此刻的心更痛楚，世上还有什么比你的友情更值得记忆。”



国际友人在宋庆龄遗体前守灵。

左起：路易·艾黎、马海德、西园寺公一、  
耿丽淑、宫崎世民、柯如思、爱波斯坦、艾德乐



1981年6月5日，宋庆龄骨灰落葬典礼翌日，马海德等人再次前往宋庆龄墓献花致敬。（艾黎生前秘书李建平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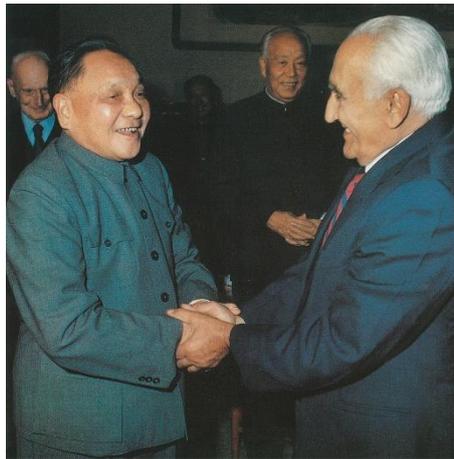
## 八、人民的大夫，无悔的人生

马海德晚年身患癌症，前后经历过8次较大的手术，但他仍坚持定期坐诊，为老百姓医治疾病。他还多次带领医疗考察组出国访问、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于中国人民。在担任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期间，他提交了多条具有建设性的提案。除繁重的医务工作外，他还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许多努力，经常向一些来访的外国人士介绍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对世界所具有的影响。



马海德在协和医院为婴儿治病

1983年11月22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五十周年招待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对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五十年，不容易。”



邓小平在招待会上与马海德亲切握手

马海德在招待会上致答谢词，他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半个世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漫长的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我，能够置身于中国人民斗争的行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在建设的年代里，我又能把我的劳动同中国人民的劳动融为一体，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



### 马海德在招待会上致词



1988年5月25日，马海德在家召开研究麻风病防治工作的会议，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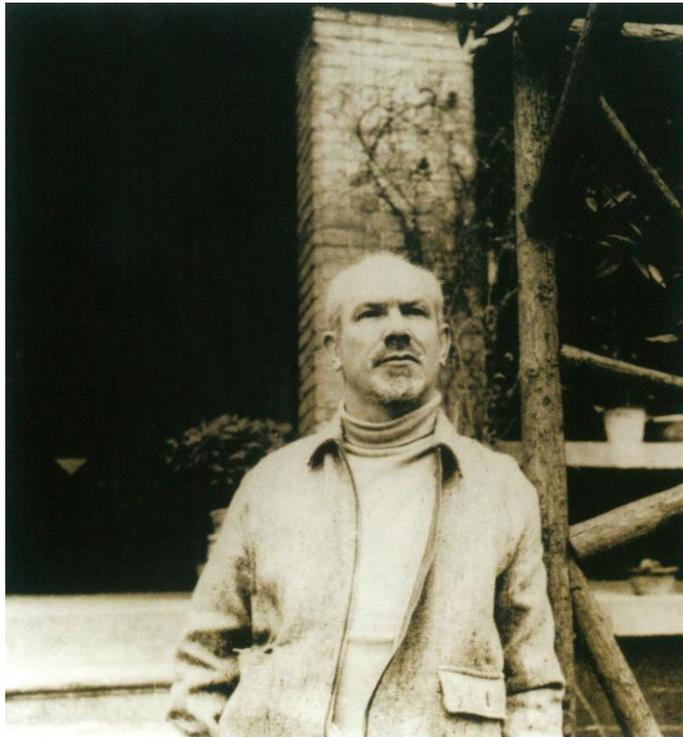
由于长期处于繁忙的工作状态，马海德的健康每况愈下。1988年10月3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一生的马海德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78岁。家人们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分别安置在三个地方。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部分被送回故乡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安葬，余下的一部分撒入了延安的延河中。

对于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马海德无怨无悔。他曾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巧合的是，宋庆龄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我必须重新再生活一次，我会同现在完全一样生活。”马海德对宋庆龄充满着无限感激，在他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仅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更是他终身学习的榜样。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加拿大医生

郑培燕



1938年初白求恩在武汉留影（詹姆斯·贝特兰摄）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这是一个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名字。20世纪30年代末，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北美著名胸外科专家，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由美国援华会资助，来华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以身殉职。毛泽东主席曾经亲著《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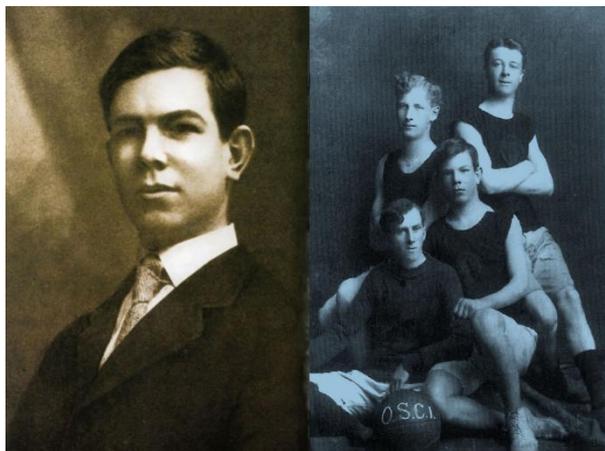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主席曾经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白求恩的来华，与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以及她创立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今中国福利会前身）有着密切联系。她曾在回顾中国福利会历史时深情地说：“保卫中国同盟曾介绍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前往解放区服务；白求恩大夫竟至在建设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时呈献了他的生命。”白求恩来华之初，保盟尽力提供支持，并积极为之募集医疗物资。在保盟的努力下，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建立的模范医院，成为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保盟通过多方渠道，为该院募集资金和医疗物资；白求恩以身殉职后，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向海内外呼吁以增加援助的行动来继续白求恩的事业，弘扬白求恩的精神。

## 一、优秀的加拿大共产党员

1890年3月，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祖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多伦多市著名的外科医生。自幼年时期，白求恩便立志成为像祖父那样的名医。



青年求学时期的白求恩

青年时代的白求恩当过工人，卖过报纸，做过教师，和劳动人民有过广泛的接触。1916

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1935 年，白求恩因医术精湛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1916 年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成名后的白求恩，始终惦记着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他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批评医疗制度的弊端，不仅呼吁“医生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团体，到贫民区去，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身体力行，主动为贫困患者开展诊疗服务。

1935 年 8 月，白求恩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参观访问期间，他会见了巴甫洛夫，参观了医院、疗养院，研究了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措施，印象极深。自苏联返加后，白求恩渐渐与加拿大共产党接近，开始参加魁北克省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是年秋，白求恩发起成立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促进会并任会长。该会的主要宗旨是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有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百余人参加。此后，他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倡导社会化医疗制度。11 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这一人生中的重要抉择使得他有了核心信仰。







1937 年白求恩在马德里前线

1936 年冬，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担任加拿大援助西班牙医疗队队长。在赴西班牙的前几天，白求恩写下了他的墓志铭：生为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白求恩在西班牙建立流动输血服务站，成为战地救护的重要手段，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

1937 年夏，白求恩在加拿大和美国巡回演讲，为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募捐，足迹遍及魁北克、温尼伯、芝加哥等地。在温尼伯演讲时，白求恩公开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告诉听众：“我很荣幸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7 月，中国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对此，白求恩在加拿大演讲时指出：“章鱼状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四处伸出触手，日本侵略中国即是一例。” 他决心到中国去，实现他“为人类福祉做些事情”的诺言。

## 二、医疗援华的先行者

1937 年，毛泽东与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派遣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同年 8 月，史沫特莱以两人的名义，分别给美共、加共、共产国际、美国红十字会等发出信件，呼吁援助。



1937 年史沫特莱在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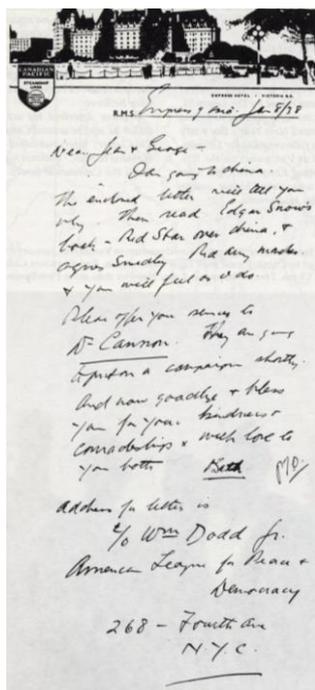
几乎在同一时期，白求恩与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巴克取得联系，建议派遣医疗队前往中国帮助共产党的八路军。10月前后，加拿大共产党决定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因资金匮乏，蒂姆·巴克与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取得联系，决定两国组成联合委员会，白求恩受邀成为其中一员。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白求恩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白求恩前往美国纽约与美国援华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商谈并筹备援华问题。他与刚从延安返回美国的援华会负责人菲利普·贾菲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到深陷困境的八路军急需有经验的医务人员，他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八路军提供医疗援助的决心日益坚定了。

1938年1月，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由美国援华会赞助，白求恩与美国医生查尔斯·爱德华·帕森斯、护士琼·尤恩（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汤姆·尤恩的女儿）组成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以美国援华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捐赠款项购买的医疗用品，从温哥华乘船启程，前往中国，开启了他为中国人民抗战无私奉献的艰辛历程。



白求恩（左一）、尤恩（左二）、帕森斯（左四）组成的援华医疗队

关于前往中国的原因，白求恩在一封信中曾写道：“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



白求恩在信中提及斯诺、史沫特莱和他们关于中国的书

白求恩信中所提及的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都是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相识并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6 年与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一起，经宋庆龄联系，前往陕北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便是斯诺以陕北采访见闻为依据写成的。乔治·海德姆则留在陕北，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卫生顾问，并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后来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史沫特莱在 1930 年代初即与宋庆龄相识，是最早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之后到延安深入接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国抗战，也是白求恩与美国援华会之间的联络人，后来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编外战友。

### 三、支援白求恩去解放区

1938 年 1 月底，白求恩一行到达香港。此时的香港，已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既是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也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渠道和集散地。为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在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中共人员往来香港，安排海内外人士赴延安和其它解放区，联络世界各国援华组织和海外侨胞支援抗战。一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宋庆龄，也于 1937 年底接受中共建议抵达香港，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宋庆龄到达香港后，廖承志等多次与她商讨如何开展抗战救援工作的问题。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留影

白求恩一行抵港后，准备取道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为旅途安全，必须由党的驻港办事处向党中央汇报并与汉口取得联系。同时，白求恩一行需要在港添购一些药品及医疗器材。宋庆龄在白求恩抵港后，便让廖承志通知地下交通员熊志华前往酒店与白求恩见面。第二天，廖承志又在熊志华的陪同下前往酒店与白求恩会见，代表党对白求恩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与欢迎，并向白求恩介绍了边区对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迫切需求，以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白求恩表示希望早日动身，尽快到前方抢救伤员。廖承志还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姐姐廖梦醒以及表妹夫邓文钊组织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以进一步争取海外援助。在白求恩一行在港逗留的几日内，熊志华与几位同志陪同白求恩一行在香港采购了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连同白求恩原先带来的医疗物资，总共装了20余箱。

2月初，白求恩一行抵达汉口。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亲切会见他们，并安排医疗队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林可胜取得联络，白求恩和尤恩表示愿意尽快去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工作。周恩来还为白求恩去延安做了安排，他指定自己的秘书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办理去延安的手续并安排专人护送。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队长林可胜

在汉口，白求恩还遇到了已结束华北前线战地采访的贝特兰。白求恩提及医疗物资缺乏的问题，贝特兰只能勉强募集到一些资金和供给品给他们。在武汉期间，贝特兰曾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周恩来特别同他讨论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问题。他们以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从华北前线带回来的关于伤员需要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商定了一项计划——在华北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下设五个分院，并继续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周恩来请贝特兰把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带交给香港的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前，贝特兰将自己的所有行头——御寒的衣裤、帽子和行囊统统送给了白求恩。后来从白求恩在延安和华北各地拍的一些照片上，他还看得出白求恩仍穿着其中的某些衣物。贝特兰还为白求恩拍摄了“在中国拍下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即后来为人们所广泛熟悉的白求恩酷似列宁的那张照片。

1938年2月下旬，白求恩一行离开武汉去延安，途中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历尽艰辛，于3月抵达西安。为了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住10天左右。其间，中共特别党员、西北军将领张克侠途经办事处时突发急性阑尾炎，白求恩为他进行了手术治疗。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白求恩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过的小屋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室是白求恩为张克侠做手术的临时手术室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提供)

1938年3月底，白求恩一行带着三汽车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达延安。美国医生马海德前来迎接他们。在延安，白求恩及护士尤恩受到毛主席亲切会见。在延安期间，白求恩视察

中央医院、诊治伤员，为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工学院、东北干部训练团学员作报告。不久，白求恩由延安出发，率领医疗队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其间白求恩持续致信史沫特莱和美国援华会催促对根据地进行援助。6月，八路军收到了美国援华会的捐助款项。



1938年白求恩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

同一时期，贝特兰于3月抵达香港，向宋庆龄提交了前线缺医少药的报告，转达周恩来关于募集医药物资支援抗日前线，特别是援助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意见。不久，老朋友廖承志请他参加了一个在邓文钊家召开的会议，讨论在支援白求恩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更大规模的组织，独立地向海外公众争取援助，并和海外援华救济团体建立联系，以打破国民党官办的“抗敌后援会”对外援的垄断和中饱私囊的弊端。廖承志提议请宋庆龄出任主席。之后，宋庆龄委托贝特兰到世界各地介绍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情况，吁请海外救援机构援助中国抗战，争取知名人士支持保盟工作。1938年6月14日，保盟正式在香港成立。



宋庆龄与保盟部分中央委员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诺曼·法郎士、廖承志

保盟创立之时，白求恩一行已经到达岚县，受到军民热烈欢迎。6月17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冲过敌人封锁，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聂荣

臻司令员聘请白求恩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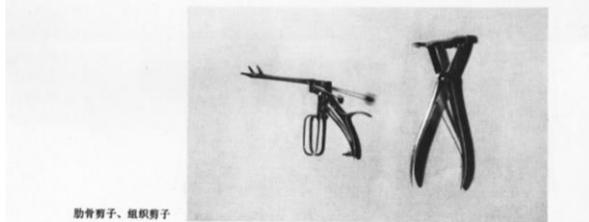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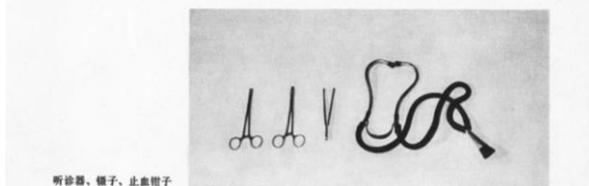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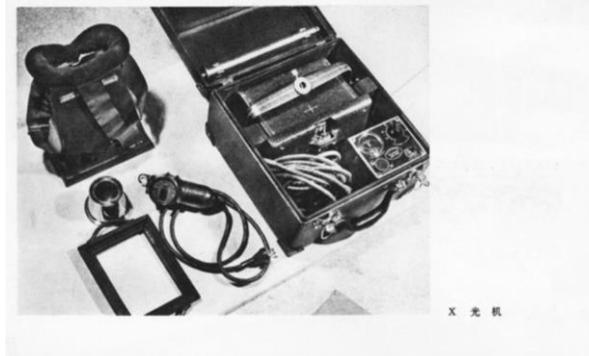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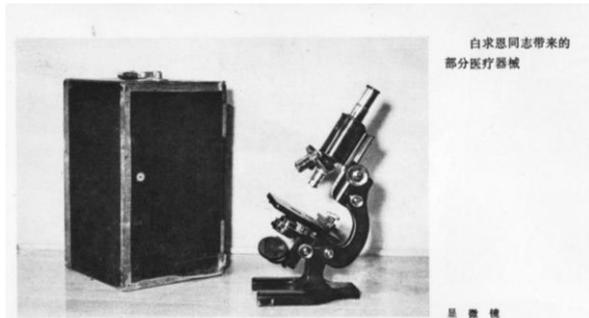


1938年6月初白求恩在山西岚县受到120师贺龙师长热情接待



1938年白求恩与聂荣臻接受《救亡日报》记者采访





白求恩带到抗日根据地的部分医疗器械



白求恩在战地为伤员输血

自 1938 年 6 月到 1939 年 11 月去世，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待了整整 17 个月，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前往冀中前线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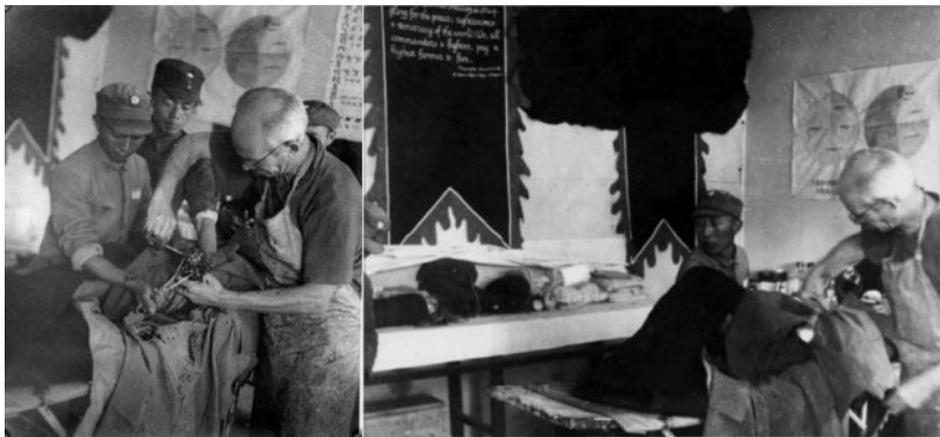
## 四、协力创建国际和平医院

1938年白求恩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期间，对刚建立不久的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所后方医院提出了在组织、清洁及其他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提高这些医院的技术和设备，他制定了一个“五周计划”，其重点是在松岩口村的一所大庙里创建“模范医院”。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放弃休息，夜以继日地工作。9月15日，这个后来被称为国际和平医院的模范医院落成了。



白求恩在模范医院落成典礼上讲话

在模范医院落成开幕典礼上，白求恩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作为医生、看护、救护员的责任，就是让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要把病人当成兄弟亲人，他们还是我们的同志。”“虽然我们和他们可能无法活着看到这个新中国的成立，但我们正在通过今天的行动，使之成为可能。无论它是否能够实现，都需要依靠我们今后的行动。我们必须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来创造它。”



1938年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山松岩口模范病室做示范手术



模范医院旧址

白求恩在五台山创立模范医院的同时，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在为争取国际援助做着积极的努力。为了将国际民间组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援助常规化，保盟开始筹备设立具体的根据地医疗援助项目。1938年7月，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经过保盟努力，会议作出援华决议，决定帮助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英、美、加的援华团体为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纷纷捐款。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委派英国伦敦援华委员会何登夫人为代表赴广州与宋庆龄商谈建院事宜。1938年9月2日，宋庆龄和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何登夫人。经商议，决定将晋察冀边区五台山模范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并请正在那里工作的白求恩大夫出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英国援华委员会捐助2450英镑，保卫中国同盟筹划950英镑，作为建院经费。



宋庆龄与何登夫人画照

## 五、致力国际和平医院建设

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作为国际和平医院与海外援华团体联系的代表，不断地向美国援华会以及英、美、加等外国援华机构反映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和需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援助，从资金、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等方面全力支持该项目的持续与发展。

Eighth Route Army Office,  
25 Chung Kai,  
Hankow, China  
August 4, 1938

China Aid Council,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235 South Avenue,  
New York City, USA.

Friends:

Dr. Norman Bethune has sent us a radiogram from the Wutaishan region. He and the foreign doctor, Dr. Richard Brown, who volunteered for medical work in our Army, have reached that region--as we wrote you a couple of weeks back. Dr. Bethune now radiograms states that more than 110 operations have been performed in that region in the past month--by himself and by Dr. Brown we take it. Dr. Bethune requests that you send him US\$1,000 for use in that region for medical and surgical supplies. He asks that you send it to ~~Dr. Bethune~~ ~~Dr. Ma in Yenan~~ Dr. Ma in Yenan.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instructed that 14 boxes of surgical and medical supplies now in Yenan be transported to the Wutaishan region. In these 14 boxes, presented the field hospital in North Shensi by th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mmission, are sufficient surgical instruments to equip a 300-500 bed field hospital, with quantities of medical supplies and dressings. So the problem of surgical instruments is solved for Dr. Bethune and Dr. Brown. From here we will try to replace these 14 boxes with others for North Shensi. We wish to get the boxes through to Wutaishan rapidly and so take this emergency ste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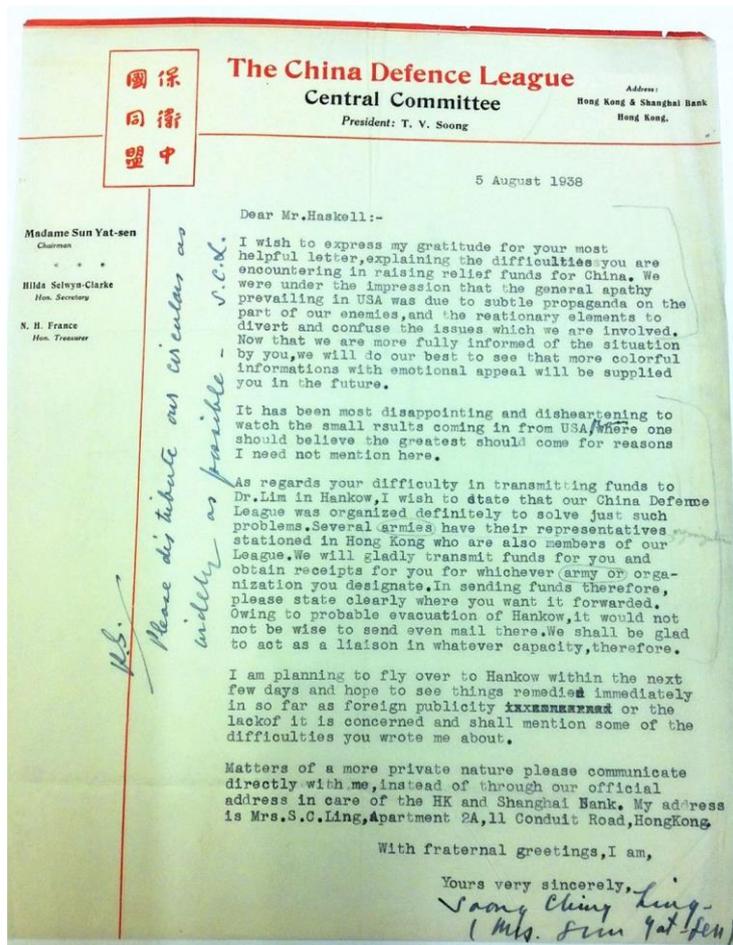
As for the US\$1,000: the receiving station for 8th Route supplies and money is the China Defence League, Hongkong. Dr. Ma is a foreign doctor in Yenan, and you cannot send money to him because that is not his right name --and we cannot have his right name used by mail or telegram or for the receipt of money. Also, we do not think that finances should go to individuals. Therefore, please send what you can for Dr. Bethune to our Hongkong office, with instructions that it be set apart for the Wutaishan region.

Very sincerely,

*Chow En-lai*

For the 8th Route Army

周恩来 1938 年 8 月 4 日就白求恩在晋察冀的工作以及援助物资事宜致美国援华会信



宋庆龄 1938 年 8 月 5 日就医药援华事宜致美国援华会信

由于通讯联系的困难和白求恩大夫日夜忙于医疗工作，有关该院工作的详尽的报道难以作为外部世界所得知。保盟委托贝特兰前往山西北部，负责该医院的组织并将相关报告和照片发送出来，可惜贝特兰未能最终抵达。1939 年 9 月，在延安接待过白求恩医疗队的马海德，被指派为保盟驻延安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药救济工作的情况，建议中央委员会关于保盟送往该区物资的分配。从那时起报告和照片才经常地由马大夫送来。

1939 年夏天，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受宋庆龄的委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晋察冀边区了解华北前线的情况，还前往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白求恩大夫了解医疗工作情况。她与白求恩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实地考察了国际和平医院和卫生学校。白求恩告诉王安娜，这里非常需要援助。王安娜回到重庆以后，将所了解情况向保盟、宋庆龄作了汇报。

尽管保盟做了诸多努力和大量工作，然而，宋庆龄对八路军的专项援助却无法及时到达晋察冀。一方面，美国援华会从纽约募集来的资金，要经中国红十字会和保盟，转手两次才能交给八路军。另一方面，延安是运往晋察冀物资的第一站，物资辗转运到延安，再从延安运出，要通过骡车走几周的山路才能到达晋察冀。而且，到 1939 年年中，国民党无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切断了所有运往延安的物资通道。白求恩所在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并没有及时收到保盟募集来的援助物资。白求恩一直在为得不到援助而焦虑万分，甚至计划乔装去北平购药。他动员了随新西兰教会来华并经常为他提供帮助的修女护士凯瑟琳·霍尔跟他同去，但是因此行太危险被八路军总部给拦了下来。不久，霍尔因支持八路军的活动被日本

人驱逐出境到了香港，后受宋庆龄委派，从香港通过越南海防和滇缅公路辗转给白求恩运输医药器材。遗憾的是，这一批药品器材运到时，白求恩大夫已经与我们永别了。



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

1939年10月20日，这个原本是白求恩计划动身回国募集经费的日子，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他毅然决定留下参与战地救护。他在河北涞源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指被手术刀割破，又在后来的手术中感染。11月12日，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白求恩逝世于河北唐县黄石口村。





1939年10月24日白求恩在黄土岭战斗前沿

1940年春，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共中央决定将白求恩工作过的模范医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 六、白求恩的工作在继续

白求恩的逝世，令宋庆龄十分痛惜。12月，宋庆龄在致尼赫鲁商讨印度医疗队援华工作的函中写道：“五台山这个地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而白求恩大夫却工作得非常出色，他在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用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负责300个病人的治疗任务。”印度国民大会发起的援华医疗队，于1939年2月到延安，在抗日前线跋山涉水，辗转各地，救死扶伤。白求恩去世以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接替白求恩，担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

白求恩逝世后，宋庆龄一直将国际和平医院及八路军医疗体系的建设作为对白求恩事业的延续，国际和平医院一直是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重点。至1941年，许多援华委员会、红十字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香港空前发展。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聚集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与诸多援华机构都建立了联系，募集医药费及其他必需品，想方设法宣传和支援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柯棣华大夫先后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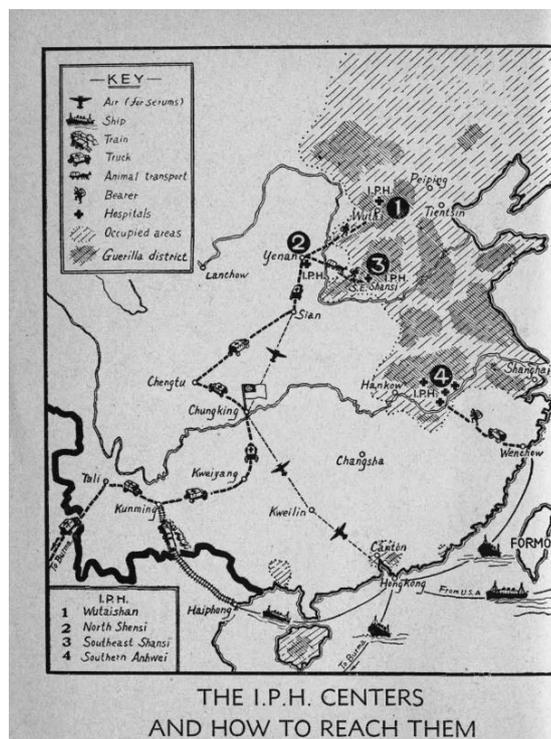
1940年2月，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义映墨西哥影片《裘莱士》，净收入3000余元，全部用以支援国际和平医院。保盟的宣传刊物上刊载了诸多与白求恩以及国际和平医院建设相关的工作报告、需求情况、捐赠情况等，向海内外呼吁以增加援助的行动来继续白求恩的事业。



宋庆龄、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及夫人出席为援助国际和平医院而举办的慈善演出《裘莱士》

在保盟的努力下，国际和平医院项目逐渐扩大，至1940年，已形成了包括五台山、延安、晋东南、皖南四个地区的医院和医疗工作的体系。除医院外，该体系还包括晋察冀军区

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的八路军制药厂、中国医科大学等，以及国际和平医院运输体系的维护系统。



1940 年的国际和平医院分布及援助物资运输体系

宋庆龄本人也多次致信海外援华机构以及国际友人，呼吁对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1945年11月8日，宋庆龄致函加拿大红十字会驻渝办事处，呼吁继续支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7年12月1日，宋庆龄发表《致国际友人》一文，谓：“中国人民在为争取进步和民主的艰苦斗争中一直深深怀念着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并一直被他的精神所激励。”“我知道，善意的美国人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维持下去并不断发展的。我相信，作为对白求恩大夫的纪念，我们可以共同再次向国际和平医院注入新的活力。”宋庆龄呼吁：“为了使白求恩大夫的事业得以继续下去，我请求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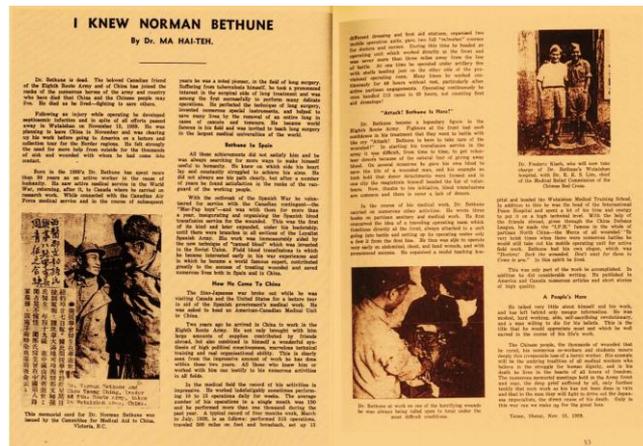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1945-46 年的驻华卫生部总干事、驻华世界卫生会干事鲍谦熙医生曾说：“国际和平医院建立了健全的医疗实践，给整个远东做出一个公共医药卫生实践的模范。”

至 1947 年，在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有了 8 所国际和平医院，和 42 所分院，16000 张病床。

## 七、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白求恩的去世，是中国抗战救护事业的巨大损失。宋庆龄对白求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给国外中国人民之友留下他的生命和工作的榜样”。在领导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以及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中，宋庆龄始终注重弘扬白求恩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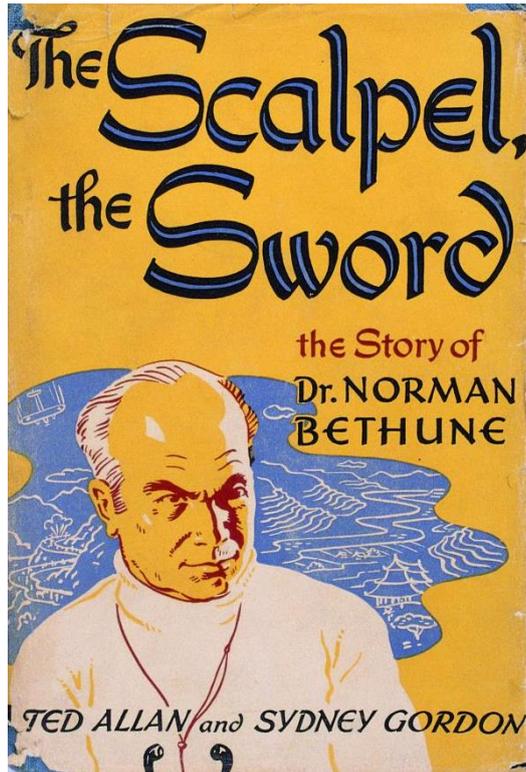
为悼念白求恩大夫逝世，纪念白求恩的丰功伟绩，1939年12月15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1期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在河北游击区4个月的工作》，并刊登了白求恩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一起的照片。1940年2月15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3期发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在继续》和马海德的回忆文章《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



马海德的回忆文章《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

194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十周年之际，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举行纪念会，向白求恩大夫致以最深的敬意与悼念！

1952年，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为白求恩大夫撰写的传记《手术刀就是剑》在美国出版。该书叙述了白求恩从一个普通医生成长为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整个过程。宋庆龄在所作的序中，说出了她对白求恩的印象：“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在她心中，“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宋庆龄在序中还说，“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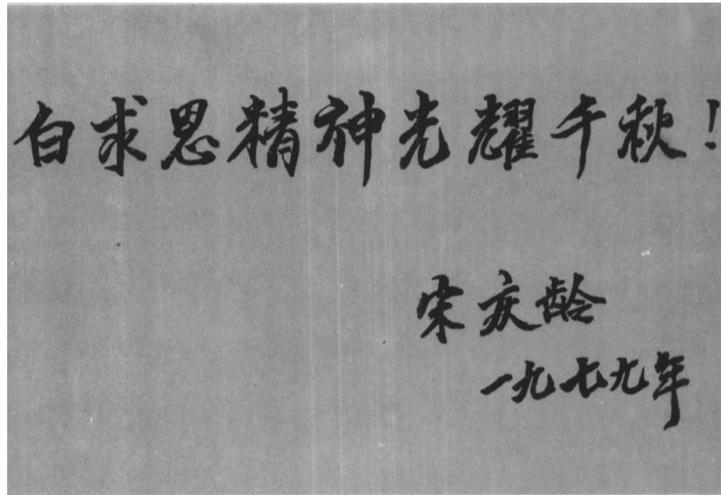


宋庆龄保存的《手术刀就是剑》



宋庆龄为《手术刀就是剑》所作的序言原稿

1979年11月12日“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宋庆龄为该展题词：“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1979年11月宋庆龄为“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题词

1981年5月8日下午，宋庆龄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典礼，并发表讲话，称白求恩是在各个革命与建设时期向中国提供帮助的加拿大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为反对一切企图奴役别人的人而团结战斗的国际性榜样”，是“中加两国的光荣”。讲话中，宋庆龄对中加两国友谊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呼吁“联合与加拿大一样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公众活动。

斯人已逝，而精神长存。宋庆龄、白求恩，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将毕生都献给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他们的光辉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